

教学论文目录

1、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语义波理论视角.....	2
2、二语写作中的定向动机流.....	7
3、多模态隐喻视域下的创造力培养模式.....	12
4、学分制转型时期工科院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改革—以青岛科技大 学为例	17
5、模态间性视域下的转译及其对二语学习者转译能力发展的作用.....	21
6、学分制改革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影响.....	28
7、《高阶二语习得手册》述评.....	31
8、地方高校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发展策略.....	35
9、翻译职业化时代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40
10、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习者 there be 存现句式产出研究.....	43
11、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探索.....	51
12、生肖文化在剪纸艺术中的呈现与对外传播.....	55
13、《〈诗经〉翻译探微》述评.....	59
14、教科书研究的新动向-《帕尔格雷夫教科书研究手册》述评.....	63
15、多模态英语教学研究的新动向 - 《图文小说在英语课堂中的应用：多 模态识读的教学可能性》述评.....	67
16、二语学习动机研究的新进展—《语言学习中的动机变化》述介.....	71
17、《跨语际身份认同的学习者叙事： 运用多模态方法探索语言学习经历》 述评.....	75
18、Multiliteracies in College English Pedagogy.....	79
19、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88
20、The Development of Vocabulary and Syntax through Translation.....	93

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语义波理论视角

刘 靖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作为人类的认知思维方式,转喻和隐喻的连续统互动观已得到学界认可。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交际方式的多元使多模态隐转喻的交际传播功能日益凸显。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包含两个层面:多模态交际能力和基于语言、图像等模态的隐转喻能力,涵盖四个维度:多模态隐转喻的识别、释解、评价和产出。与语义波理论中知识的累积建构类似,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是在语义波的不断推动下实现累积式发展。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是基于多模态隐转喻语篇和二语学习环境的三个协同互动的过程:识别解构、批评框定和转换建构。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与二语学习有机融合,为二语习得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多模态隐转喻能力;语义波;二语学习者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20)04-0055-05

Abstract: As a way of cognitive thinking of human beings, the continuum of metonymy and metapho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scholar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diversity of modes of communication have brought prominence to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multimodal metaphonymy. For L2 learners, multimodal metaphonymical competence includes two aspects of multimod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metaphonymical competence based on modes such as language and image, covering four dimensions: multimodal metaphonymy identification, interpretation, evaluation and output. Similar to the cumulativ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emantic wave theory, the multimodal metaphonymical competence of L2 learners is to achieve cumulative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semantic wave. Multimodal metaphonymic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model refers to three synergistic and interactive processes: identific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criticism and framing, conversion and construction, based on multimodal metaphonymical discourse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modal metaphonymic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 multimodal metaphonymical competence; semantic wave; L2 learners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20.04.009

1. 引言

二语学习者的隐转喻能力发展在继 Chomsky 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 Hymes 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之后,不断引发认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学界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语言文字隐喻,如对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转喻能力与写作水平的相关性研究(李克 2019),对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的研究不多。在传承与发展教育社会学家 Bernstein 的语码理论以及知识建构理论基础上,Maton(2013)吸收了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合理化语码理论”(legitimation code theory,简称 LCT),其中阐述了语义波的形成机制,认为语义波的产生与语义引力(semantic gravity,简称 SG)和语义密度(semantic density,简称 SD)有关。本文拟从语义波理论视角对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2. 多模态隐转喻

隐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其实质是用具体的事物来理解和构建抽象的事物,比如时间和情感等。隐喻能力是指对隐喻的识解和运用能力,即通过隐喻性的认知机制对概念进行映射或编码的语用能力,其本质是认知主体基于自身体验“在不同的认知对象之间建立语义关联的能力,是通过隐喻思维过程反映出来的跨域认识事物的能力,隐喻思维具有体验性”(袁凤识,等 2012: 79)。Gardner & Winner(1978:129)首次提出隐喻能力概念,认为隐喻能力包括对隐喻的改述、解释、生成和评价四个方面。Littlemore(2001:461)也从四个维度界定隐喻能力:隐喻产出的原创性,隐喻释解的流畅性,隐喻意义的识别能力以及隐喻意义的提取速度。由此可见,隐喻能力应该涵盖四个组成部分:隐喻的识别能力、隐喻的释解能力、隐喻的产出能力和隐喻的评价能力。四个部分相互作用,构建出完整的隐喻能力理论框架。隐喻在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比较

成熟,以 Littlemore 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从隐喻与二语的关系,隐喻能力与认知风格和语言水平,隐喻能力的教与学,隐喻能力与文体意识,隐喻能力与跨文化交际等不同侧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丰硕。

与隐喻的跨域映射不同,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的映射。转喻是利用某事物熟知的、或容易感知的方面来代替该事物整体或其他方面。与隐喻一样,转喻也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是在一个认知框架内共同出现的事物或事件之间建立起的联系。转喻的形成是事物间的相关性,而非相似性。在大脑的认知加工过程中,“相关联的事物能够彼此取代,演化为人类以此代彼的转喻思维能力”(蔡晖 2006:41)。Denroche (2015)认为转喻与转喻加工在语言和交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识别事物之间的相关性的认知技能在语言和交际各个层面都是不可或缺的,转喻能力解释了语言的灵活性和适切性。李克(2013:18)认为转喻能力应该包括五个方面:转喻的描写能力、转喻的解释能力、转喻的评价能力、转喻的生成与运用能力以及从微观到宏观之间的关系看待事物的能力。这与 Littlemore 的隐喻能力界定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增加了一个哲学维度。与隐喻一样,转喻的基础认知作用已得到学界认可,因此,对二语学习者来说,转喻意识和转喻能力的培养与发展有助于提升其语言应用能力。

虽然转喻和隐喻是两种认知机制,但由于人类认知的相对性,在实际语境中有时却很难严格界定映射的两个概念是否属于同一个概念域(龚鹏程、王文斌 2014),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转喻和隐喻位于连续统的两端,中间部分是二者的互动,并将这种现象称为隐转喻(metaphonymy)。近年来以 Forceville (2009:24)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隐转喻的研究不应囿于语言学范畴,引领了隐转喻研究的多模态转向。他们认为,人类的交际是多模态化的,如果隐转喻在思维认知中具有基础作用,那么隐转喻就不应只存在于语言之中,也应存在图像、动画、颜色、音乐、手势、布局,甚至触觉和味觉等多种模态符号及其各种组合中。“与单模态隐喻相比,多模态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分别完全或主要利用不同的模态来表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参与隐喻意义构建的各种模态具有不同的意义潜势或可供用特征,这些模态耦合互动,共同协奏,表征更加生动、直观的隐喻意义。多模态转喻亦是如此,是“通过图像、声音和文字等多种模态中的部分信息代替整体、部分信息代替部分或整体信息代替部分的一种转喻机制”(王天翼、甘霖 2015:84)。比如图像捕捉信息的瞬间性,决定了其指涉或表征意义的不完整性,因而用二维的瞬间(部分)代替三维的实体(整体)是图像模态转喻的一个主要特征。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认知个体与外部世界互动交流的结果,因此,作为认知手段的隐转喻能力应归属于交际能力的范畴。交际的多模态化决定了隐转喻能力的多模态属性。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本文认为二语学习者的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多模态隐转喻的识别能力,多模态隐转喻的

释解能力,多模态隐转喻的评价能力以及多模态隐转喻的产出能力。对于多模态的交际语篇,二语学习者首先应识别出各模态及其组合所表征的隐转喻,对其构建的隐转喻意义进行解构阐释,并根据具体语境对其批判评价,然后重构或建构新的多模态隐转喻语篇。

3. 语义波理论

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基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而语义波是合理化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共同关注的焦点(张德禄、覃玖英 2016; 罗载兵,等 2017)。合理化语码理论是关于社会文化行为合理化的系列组织原则,其中的语义性原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联系最为紧密。社会文化行为实践中意义的构建,即语义波的产生与两种语义编码(语义引力和语义密度)直接相关。语义引力是指意义对于语境的依赖程度,在语义引力的连续统中($SG+ \leftrightarrow SG-$),引力的强弱与意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成正比,即意义越依赖语境,语义引力越强。语义密度是指社会文化实践中意义的浓缩程度,在语义密度的连续统中($SD+ \leftrightarrow SD-$),密度的大小与意义的浓缩程度成正比,即意义浓缩程度越高,语义密度越大。语义引力的强弱与语义密度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语义轮廓(semantic profile),并通过使用一种能反映语义引力和语义密度如何逆向移动的语义刻度对语义变化幅度进行描写,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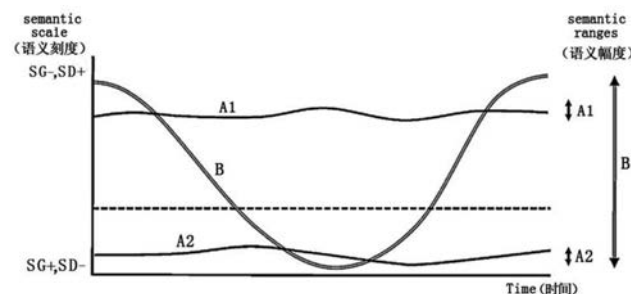


图 1. 语义轮廓和语义变化幅度(Maton 2013)

图 1 描述了随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三种不同的语义轮廓(A1, A2, B)及其变化幅度。从语义刻度方面来看, A1 表征的是高密度、低引力(SD+, SG-)的语义轮廓, A2 表征的是高引力、低密度(SG+, SD-)的语义轮廓, B 则表征语义引力和语义密度有高低起伏变化(SG ↑ ↓, SD ↑ ↓)的语义轮廓。从语义幅度方面来看, A1 和 A2 虽然不是直线,但起伏幅度较小,只能算是一种脉动,而 B 则通过在语义刻度位置上的上下移动或者说是通过语义引力的强弱与语义密度的大小之间的大幅移动而形成一种“波”,即语义波。

从知识建构和能力发展来看,在 A1 中,意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小,比较抽象,意义的浓缩程度大,知识处于脱离语境的概括状态。在 A2 中,意义与语境关联紧密,比较形象,意义的浓缩程度小,知识处于结合语境的具体状态。而 B 则融合了 A1, A2 的特征,意义对语境的依赖以及意义的浓缩程度不断变化,知识处于抽象 → 具体 → 抽象的状态,说明知识的建构是一种通过再语境化,不断从抽象演绎到

具体,再从具体归纳到抽象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过程包括知识由抽象到具体的下行轨迹和由具体再上升到抽象的上行轨迹,形成一个完整的语义波形。下行过程将浓缩的知识点解包(unpacking),上行过程将具体语境中获取的知识点再打包(repacking),浓缩成新的知识点。在不断地解包、打包、再语境化过程中形成多重的语义波,推动知识完成累积式构建(cummulative knowledge-building)。再语境化的程度取决于不同类型的知识结构,分别由不同类型的语篇实现,比如具象化的水平话语语篇和抽象化的垂直话语语篇。但正如图1中的虚线所示,知识的结构类属并非明确的划分,而是随着意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和意义的浓缩程度不断变化而形成的知识连续统。

4. 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

与知识的累积建构类似,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也是在语义波(或意义波)的不断推动下实现累积式发展。作为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的提升已引起学界重视,如魏梅(2014)发现图示和语言等外显化形式可以促进概念的理解和内化,通过图示符号能够增强学习者对隐喻外延意义的认识。但总的说来,对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的发展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包含两个层面:多模态交际能力和基于语言、图像等模态的隐转喻能力,具体涵盖四个维度:多模态隐转喻的识别、释解、评价和产出。多模态隐转喻意义的表征依赖于多模态语篇的设计,学习者需要了解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模态的意义潜势,选择有效的交际方式来创造意义,实现交际目的。New London Group(1996)提出“设计学习”的概念,把学习者知识的构建分为四个部分:情景实践、明确指导、批判框定、转换实践。即学习者通过亲身经历实践,获取信息知识;经过系统明确的指导,实现知识的概念化、理论化;对知识进行功能性、批判性分析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新的语境中。这种实践→理论→实践的知识发展路径与语义波理论中知识的累积式构建和知识结构类属有异曲同工之处。基于此,本文提出二语环境下,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的发展模式,如图2所示。



图2. 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

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是基于多模态隐转喻语篇和二语学习环境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学习过程:1)识别解构;

2)批评框定;3)转换建构,其中语义波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二语学习环境使学习者沉浸在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在识别或表达隐转喻意义时,无论涉及到哪种模态,都是对目标语思维方式和交际能力的实践和强化。多模态隐转喻语篇是学习者多模态交际能力和隐转喻能力发展的基础,通过对已有语篇的释解以及创造产出新的语篇,使多模态隐转喻的意识逐渐内化,实现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化。

4.1 识别解构

在该模式中,“识别解构”是指学习者基于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识别和解读不同语境中的多模态隐转喻语篇,在实践操作中主要是二语多模态隐转喻语篇。学习者理想化的认知模式是识别解读二语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基础,其中不同认知域之间的隐喻映射原则和同一认知域内部分与整体的转喻映射原则使学习者能有效地进行认知和推理。通过不同模态表征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邻近性,是识别隐转喻的重要参数,而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则是成功解读隐转喻语篇的关键因素。对于学习者来说,在识别解构的初始阶段,隐转喻语篇呈现出高密度、低引力(SD+, SG-)的语义轮廓,随着其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启动,语境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语篇意义逐渐明晰,呈现出高引力、低密度(SG+, SD-)的语义轮廓。语篇解读完成后,学习者在总结的基础上对通过多模态隐转喻构建、表达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语义轮廓又朝着高密度、低引力(SD+, SG-)方向变化,形成语义波,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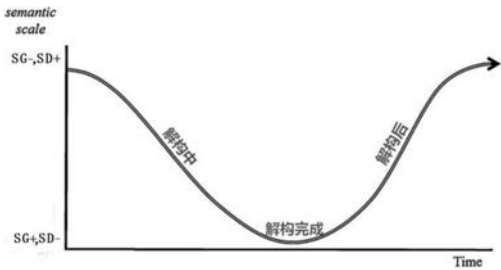


图3. 多模态隐转喻语篇识别解构语义轮廓



图4. 《经济学人》中的政治语篇

图4是选自《经济学人》的一个政治语篇,文字和漫画协同构建整体意义。语篇的文字部分提供了部分语境,比如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但总体来说,其语义密度是很大的,需要从漫画寻找释解的突破口。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漫画中女孩和老人通过多重的转喻和隐喻协同,分别表征中国和欧盟。其中的转喻包括:女孩衣服上龙形图案、挎包上的国旗图案、耳坠上的阴阳鱼以及帽子上的红五星等中国元

素一起转喻女孩的“中国人”身份,其服饰中的手环、丝巾、太阳镜等转喻时尚与现代,阴阳鱼耳坠与绿色军帽又同时转喻传统;老人手提公文包上的十二星旗帜图案转喻老人的“欧盟”成员身份,其西装革履转喻老牌正统。隐喻包括:当代中国是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年轻女孩;欧盟是正统严谨却已暮年的老人。漫画的转喻—隐喻链互动协同,亦使标题的文字隐喻语义密度降低:在当今国际社会的时空语境下,多模态隐转喻语篇识别解构完成,语义密度降到最低。这类语篇的释解会受到个体经历、知识储备、交际目的和文化规约等因素的制约。语篇的创造者往往带有自己所属的社群团体的偏见、评价和意识形态。因此,在释解《经济学人》这类语篇时,应引导学习者清醒认识语篇创建者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立场,提高对媒体所使用的多模态隐转喻的批判意识。

4.2 批评框定

“批评框定”指学习者对已有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分析、评价、概括和抽象,是通过语境对语篇建设性地批判和创造性地延伸。学习者以一定的个人或社会距离客观地看待、反思他人或自己的语篇,把多模态隐转喻的知识从原生态状态提取出来,成为可以研究、讨论的东西,这是一个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过程,也是语义引力逐渐降低、语义密度逐渐加大($SG \downarrow$, $SD \uparrow$)的过程。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Martin (2013)受 LCT 影响提出“权力三项”(power trio),即权力词汇(power words)、权力语法(power grammar)、权力话语组织(power composition),认为这三项是建构话语意义不可或缺的资源,其中权力词汇、权力语法能够有效提高语义密度,而权力话语组织则融合权力词汇和权力语法,组建语篇。

权力词汇指特定学科领域中语义密度较高,语义引力较低的专业术语。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批评框定”需要明确地引入多模态隐转喻元语言,即用以论述和讨论多模态转喻、隐喻领域的专门术语,使学习者能够对多模态隐转喻语篇进行反思、讨论、概括、推理等。这些理论和知识包括多模态隐转喻的基本概念、现代社会交际模态的系统特征(如不同模态的供用特征、意义潜势、功能负荷)、语言作为主要学习对象的系统特征(词汇、语法、语义)以及语言和其他模态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权力词汇(专业术语)在语义上的高密度与低引力,为意义的“解包”,即教师的明确指导创造了条件,通过为专业术语赋予具体的语境,使之具体化;然后再重新打包,使之抽象化并回到知识网络结构之中。

权力语法是指概念意义语法隐喻,包括通过名词化将过程或属性转变为参与者的经验意义隐喻,以及通过动词化使小句间的逻辑关系转变为动态过程的逻辑意义隐喻。从知识建构角度,经验意义隐喻将过程重构为实体,逻辑意义隐喻在一个小句内部建立过程逻辑关系,使意义抽象、浓缩,提高语义密度,实现了知识的再语境化,为语义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权力语法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转换或重构,降低语义引力,提高语义密度,而这种转换或重构不仅拘囿于语言内部,亦可以在不同模态之间实现。比如具

体形象的图像隐喻转换为概括抽象的文字表述,或文字隐喻转换为音乐表达。新媒体语境中,各类“聚合型语篇”中各模态意义交互共生,并在表意实践中实现多元互动与相互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语法在二语学习者“批评框定”多模态隐转喻语篇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权力话语组织是将权力词汇和权力语法组建成结构合理、意义连贯语篇的话语组织方式,使语义密度呈规律性变化的信息周期(periodicity),从而促成语义波的形成。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权力话语组织主要体现为语篇层面的主位推进和新信息引入形成的语义波。语篇层面的语义波是有层次的,主位和新信息的层次越高,越容易出现权力词汇和权力语法,信息的语义密度越大。不同层次的主位与新信息形成语义密度规律性变化的语义波,通过连续不断的语义波的变化和推进,使学习者完成知识的累积式建构。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权力话语组织还应关注语篇的布局结构,即语篇中的各个视觉成分(图像、色彩、文字排印等)之间的归组、联结和分离。比如,通过空白分出图像区域和文字区域,不同区域可能存在“押韵”(信息相同)或“对比”(信息不同),从而使语义连贯。从信息结构来看,一般来说,位于多模态页面左侧的是已知信息,右侧的是新信息,新信息的不断引入是推进语义波形成的动力。此外,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权力话语组织也涉及到美学因素,比如,平衡对称是取得美学效果的一个重要方式,语篇的布局如果失衡,便会令识读者感到不适,从而影响其整体的信息传播效果。

4.3 转换建构

转换建构是基于对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识别解构和评价反思,在不同的语境中构建、创作新的多模态隐转喻语篇,是将累积的多模态隐转喻知识创造性地应用于实践的产出过程。不同的语境在激活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结构的同时,也会激发新的求知过程,有关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知识不断地被解包和再打包,使语篇创作产出过程中的语义轮廓呈现出连续高低起伏的波形变化($SG \uparrow \downarrow$, $SD \uparrow \downarrow$),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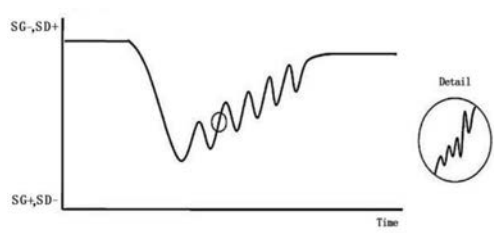


图 5. 多模态隐转喻语篇建构过程语义轮廓

建构产出多模态隐转喻语篇涉及到“语境”和“设计”两个层面,即在特定的语境中,各种模态设计资源协同互动,共同建构体现隐转喻意义。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创作就是表达主题的解包和再语境化。在语境层面,语篇创作者首先考虑的是情景语境,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方面,分别制约着语篇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决定着语篇整体意义的选择。语场是语篇要表达的核心主

题,通过隐喻或转喻的手段确切地构建主题意义是创作语篇的关键。语旨是语篇与传播受众之间的互动,吸引受众注意、受众的知识背景及接受程度等都是语篇设计者要考虑的因素。语式是语篇的实现方式,即表意模态的选择及整合,语篇的布局编排等。其次是社会文化语境,即使用多模态进行交际的社会文化背景。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创作要受制于社会文化语境和社团文化规约。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应致力于在目标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中寻找契合点,使创作的语篇既体现异域文化又不违反本族语文化的规约。在设计层面,多模态隐转喻语篇的设计就是综合利用多种模态,通过隐转喻构建意义,实现有效交际。New London Group(1996)提出意义设计的三个阶段:“设计资源”(available design)、“设计过程”(designing)和“再设计”(redesigned)。“设计资源”是语篇设计者可以利用的所有符号资源的统称。语篇的设计首先是根据现有的符号资源确定体现意义的方式,即哪些模态资源可以选用。“设计过程”是调用模态资源表征、体现意义的阶段,是从设计构思到实际话语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对已有模态资源的评估和筛选,最终调用最佳的模态或模态组合实现设计。设计过程受语境等多种因素制约,必要时突破常规的新奇隐转喻设计,可以取得特殊的传播效果。“再设计”是指设计的结果,经过转换和联通,又可以成为新一轮设计的可用“设计资源”,重新构建意义,这也从设计的角度印证了多模态语篇的互文性。

二语学习者在充分考虑语境因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计出多模态隐转喻语篇,通过同伴之间相互解读、评价、反思、重构,使其多模态交际能力和基于语言、图像等模态的隐转喻能力逐渐得到内化。如图6便是学习者设计的关于英语学习的多模态隐转喻语篇。语篇设计者通过文字和图像表达了自己对英语学习的体验和感悟。语言隐喻和图像隐喻相互补充,表明创作者英语学习之路:进步缓慢(如毛毛虫爬行),面临困难(困于茧中),但只要坚持努力,终有一天会破茧成蝶。握紧的拳头转喻学习者本人,同时隐喻学习者不畏困难的决心,与上方的fighting字样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选用的fighting图片,其中的太阳隐喻希望和力量,fighting中的两个字母i幻化成幼苗,隐喻“我”要努力,要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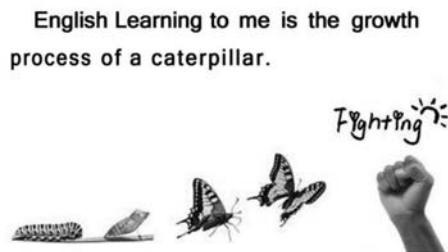


图6. 英语学习多模态隐转喻语篇

5. 结语

转喻和隐喻是人类的认知思维方式,现代多模态语篇

中转喻和隐喻的融合非常普遍,多重的转喻和隐喻互动形成隐转喻复合体,协同构建隐转喻意义。源域选择和隐转喻表征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多模态隐转喻语篇在释解和产出过程中形成多重语义波,促进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知识的累积性构建和多模态隐转喻能力的渐续性发展。结合语义波理论构建二语学习者多模态隐转喻能力发展模式,探索多模态隐转喻语篇在二语学习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多模态话语研究,也为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Denroche, C. *Metonymy and Language: A New Theory of Linguistic Processing*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2] Forceville, C. & E. Urios-Aparisi. *Multimodal Metaphor*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
- [3] Gardner, H. & E. Winner.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oric competence: Implications for humanistic disciplines [J]. *Critical Inquiry*, 1978(1): 123-141.
- [4] Littlemore, J. Metaphoric competence: A possible language learning strength of students with a holistic cognitive style? [J]. *TESOL Quarterly*, 2001(3): 459-491.
- [5] Martin, J. R. Embedded literacy: Knowledge as meaning [J]. *Linguistics & Education*, 2013(1): 23-37.
- [6] Maton, K. Making semantic waves: A key to cumulative knowledge-building [J]. *Linguistics & Education*, 2013(1): 8-22.
- [7] The New London Group.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6(1): 60-92.
- [8] 蔡晖. 转喻思维产生动因的多元思考 [J]. *外语学刊*, 2006(6): 41-45.
- [9] 龚鹏程, 王文斌. 体验哲学视域下的隐喻和转喻界面研究 [J]. *外语研究*, 2014(2): 1-6.
- [10] 李克. 转喻能力的构建及应用性研究——以英语阅读教学为例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4): 16-21.
- [11] 李克. 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转喻能力与写作水平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9(1): 72-77.
- [12] 罗载兵, 杨炳钧, 李孝英. 论语义波的三维分形模型: 合法化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界面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2): 48-60.
- [13] 王天翼, 甘霖.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多模态认知研究——以《国王的演讲》电影海报为例 [J]. *外语学刊*, 2015(4): 82-86.
- [14] 魏梅. 概念教学对大学生英语短语动词学习的影响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2): 25-32.
- [15] 袁凤识, 许保芳, 王立非. 中美大学生隐喻理解能力比较研究 [J]. *外语界*, 2012(1): 73-81.
- [16] 张德禄, 覃玖英. 语义波理论及其在教师课堂话语分析和建构中的作用 [J]. *外语教学*, 2016(2): 52-5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二语句法操作的界面研究”(项目编号:19YJA740074)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模态间性理论视域下外语学习者多元能力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CWZJ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靖,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硕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多模态语篇分析、翻译。

责任编辑 刘 锋

二语写作中的定向动机流

尹洪山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 266061)

提 要: 定向动机流是二语习得领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定向动机流在二语写作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及其特点。结果表明, 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与写作目标的时间量程具有高度的耦合性, 但动机流的消退具有一定的延后效应。同时,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出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的显性促进作用及积极情感作用。定向动机流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动机强度变化对二语写作的影响, 而且对创设学习愿景、增强学生的写作体验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二语写作; 定向动机流; 目标; 愿景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8)02 - 0064 - 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 - 1071/h.2018.02.010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Yin Hong-sha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DMC) is a newly initiated concep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adopts case analysis in exploring the dynamic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MC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jectory of DMC is highly in line with the time scale of the goal set for the learner, despite some delayed effect of the DMC endpoint. In addition, the paper verifies the validity of salient facilitative structure and positive emotionality of DMC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The theory of DMC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ivational dynamics o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but also implicational in enhancing students' writing experience through creating learning visions.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DMC; goal; vision

二语写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涉及学习者的工作记忆、焦虑程度及动机状态等个性差异, 其中动机是一个最具能动性的因素, 会对写作行为产生持久的激励作用, 从而形成一种定向动机流(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定向动机流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指二语学习者在实现目标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高强度动机状态(Dörnyei et al. 2015: 97)。该理论基于复杂动态系统的变化趋势构建全新的语言学习动机框架, 不仅揭示出学习愿景与动机强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且为二语写作教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1 文献综述

1.1 动态视角中的定向动机流

动机概念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 迄今已经有六十多年,

其间, 动机的研究范式经历过社会心理模式、认知情境模式、过程取向模式、自我系统模式和社会动态模式等(金海云 2013: 128 - 130, 詹先君 2017: 108)。其中, 以动态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动态模式为定向动机流概念的提出奠定基础, 同时, 定向动机流也从地理学上的湾流现象获得灵感, 并借用修辞手法将语言学习中这种目标驱动的高强度动机形象地表述出来。

动态系统理论最早由 Larsen-Freeman(1997)引介到二语习得领域。根据这一理论, 语言系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如年龄、性别、学能、动机、学习策略等相互作用, 使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呈现出非线性的动态发展特征。受动态系统理论的启发, Dörnyei(2005)认为复杂动态系统的非线性特征与二语学习动机的变化趋势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动机的状态和强度会随着学习者

的个体发展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因此,二语动机研究应该将学习者的内在心智和外在社会环境进行有机的结合(戴运财 2015: 74)。例如,刚刚确立的学习目标可以迅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使其处于高强度的动机状态;另一方面,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可能会使其突然失去二语学习的内在动力。定向动机流的概念恰恰反映出复杂动态系统的这些基本特征,复杂动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动机的发展具有涌现性,并呈现出学习者的个性化差异。

1.2 定向动机流的维度

定向动机流是一种隐喻的表达方式,从其内在结构看,具有 4 个维度特征:参数触发性、目标/愿景导向性、显性促进结构和积极情感状态(Dörnyei et al. 2015: 98 - 101)。

参数触发性是指定向动机流的产生依赖于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某一个因素或参数的缺失有可能阻碍定向动机流的生成。因此,定向动机流的涌现离不开某种触发性因素的作用。例如,学习上的一次进步可能成为激发学生学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偶然的一次失败也会使学生迅速失去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教学中可以通过创设特定的条件激发学习者的定向动机流,如设计个性化的教学任务,提供海外学习机会等。

定向动机流还具有目标或愿景导向性。目标和愿景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两者均具有未来时间的指向性。愿景除了具有目标的抽象性和认知性等特点外,还包含个体的一些感官要素,如学习者对未来目标的憧憬和想象等。一方面,动机的产生离不开学习目标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学习者对未来成就的心理感知。因此,定向动机流的强度往往取决于既有目标基础上的愿景驱动作用。

定向动机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动机行为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定向动机流的发展是一个从起点渐次接近预期目标或愿景的过程。须要指出的是,定向动机流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显性行为。同时,定向动机流也会对于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和评估,并由此激发动机的后续行为,进而发展成为行为惯例。行为惯例一经形成便不再受意志力控制,此时学习者的动机行为已进入自我引导状态。

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指向学习的最终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学习者往往能够体验到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定向动机流带给学习者的这种快乐情感体验贯穿于实现任务的整个过

程,使原本单调乏味的任务变得令人愉悦。学习者的这种心理体验并非来自任务本身,而是源于对未来目标的憧憬和对整体路径的感知。充分了解定向动力流的积极情感作用对提高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具有重要意义。

定向动机流概念的提出为动机这一传统话题注入新的研究元素,较早开展的定向动机流实证研究包括 Henry 等(2015)、Ibrahim(2016)、Safdari 和 Maftoon(2017)、Zarrinabadi 和 Tavakoli(2017)、常海潮(2017)等。这几项研究均基于定向动机流的理论框架,通过考察二语学习者动机强度的变化验证该假说的有效性。例如,Ibrahim(2016)通过研究 9 名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成人英语学习者发现,二语学习者的动机行为中的确表现出定向动机流现象,持久性的高强度动机在二语习得中较为普遍,而不受学习者文化背景、环境和年龄的影响。Safdari 和 Maftoon(2017)采用回溯性访谈的方法分析 1 名来自伊朗的成人英语学习者的动机流特征,发现该受试者的动机流特征符合理论假说的描述和预测,其中目标的指引和导向性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常海潮(2017)研究 10 名国内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大学本科 4 年学习动机的变化,认为学习动机个体变异主要表现在目标/愿景导向性和显性促进结构两个维度上。

1.3 动机与二语写作

在二语写作研究中,动机因素虽然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Kormos 2012; Hashemian, Heidari 2013; 李绍鹏 2015),但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写作动机的影响因素以及写作动机与写作成绩的关系等。例如,Kormos(2012)认为,二语学习者的写作动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与写作任务的类型密切相关。学习者的动机变量和自我调节能力与认知因素相互作用,会对二语写作的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写作的计划、构思、书写及修改各阶段。Hashemian 和 Heidari(2013)研究来自伊朗的成人二语学习者动机和态度与写作成绩的关系,研究发现,工具型动机与学术写作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融合型动机与写作技能之间的关系较为明显。刘静(2011)发现,中国大学生二语写作的内部动机高于外部动机,与英语专业受试者相比,非英语专业受试者的写作动机更具被动性,更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控制。Tsao 等(2017)以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为受试,发现在二语写作中学习者的内部动机和焦虑类型影响其对外界反馈的态度和评价。

二语写作过程涉及多种复杂因素,从写作动

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在学习者写作目标的设定、对待写作的态度以及赋予写作任务的价值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李绍鹏 2015: 31)。如前所述,定向动机流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和愿景驱动性,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可观察的起始点和消退轨迹。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揭示定向动机流在二语写作中的动态过程。本文拟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二语写作过程中定向动机流的运动路径,同时验证定向动机流在第二语言写作中的作用。

2 研究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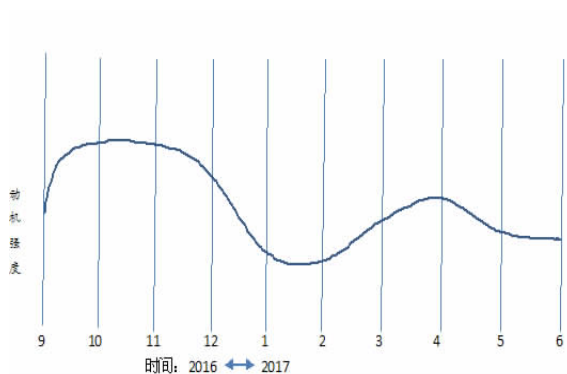
本文旨在回答两个研究问题:定向动机流在二语写作活动中的运行轨迹是怎样的;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行为是否具有显性促进作用和积极情感作用?

本研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受试者为一名非英语专业的大学二年级学生 W。受试者的选择经历 3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者对选修英语写作课程的学生学习动机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并将报名参加 2016 年“外研社杯”写作大赛校级初赛的 5 名学生列为课堂观察对象。在第二阶段,研究者重点观察 2 名获奖学生 Z 和 W,其中学生 Z 获得校级一等奖,学生 W 获得校级特等奖及省级复赛资格。这两名学生均对英语写作抱有较高的热情,但其写作动机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不同,学生 W 因要参加省级复赛,备赛期间在写作训练上投入时间较多,对参赛获奖也有很高期待。学生 Z 仅参加校级选拔赛,其写作动机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明显低于学生 W。在第三阶段,通过对两名学生的访谈,进一步对比两人的动机状态,确定学生 W 在写作任务中的定向动机流更加明显,符合本研究对受试者的要求。

针对第一个研究问题,研究者采用自绘动机轨迹图(Self-assessed Motivational Trajectory)的形式呈现结果。自绘轨迹图是定向动机流研究中的常用方法(Herry, Dörnyei 2015; 常海潮 2017),由受试者根据刺激回忆在相应的坐标轴上标注自己的动机强度。在本研究中,坐标的横轴表示动机变化的时间范围,跨度从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有 10 个变化点。坐标纵轴表示动机的强度,由受试者根据自己二语写作的经历回忆动机强度的变化,并在不同变化点的纵轴上进行标注。对第二个研究问题的探究采用半结构性回溯访谈收取语料,访谈主要基于 Muir(2016)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对访谈的内容进行全程录音。

3 研究结果

图₁显示出受试者的写作动机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从图₁中可以看到,受试者的写作动机从 2016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底的一个半月期间处于高强度的稳定状态,与定向动机流的特征相符,其它时段的写作动机则处于明显的波动范围。9 月中旬是写作大赛开始报名的时间,而这恰恰就是定向动机流的起点。动机流的运行轨迹与写作目标的时间量程具有高度的耦合性。随着写作大赛在 10 月下旬结束,学习者的动机强度开始逐渐减弱。11 月中旬动机流的消退速度开始加快,写作动机的低谷出现在次年的 1 月和 2 月,此时恰逢寒假期间,受试者写作的愿望不强烈。在第二学期,受试者的写作动机出现一定的波动性,不够稳定,不符合定向动机流的特点。



图₁ 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

从图₁中我们还发现,学习者定向动机流的终点有一定的延迟效应,定向动机流并没有随着目标的实现而立刻终结,而是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减弱。这种情况说明,学习目标的导向作用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影响学习者的动机行为。

针对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我们对受试者进行访谈。在访谈中,受试者汇报说,非常渴望能够在写作大赛中获奖,这一阶段自己写作的动力特别强烈,写作量大大增加。通过高强度的写作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明显提高,感觉有东西可写,能够表达更多的思想。对她本人来说,写作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自己每天都会定时写英语作文,并根据老师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那段时间的写作活动非常有规律,身边的同学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这种变化。从上面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到目标和愿景的驱动,受试者有着强烈的写作愿望,并明确感觉到自己在写作方面的进步。定向动机流的这种显性促进作用符合该理论的假设,

同时也验证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

此外,受试者的写作体验也对定向动机流的积极情感作用提供佐证。在访谈中,受试者汇报说,参赛期间的高强度写作经历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虽然自己刚开始参加比赛时带有一种功利的心态,但“后来就感觉到写得开心,特别是受到老师表扬的时候,感觉更加开心……参加比赛很有趣,写作文也很有趣”。受试者表示,写作对自己来说并不是一种难事,而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经历。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非常愿意重新经历一次。从中可以看出,定向动机流带给学习者一种情感上的快乐,这种愉悦的心情贯穿于实现任务的整个过程。受试者体验到的这种积极情感作用符合定向动机流的理论预测,也进一步验证 Henry 等 (2015) 的研究结果。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首先揭示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及其特点。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认为目标的实现往往意味着定向动机流的终结。本文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定向动机流的终点相对于学习目标而言,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这说明,学习目标和愿景对学习动机的导向作用具有较长时间的激励作用。另外,我们还发现,动机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既有稳定状态期间的定向动机流,也存在波动性的变化区间。这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定向动机流的激发和消退过程贯穿于学习任务的始末,定向动机流的涌现离不开某种触发性因素的作用。同时,教师也要关注定向动机流的消退规律。一方面,定向动机流的产生依赖于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如何利用和创设这种触发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获得参加某项竞赛的机会可能会对二语写作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教师布置的一项作业也可能成为激发学生写作热情和动机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定向动机流的延迟效应有助于学习者继续维持较高的学习热情,教师可以因势利导,通过对其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反馈和评估,激发动机的后续行为,进而发展成为行为惯例 (behavioural routines)。

就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行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表现出积极的情感作用。定向动机流的显性促进作用取决于学习者设定的目标/愿景与动机路径的匹配程度。如前文所述,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路径是从起点开始,通过完成一系列的子

目标,渐次接近预期目标/愿景。在二语写作过程中,学习者在目标/愿景的激励下,不仅具有较高的写作热情,而且能够取得显著的进步,自我效能感明显增强。对教师来说,要充分把握定向动机流的这一特点,通过为学生树立具体、可实现的目标激励学生的写作动机,并根据其实际水平创造适当的学习愿景,以此激发其学习二语写作的热情。同时,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多样化的写作任务巩固愿景,从而使其在体验学习成功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愿景。学习者的这种写作行为最终会进入一种“动机自动驾驶”状态,从而内化为定向动机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再受个体的意愿控制。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验证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活动的积极情感作用。这种情感上的快乐体验贯穿于实现任务的整个过程,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写作潜能。须指出的是,这种快乐并非写作任务本身所固有,而是来自未来愿景的情感映射。定向动机流给学习者带来的这种积极情感反映出心流体验对学习活动的影 响。根据 Csikszentmihalyi (1990) 提出的心流理论,当学习者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某项学习任务时,往往感受不到外界的干扰因素,对时间的感知也会发生变化,此时的学习则会处于一种最佳状态,学习者会产生一种愉悦的情绪体验。在二语写作活动中,未来目标和愿景的驱动作用会触发定向动机流的涌现,基于心流体验所产生的积极情绪对于个体来说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属于一种“自我实现的幸福” (eudaimonic well-being) (Ryan, Deci 2001; Ryff 2013)。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二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定向动机流的积极情感作用,使学生在忘我的境界中全身心投入写作活动,有利于学习者在持续的写作任务中发展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另外,定向动机流有助于学习者将这种愉悦的学习体验迁移到后续的写作任务中,这就要求教师为学生树立更高的学习目标,使其在进入高峰体验和深度喜悦状态的基础上发挥最大的学习潜能。

5 结束语

在第二语言写作活动中,学习者的定向动机流发挥着独特的激励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二语写作动机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定向动机流的运行轨迹与目标/愿景的实现过程具有较高的匹配度,但其终点存在一定的延迟效应。另外,本研究的结果验证定向动机流的两个维度特征,

即定向动机流对二语写作行为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并能够给学习者高强度的写作活动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传统的二语写作研究虽然也注意到外部动机的影响,但却没有揭示定向动机流所发挥的这种独特作用。定向动机流为二语写作活动所注入的巨大能量及其带给学习者的终极幸福感是一般动机行为所无法比拟的,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二语写作教学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当然,作为一项个案研究,本文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受试者的数量偏少,缺少足够的定量数据等。今后的研究可以适当扩大受试者数量,并将集体定向动机流的考察列入研究范围,为二语写作教学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指导策略。

参考文献

- 常海潮. 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动机变化机制研究——基于定向动机流理论的定性考察[J]. 外语界, 2017(3).
- 戴运财.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J]. 外国语文研究, 2015(6).
- 金海云. 外语学习动机理论的发展与演变[J]. 外语学刊, 2013(6).
- 李绍鹏. 二语写作发展中的个体差异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5(6).
- 刘 静. 大学生英语写作动机类型及专业差异[J]. 鸡西大学学报, 2011(7).
- 詹先君. 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实证研究 2006-2015: 回望与前瞻[J]. 外语学刊, 2017(3).
- Csikszentmihalyi, M.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M]. New York: Harper, 1990.
- Dörnyei, Z. *The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2005.
- Dörnyei, Z., Ibrahim, Z., Muir, C.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Regulating 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rough Motivational Surges [A]. In: Dörnyei, Z., MacIntyre, P., Henry, A. (Eds.), *Motivational Dynamics in Language Learning* [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5.
- Hashemian, M., Heidari,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2 Learners' Motivation/attitude and Success in L2 Writing [J].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 (70).
- Henry, A., Davydenko, S., Dörnyei, Z. The Anatomy of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Exploring Intense and Enduring Periods of L2 Motivation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5(2).
- Ibrahim, Z. I.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Optimal Productivity and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16.
- Kormos, J. The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2 Writing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12(4).
- Larsen-Freeman, D. 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7(2).
- Muir, C. The Dynamics of Intense Long-term Moti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16.
-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1).
- Ryff, C. 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d Health: Mapping Consequences of Self-realization [A]. In: Waterman, A. S. (Ed.), *The Best Within Us: Positive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Eudaimonia* [C].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 Safdari, S., Maftoon, P. The Rise and Fall of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A Case Study [J]. *The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17(1).
- Tsao, J., Tseng, W., Wang, C. The Effects of Writing Anxiety and Motivation on EFL College Students' Self-evaluative Judgments of Corrective Feedback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2017(2).
- Zarrinabadi, N., Tavakoli, M. Exploring Motivational Surges among Iranian EFL Teacher Trainees: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in Focus [J]. *TESOL Quarterly*, 2017(1).

定稿日期: 2017-02-16

【责任编辑 陈庆斌】

多模态隐喻视域下的创造力培养模式构建

○ 刘靖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隐喻的构建和运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多模态隐喻中模态间的协同和不可通约性, 以及语境的多样性, 能不断产生新的跨域映射和意义表征, 这为多模态隐喻的创造力提供了理据。二语学习者对多模态隐喻语篇进行解构、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不仅是一种设计和再设计, 更是一个不断求异创新的过程。创新思维培养与二语学习有机融合, 是二语习得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 多模态隐喻; 设计; 创新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72 (2017) 02-0063-05

Creativity cultivation model i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metaphors

LIU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d using a metaphor is by its very nature a creative process. The modal synergy and incommensurability,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context, constantly create new meaning and novel cross-domain mapping, providing creativity motivation for multimodal metaphor. The de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discourses by L2 learners are not only a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redesign, but also a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vity and L2 learning is a new tren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 multimodal metaphors; design; creativity

对二语学习者来说, 语言技能的训练和批判、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二者不可偏废。对此外语学界已有共识, 不断呼吁、探索从重视语言技能转变为重视思辨、创新等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1]。而“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2], 也就是说, 隐喻通过独特的想象力, 将一个系统中的实体的某些特性映射或归属于另一个系统, 因此, “隐喻的构建和运用, 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过程”^[3]。学界对多模态隐喻的研究方兴未艾, 探讨其对二语学习者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拟从多模态隐喻性语篇的创造力、批判新思维、多模态隐喻语篇的解读设

计等多维视角, 探索二语学习者在多模态学习环境下创新思维的培养模式。

一、多模态隐喻的创造力理据

隐喻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概念隐喻理论(CMT)认为, 隐喻是“更具体或基于身体体验的源域和更抽象的目标域之间的映射”^[4]。这种映射根植于人的日常经验及知识, 因而具有体验性的特质, 其中, 语言是概念隐喻的物质外壳。隐喻的实质在于以具体来理解和体验抽象, 通过并置具体和抽象, 隐喻暗示两种事物之间存在着事先未被注意到或未被发现的相似性。

近年来以Forceville为领军人物的学者们将隐喻

[基金项目] 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QDSKL1501076); 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5M084)

[收稿日期] 2017-02-25

[作者简介] 刘靖(1974-), 男, 山东乳山人,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进一步拓延,认为隐喻如果在思维中具有基础作用,那就不应仅存在于语言之中,也应存在于静止或动态画面、音乐、手势,甚至触觉和味觉及其各种组合中。他们提出多模态隐喻概念,“多模态隐喻指源域和目标域分别利用或主要利用不同的模态来呈现的隐喻”^[5]。并开始聚焦于文字、图像、颜色、声音等多种不同模态符号对隐喻的构建和表征,引领了隐喻研究的多模态转向。Lakoff & Turner在谈及诗学隐喻时认为隐喻的创造力主要在于诗人通过拓展、详述、质疑、组合等手段对常规隐喻进行策略性的加工^[6]。体验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范畴、概念、推理、心智等都是由人类的身体经验尤其是感觉运动系统和外界客观事物的互动所形成的。Kövecses认为,隐喻创造力的理据正是源于其体验基础,同时指出还应把语境因素考虑在内^[7]。因为隐喻的创造力不仅需要体验基础,还要受到语境(自然环境、社会因素、文化语境等)的制约。体验基础决定了隐喻思维的普遍性,而语境的多样性则决定了隐喻创新的无限可能。

多模态隐喻中,意义的创造是多种模态协同、共生的过程。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语境中,不同的模态符号具有自身独特的表意潜势,它们协同作用、共同合奏,使源域的形体和空间维度更加鲜活、直观,再加上模态符号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为新奇隐喻的构建提供了机遇,进一步增强了多模态隐喻的创造力。比如常规隐喻TIME IS MONEY,如果视觉模态参与构建,将会衍生出大量富有新意的隐喻表征。Semino认为,隐喻的创造力“需要从其概念映射的新颖性,隐喻选择和模式的突显性和原创性来考虑。”^[8]多模态隐喻中,各模态符号的非常规运用,异质模态符号的相互混搭,不断产生新的跨域映射和意义表征,无论对于隐喻的构建者还是解读者来说,都是对其创造性思维的有益历练。

二、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基于逻辑方法,并结合人们日常思维的实际和心理倾向发展出的一系列批判性思维技巧,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先决条件,对教育、经济、民主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9]。创造力是在面对特

定问题时,能生产新异、独特的创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0]。而创新通常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明显不相容的体系进行异类联想,进而对习惯的思维模式进行重构。Bailin et al提出应把思维能力培养与知识内容相结合,引导学习者参与推理、评判等活动,提供激发批判创新思维运行的有效环境^[11]。而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与现实贴近、富有挑战性的热点议题更有利于批判思维能力的发展,学习内容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先验知识、学科理论和实践知识,以调动其感知觉、想象力和语言表达欲,激发其兴趣^[12]。Luke & Freebody构建出包括文本解码、意义建构、文本使用和文本评论在内的四层学习行为模型。其中的文本涵盖纸质、电子、网络、视频等各种语类的多模态语篇。学习者运用语言等模态符号知识图式对文本内的符号信息进行解读、推断和意义建构;根据日常经验知识图式理解、掌握和运用文本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交互作用;对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思考,并对文本的观点、立场和倾向进行重构^[13]。该模型在大数据时代对于外语学习者辨别、分析、整合、评价海量文本信息,有效提高目标语识读能力、文化素养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Alnofaie提出一个将批判性思维培养和外语教学有机融合的理论框架,指出在提高外语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总体目标下,应明确各语言课程的具体批判性思维技能目标,并将其有针对性地融入教学实践。必要时可通过专门的思维技能课程,使学习者熟悉涉及批判性思维的相关概念,以增强进而内化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意识并迁移到其他领域^[14]。

三、多模态语篇设计

设计本身就是创新,设计意味着无限可能。现代交际方式的多元化和交际语篇的多模态性,对学习者的多模态语篇设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设计能力包括对多模态语篇进行解构、建构和重构的能力。从社会符号学视角来看,设计就是“运用所有的符号模态,或符号模态的组合作为符号资源的过程,是在某个交际语境中体现话语的方式”^[15],即多模态语篇的设计。在这个设计过程中,语言及其他符号的实际使用是人们根据语境做出的语义选择,是意义潜势的实例化^[16],也就是说,多模态语篇

的设计是各种符号资源潜在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实现,表现为不同的模态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交际语篇的整体意义。

从语境设计层面来看,多模态语篇的设计首先应考虑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即交际语篇所属的社团文化规约和社会历史背景。在语篇设计中,要明确交际目的,遵循交际的程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内,合理地选择模态表意符号。其次是情景语境。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理论认为情景语境包括语旨、语场和语式三个方面,分别制约着人际意义、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构建。其中,语旨指的是多模态语篇的设计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即设计者要充分了解受众的兴趣和潜能,不断调整多模态语篇的设计策略;语场是指多模态语篇设计的核心主题,即语篇的设计者要围绕这一主题,调用丰富的设计资源,进行意义建构,完成交际目的;语式是指对多模态设计资源的筛选、调用、编排和整合,以及对多模态语篇呈现方式的选择。多模态语篇的设计者要充分考虑各模态符号之间以及各模态符号内部不同媒介之间的互补制约关系,实现“最佳效果”。情景语境三要素协同互动,保证了交际的顺利进行。

从意义设计层面来看,就是要对实现意义的要素资源进行设计。新伦敦小组认为,包括语言、视、听、手势、空间等在内的设计资源要素要通过“设计资源”(Available Design)、“设计进程”(Designing)和“再设计”(Redesigned)三步来实现意义^[17]。“设计资源”是进行多模态语篇设计时所有可以利用的符号资源的总称,以及这些符号资源生成意义的秩序和规则。包括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语言资源及其语法规则,视听资源、手势资源和空间资源及其表意规则等。“设计进程”是符号资源从意义潜势到意义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选择,即选择什么模态或模态组合结构来表征人际意义、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18]51}。在这一过程中,多模态语篇的设计者要对可用的设计资源进行评估,对设计过程做出评价,最终筛选出最佳的模态或模态组合以成功地实现交际。筛选评估的过程要受到规则和语境的制约。对于制约,设计者可以有两种策略:要么遵守这些规则,按照惯常的做法对模态进行设计,要么打破这

些制约,创造新的模式和行为方式,用以取得更加特别的效果^{[18]58}。而打破制约,就意味着创新,这一点对多模态语篇的设计者来说尤为重要。“再设计”是设计过程的完成产品,同时又可以是新一轮意义设计的“可用设计资源”,如图1所示。这一动态的循环过程具有互文性和杂合性特点,在新一轮的意义设计中,设计者根据新的设计需求,把以往的设计产品当作设计资源重新构建意义,并创造性地糅合多种模态符号,开始新的设计进程。如此循环但不简单重复,不断创造新的意义。



图1 多模态语篇意义设计

四、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在二语学习环境下,教师和学习者都是多模态语篇的设计师,都是为了“学”而设计,为了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力”而设计。而创新力是一种最重要的学习力,学习者在设计多模态语篇的过程中学,不断提高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多模态交际能力,特别是对具有创新潜势的多模态隐喻性语篇进行解读和设计,使学习者的创新思维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新伦敦小组(1996)提出一个“设计学习”的框架:(1)情景操练(situated practice),基于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经验,使之沉浸于有意义的仿真操练,是设计者对设计资源的处理过程。(2)明确指导(overt instruction),以明确的方式(包括使用元语言),系统地指导学习者的学习活动,使之理解意义设计的概念系统,意识并监控学习行为。(3)批评性框定(critical framing),关注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在意义设计中的作用,使学习者从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视角批评性、建设性地思考、框定学习活动。(4)转换操练(transformed practice),使学习者完善、修正学习设计原则,并应用到新的语境产生

意义。基于此,并参照Luke & Freebody的四层学习行为模型^[13],我们提出一个多模态隐喻视域下的创新思维培养模式,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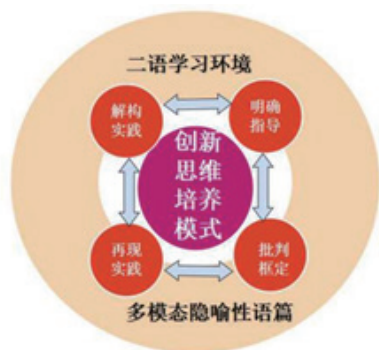


图2 多模态隐喻视域下创新思维培养模式

创新思维培养模式是基于多模态隐喻性语篇和二语学习环境的四个互相关联的学习过程:(1)解构实践(Interpretation Practice), (2)明确指导(Overt Instruction), (3)批判框定(Critical Framing), (4)再现实践(Representation Practice)。多模态隐喻性语篇的创造力使设计成为无限可能,为创新思维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语学习环境使学习者沉浸于两种不同社团文化语境中,虽然文化差异会在解构二语多模态隐喻语篇时遇到困难,但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反而更丰富了构建新的隐喻语篇的可用设计资源。该培养模式不仅注重学习者多模态隐喻知识的建构,更注重学习者对已有和新建多模态隐喻知识的创造性运用,通过对具体语篇的解构、建构实践,使创新意识逐渐内化,实现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化。

在该模式中,“解构实践”是学习者基于自身经历和已有知识,解构识读不同语境中的多模态隐喻语篇,在实践操作中主要是二语多模态隐喻语篇。西方媒体报道中的政治漫画是分析、解构多模态隐喻的最佳语类之一。这种语类的多模态隐喻通常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图像以幽默夸张的形式浓缩政治现实,文字简明扼要,引导解读者对漫画做出创作者所预期的解读,形成情感或立场的共鸣,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复制和重构。由于这种语类的解构会受到文化规约、语篇风格、交际目的、自身经历和知识背景等因素的制约,所以学习者对同一漫画的解读往往会有所差别,甚至与创作者的预期大相径庭。

但“一千个读者眼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多模态隐喻的解读与此类似,而且这种求异思维恰恰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前提。

“明确指导”是对多模态隐喻语篇意义设计的概念理论系统的理解过程,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学习者指导,发展学习者自身已有的设计资源,包括元语言,交际模态的特征和功能,模态选择的规则、模态间的协同等。在多模态隐喻中,源域和目标域分别由不同的模态符号呈现。在多模态的语境下,各模态或符号协同合作,相互补充,构成概念隐喻。指导者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多模态隐喻语篇的相关术语、不同模态的意义潜势以及多模态隐喻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和情景语境等。学习者通过解读、制作多模态隐喻语篇,深入理解隐喻语篇的生成机制,以及各种模态在构建语篇中的不同作用,特别是语言模态在表达意义上与其他模态的差异。

“批判框定”是指引导学习者的批判性意识以及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和层次。客观对待、评价、反思自身已有知识,并对之进行创造性的延伸和应用,着眼于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在意义设计中的作用,进一步理解多模态符号的表意功能。这是创新思维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为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的前提。由于新闻热点议题更有利于触发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以及学习者的先验知识,调动其感知想象力和表达欲,鼓励具有建设性的不同观点。对于学习者来说,应从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着眼,批判性地分析、评价、反思他人甚至自己的多模态隐喻语篇作品。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学习者勇于突破规则和语境的制约,进行异类联想,发现和创造新的跨域映射,以更好地进入新一轮的“再设计”。

“再现实践”是基于对多模态隐喻语篇的解构实践、评价反思,在不同的语境中构建创作、重构完善多模态隐喻语篇,再现、固化隐喻的创新思维和多模态表意的能力。学习者在已有的设计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选择源域,并进行多模态化的呈现,设计出自己的多模态隐喻语篇,并在小组内相互解读、评价,听取建议,取长补短,完善重构作品。需

要指出的是,文字隐喻和图像隐喻在人脑中的解码方式有所不同,对文字隐喻的解构是由字面意义到隐喻含义线性进行的,而对图像隐喻的解构则是画面意义和隐喻含义的整合同时进行,令解构者“顿悟”,这也是多模态隐喻的优势所在。虽然有些多模态隐喻是语言隐喻的多模态化呈现,但图像隐喻大都具有原创性,通过选择出人意的源域和打破常规的视觉设计,创造两域之间新的相似性,发现看待常规事物的新视角。从这一点来说,多模态隐喻对创新思维培养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结语

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已大量出现在各种语类的多模态话语里。对二语学习者来说,解构、建构和重构多模态隐喻语篇的能力不仅影响多模态话语的交际效果,也影响其批判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多模态隐喻在二语学习中应用探索和创新思维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不仅丰富了多模态隐喻的研究,为二语学习者思辨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新视角,也顺应了读图时代语言教学与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 [1] 文秋芳. 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J]. 学位与研究教育, 2008(10): 29-34.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5.

- [3] Finke R A, Ward T B, Smith S M. Creative Cogni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105.
- [4] Kövecses Z.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67.
- [5] Forceville C, Urios-Aparisi E. Multimodal Metaphor[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9:24.
- [6] Lakoff G,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69.
- [7] Kövecses Z. A new look at the metaphorical creativit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0(4): 663-697.
- [8] Semino E. Metaphor in Discour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54.
- [9] 彼得·费希万,等. 作为普通人类现象的批判性思维——中国和美国的视角[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1): 55-62.
- [10] Feldhausen J F, Westby E L. Creative and Affective Behavior: Cognition, 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M] // Houtz J C.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2003:95-105.
- [11] Bailin, et al. Conceptualizing critical thinking[J].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999(3):285-302.
- [12] Greenlaw A S, Deloach S B.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with electronic discussion[J]. The Journal of Electronic Education, 2003(1): 36-52.
- [13] Luke A, Freebody P. Further notes in the four resource model[J]. Practically Primary, 1992(2): 5-8.
- [14] Alnofaie H. A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critical thing as a language pedagogy in EFL preparatory programmes[J].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013(10):154-158.
- [15] 张德禄. 论多模态话语设计[J]. 山东外语教学, 2012(1):9-15.
- [16]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Maryland: University Park Press, 1978:39.
- [17] The New London Group.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6(1):60-92.
- [18] Kress G,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M]. London: Arnold, 2001.

【责任编辑 祁丽华】

学分制转型时期工科院校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改革*

——以青岛科技大学为例

尹洪山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学分制的实施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对满足人才培养的个性化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青岛科技大学的改革实践, 讨论了学分制转型时期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建设问题,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尊重个体差异、注重个性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

[关键词] 学分制; 大学英语; 课程改革; 个性发展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Reform in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at the Turn of Credit System: the Case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in Hongshan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edit system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atisfying the personalized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Drawing on the reform carried out at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issues in reforming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at the turn of credit system, which reflects the idea of modern education tha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pays respect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lays emphasis on pers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redit system;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reform; Personal development

一、改革背景

学分制最早发源于18世纪的德国, 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1]。随着

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 学分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国内高校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学分制的实施基于学生的个

[作者简介] 尹洪山(1967-), 男, 教授, 博士, 院长。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厅本科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学生多元化需求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编号: 2015M084); 青岛科技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学分制背景下的大学英语个性化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编号: 2014142)。

性化学习需求和目标,反映了高等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时代变化。这种教学管理制度体现了学校对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的充分尊重,学分制的弹性教学计划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安排个人的修学计划,能够满足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和个性化需求^[2]。从国外高校的实施效果来看,学分制的实施有利于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岛科技大学是山东省属重点建设的大学,原名青岛化工学院,目前拥有理、工、文、经、管、医、法、艺、教育等九大学科门类,其特色学科为化学工程、应用化学、材料学、机械工程、自动化、信息与计算机。我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过于僵化,学分设置不够合理,大学英语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比例不够科学;其次,学校没有根据学生的入学水平实行分级教学,不仅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压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会极大地制约学分制改革效果的发挥;再次,大学英语教学没有突出我校的化工学科特色,专业英语教学一直存在薄弱环节。

2014年1月,我校正式出台了《深化学分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确立了学分制改革的总体原则和时间路线图,决定从2015级新生开始实施学分制改革。鉴于大学英语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败决定着学校学分制改革的成效。我校大学英语教学历经几次改革,但必修课在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一直过高,教学内容过于侧重语言技能。拓展选修课不仅数量少,而且类型单一,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元化学习需求,也无法适应学分制改革的要求。因此,如何构建个性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成为学分制转型时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我校的学分制改革总体思路,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突出以下三个原则:

1. 个性化、差异化教学原则。针对我校专业

门类众多、学生来源地分布广的特点,学校充分调动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进行主动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在完成必修课程的基础上,自主选修拓展课程。

2. 课堂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并重原则。不仅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要涵盖课堂教学,而且教学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课外学习环境,通过加强对课外英语学习的指导,培养其英语实际应用能力。

3. 信息化、网络化原则。学校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基于信息技术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有效改革。

根据改革方案,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个模块。必修课为8个学分,在第一学年完成,以通用英语的教学为主,教学内容主要涉及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选修课程在第二学年开设,主要为拓展提高课程,分为交际技能类(如英汉翻译基础、汉英翻译基础、英语口语、英语演讲、应用文写作等)、专门用途英语类(如科技英语写作、法律英语、商务英语口语、文秘英语、学术英语等)、跨文化知识类(如英美社会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报刊选读、英美小说、英美影视欣赏等)和综合提高类(如考研英语、托福英语、雅思英语等)共四类。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可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充分体现了学分制改革的个性化培养原则。新的课程体系如图1所示。

三、我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改革的特点

(一) 层次化与个性化相结合

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着眼于学分制的教学组织模式,打破了以往过于僵化、单一的课程结构。根据学生的不同类别,大学英语必修课实施分层次教学,针对不同类别的学生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选用不同的教材,并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中外合作办学、专升本、艺体专业学生的教学要求明显不同于普通本科学生。实施分层次教学可以使不同类别的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以适应专业学习的需要。另外,学校设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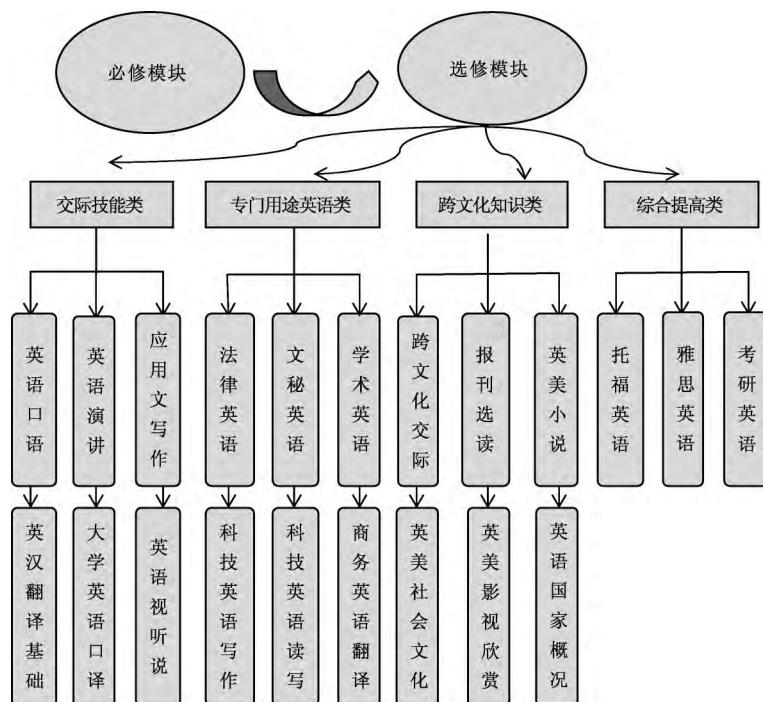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个性化选课机制,学生在修完一年级的通用英语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并结合自己的专业发展需要,自主选修课程库中的拓展课程。这种层次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模式有助于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进一步释放学分制的制度优势,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二) 大众化与精英化相结合

目前,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后期^[3]。作为一所省属高校,我校也经历了外延式扩招的过程,在校生人数已经比扩招前增加了数倍。考虑到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水平,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逐渐出现扁平化趋势。因此,如何在大众化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进行精英人才的培养,成为此次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我校的主要做法是对理工科“英才培养计划”实验班和过控装备专业国际化人才实验班实行“订单式”教学,单独设置课程和培养方案,实行小班化培养,积极探索精英式拔尖人才的外语能力培养模式,为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搭建课程体系平台。

(三) 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

大学英语教学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两种属

性,需要在课程设置中充分体现出来^[4]。此次改革从学分制的特点出发,侧重课程模块的有机结合,在必修通用英语阶段侧重基本语言技能的训练,同时将人文知识有机融入课程内容。在拓展选修课阶段,课程设置逐渐由人文性向工具性过渡,以便让学生掌握职业发展所需的语言知识,同时为学生出国和升学的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课程。人文性课程主要涉及英美文化知识,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工具性课程则侧重培养大学生的学术与职业发展能力。学校开设了具有特色的科技类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及其他个性化的大学英语选修课程作为拓展选修课。另外,学校还实现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授予脱钩,弱化了考试的工具性作用,进一步明确了大学英语课程的性质。这有利于大学英语教学回归到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标定位。

(四) 过程性与终结性相结合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构建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评价体系的改革。以往的大学英语教学受四、六级考试的反拨作用影响,过分注重终结性评价,忽视了过程性评价在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方面的

作用。与终结性评价强调外语学习的结果不同,过程性评价提倡通过课程活动使学生获得发展,其优势是可以通过了解教学的动态过程,及时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案,以便顺利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此次改革形成了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统一的评价模式。过程性评价在大学英语课程评价体系中的比例由原来的 30% 增加到 40%。教师可以采用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记录、网络自主学习记录、学习档案记录、访谈和座谈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观察、评价和监督,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终结性评价的比例则由原来的 70% 降为 60%,主要采取传统的期末考试形式。

四、总结与反思

此次改革进一步完善了我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体现了学分制以学生为主体、尊重个体差异、注重个性发展的现代教育理念。新的课程体系确立了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形成了多层次、模块化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方案,构建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组织形式,建立了科学的大学英语课程评价体系。构建大学英语特色课程体系有利于拓展大学英语教学的领域,丰富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满足学生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

需要指出的是,我校正处于学分制转型时期,在教学组织形式、课程设置和选课机制等方面面

临着一些新的考验,学分制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也制约了我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改革。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 大学英语必修课程虽然进行了分层次教学,但以工科学生为主体的院校体现出多学科特色并不容易,工科生和文科生学习英语的关注点和兴趣点并不完全相同,如何在课程设置中体现这一差异成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2. 选修课模块还不够丰富,由于外语教师知识结构的限制,短时间内开出专业性较强、课程难度较大的选修课还存在困难。3. 必修课的学分由 12 学分减少到 8 学分,而选修课没有限定最低学分,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这可能会导致部分学生在学完第一年的必修课程后,在第二学年放弃选修英语课程。而当学生进入高年级阶段,由于较长时间没有学习英语,语言能力会出现磨蚀现象,难以适应专业英语的学习。这些问题需要随着学分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通过不断优化和完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加以解决。(文字编辑:李丽妍)

参考文献:

- [1] 叶飞帆. 学分制实现模式与应用型人才培养[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5(6): 106-111.
- [2] 尹洪山. 学分制改革对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影响[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6(10): 97-98.
- [3] 柴如瑾. 我国高教进入大众化后期, 终身学习将成常态[N]. 光明日报, 2017-09-09.
- [4] 王守仁.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要点解读[J]. 外语界, 2016(3): 2-10.

(上接第 44 页)过程式考核,认真研究考试内容和方法。(文字编辑:李丽妍)

参考文献:

- [1] 钱厚斌. 创新人才培养视界的高校课程考试改革[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9): 145-147.
- [2] 薛素铎, 兰劲华. 工科专业课考试改革与学生工程实

践和创新能力培养[J]. 中国高教研究, 2010(6): 80-81.

- [3] 教育部. 关于批准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的通知[A/OL]. 教高函[2010]7 号.
- [4] 教育部. 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A/OL]. 教高函[2011]1 号.
- [5] 李霄.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的应用与思考[J]. 才智, 2014(12): 52-53.

模态间性视域下的转译及其对二语学习者 转译能力发展的作用

○ 刘靖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人类交际具有多模态性, 不同模态的表意功能可根据不同的条件互相转化。模态间性是转译(转换与转导)的哲学基础, 意指意义能在不同模态之间及同一模态内部诸元素之间转移。转译的本质是在情景和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的约束下, 对形式和意义进行重构和再设计。从模态间性的角度出发, 构建了多模态话语转译的理论模型, 拓宽了传统翻译单模态的研究视角, 提出了语图转译的定译策略和接译策略。这为培养二语学习者在多模态语篇时代的转译能力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模态间性; 语图转译; 定译; 接译; 转译能力

[中图分类号] D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72(2019)01-0104-07

DOI:10.16800/j.cnki.jqstss.2019.01.018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 transd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odality and its effect on L2 learner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development

LIU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Human communic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ultimodality, and the ideographic functions of different modalities can be transform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while intermodality i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 transduction) which means the meaning moving across different modalities and different elements within the same modality.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i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designing of form and meaning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situational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odality,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ranslation which extends the monomodality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anchorage strategy and relay strategy of trans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image,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2 learner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which is essential in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era.

Key words: intermodality; language-image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 transduction); anchorage strategy; relay strategy; translation competence

人类的交际活动是由语言、图像、手势、空间等多种模态协同耦合而共同完成的。从符号学角度来讲, 交际是通过符号的设计、生成、传播、解读和再设计来完成^[1]。所以设计者总是会通过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可利用的设计资源, 选择最佳的模态或模态组合来成功实现交际, 并通过再设计开启新一轮

的意义生成。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一样, 也具有意义潜势, 也是生成、表达意义的源泉。而作为表意手段的能指, 其不同符号的表意功能依据不同的条件可以互相转化, 亦即在特定语境中可以由一种或几种模态来表达的意义, 也可以在另一种语境中由相同或不同的模态来表征。那么这种转化必然会导致模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8CWZJ21)

[收稿日期] 2018-11-12

[作者简介] 刘靖(1974-), 男, 山东威海人,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态形式和意义的变化。譬如,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语言的学习日益呈现多模态化,二语学习者在释读和建构多模态语篇时就会涉及不同程度的转译,而模态转译也因此会成为二语学习者在多模态话语时代必须培养发展的能力之一。基于此,本文拟从模态间性理论视角,以语图转译为例进行探讨。

一、模态间性理论

间性理论(inter-ness)源于生物学概念intersexuality,指的是对某些雌雄异体生物兼有两性特征的现象所进行的一种论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其哲学理论基础。自20世纪以来,间性理论在人文学科各领域逐渐凸现而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共识。学者们通过研究主体之间的交互性而赋予一个关系结构中诸关系项的平等地位,以强调处于一定关系结构中的诸关系项之间的共存性、平等性、对话性、融合性和动态性。主体间性哲学观是基于对笛卡尔“主体优越论”“主客二分”等主体性哲学的解构而提出的,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衍生了相应的理论视角,如媒体间性、文化间性、网络间性等。模态间性是基于人类交际的多模态性而言的。

在多模态话语研究中,人们通过整合和编排多种不同的模态资源进行交际,各模态之间的协同共存、交流互动和意义共生等特征即为模态间性。也就是说,在多模态语篇的构建和解读过程中,图像、文字、声音、手势等诸模态之间以及各模态内部诸元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协同互动的动态关系。模态间性理论的提出,为研究话语意义在不同模态之间及同一模态内部诸元素之间的转换、移动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多模态话语的研究拓延了新的研究视野。而模态的间性特征,也使得二语学习者在语言模态内部,以及语言与其他模态之间进行的转译成为可能。

二、转译的相关研究

转译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在翻译界,国外学者R. Jakobson早在1959年就注意到跨类翻译或符变(transmutation)现象,提出了翻译的三分法:语内翻译(intrala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a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Jakobson认为翻译活动涉及人类文化传播和交际活动的各个层面。其中,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部的解释活动;语际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阐释;而符际翻译则是指“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

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手势变成言语表达”^[2]。在媒体数字化的“读图时代”,符际翻译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之间全面、动态的转换。

在分析多模态话语时,Iedema提出“再符号化”(resemiotization)的概念,认为意义在不同语境或不同模态间的转移是一种再符号化的过程。再符号化研究与多模态话语分析存在着互为补充的关系,相较于多模态话语分析注重的是针对模态间性特征的研究,再符号化则关注在研究社会活动的进程中,如何将一种形式的符号被“翻译”(再符号化)成另一种形式,以及某些符号(而不是其他)为何能在特定时期被调用来实现特定目的^[3]。所以再符号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而其动态的社会意义的构建,也使得再符号化后的意义更为具体和持久。例如南非学者Stein在小学开展的“新故事”(Fresh Stories)项目。在此项目中,Stein通过研究学生的多模态故事讲述作品,发现各种表意符号能自行形成一条“符号链”(semiotic chain),即学生从口语的初始概念,到书面语和图像的人物形象,到3D实体的人物玩偶,再到对话动作的短剧表演,最后到书面语完成故事创作,每一阶段都是符号链上的切换点。亦即符号的每一次切换都是对学生创造力的激发,而且伴随着每一种符号或符号组合变异潜势的显现,新的表意符号会不断出现,从而导致这条符号链条无限地延长。但是Stein的研究也揭示,虽然每次切换后的符号形态相对固定,但其表达的意义却具有不稳定性^[4]。

Wyatt-Smith和Kimber在研究多模态语篇的评估中,使用了“转模态操作”(transmodal operation)这一术语。转模态操作是指意义构建者在创建数字多模态语篇或进行多模态交际时,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模态,甚至是不同的技术平台之间移动的一种现象^[5]。所以,这种移动和切换需要有较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而对于多模态语篇的创建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转模态能力”(transmodal facility),即是一种既能在源语篇、技术平台、模态表征之间,通过恰到好处的好处转换处理而生成新的数字语篇的能力;也是一种能在新的语篇中,对源语篇内容和概念的批判性转换与审美设计力求达到最佳的平衡的能力。

Lemke认为研究多模态不仅要了解多种符号系统和资源如何协同表意,还要关注社会媒体对表意方式的塑造和影响,特别是要注重跨越不同媒体和

语类的意义构建。在构建媒体、认同和政治经济关系理论框架时,他分析了两种社会现象:“跨媒介”(transmedia)和“遍历”(traversal)。前者指跨越语类和媒介的互文意义网络,后者指跨媒介、语境、场所和机构的意义构建和生活方式^[6]。所以,Lemke认为多模态的研究应予以拓展,应将社会媒体的使用者和制造者的行为及其互动,以及社交媒体在跨媒介融合中的作用都纳入到研究视野。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符号学理论,Kress拓展了translation的内涵,提出“转译”的概念。所谓转译(translation),Kress将其界定为:意义在同一模态内部,不同模态、不同模态组合之间的转换和移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Kress认为它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文化间语言模态内的意义转换。所以,Kress又将转译划分为转换(transformation)和转导(transduction)两种形式^[7]。此处的转换,指的是在同一模态内,由模态内部各成分的重新排列组合而实现的意义转移。譬如,在转述朋友的口信时,把汉语译成英语,就是意义在语言这个模态内的转移,但这种转译是通过语言成分的重新排列组合而实现的。而转导则是指在不同的模态之间发生意义转移,譬如,把一首诗改编成歌曲,就是意义从语言模态向语言、声音等模态组合的转移过程。

Newfeld探讨了转导(transduction)过程中的多维转换(transformation)过程。Newfeld认为多维转换包括模态实体、体裁、意义、主体性等的转换,是旨在揭示跨模态符号活动的情境性^[8]。Newfeld用社会符号学的方法,通过口语、书面语、图画、刺绣等形式,使诗歌在教学过程中“再模态化”(remodalize),从而实现不同的模态资源与学校课程的有效融合。

国内学者对多模态话语中转译的研究不多,其中张德禄、瞿桃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为理论基础,以英语课本和英语课堂多模态话语中的转译现象为例,分析了模态转译的影响因素,以及由转译引起的意义变化和交际效果,并对转译研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进行了探讨^[9]。

三、多模态话语转译理论模型

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意义在模态内部和模态之间的移动现象进行了阐述,但总的说来,研究的侧重点都是关于不同模态间的意义转换,而系统、全面的研究较少。基于Kress提出的转译概念,本文构建了多模态话语中模态转译的理论模型

(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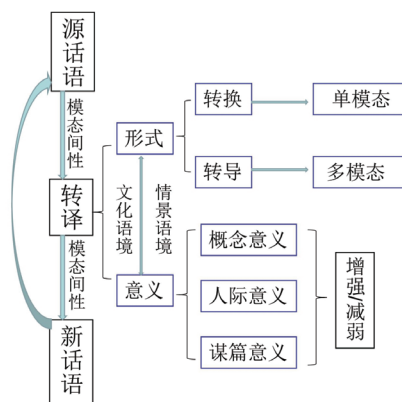


图1 多模态话语模态转译的理论模型

在图1模型中,模态间性是转译的哲学基础。在多模态话语时代,各类交际语篇具有多模态性,所以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无论是源话语还是转译的新话语,其意义的生成往往需要文字、图像、声音、色彩、姿势等多种模态的互动耦合和协同表意。因此,模态内部诸元素及各模态之间的平等共通、相互依赖的间性特征,是源话语意义能在同一模态内部或不同模态之间实现转译的前提条件。

形式和意义的重新设计是转译的本质。长期以来,基于语言交际的单模态性,设计这一概念未能进入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但随着数字传媒技术的发展,多模态交际成为常态,而设计也因此成了语言交际的关键因素。图1模型中的设计是指符号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运用特定文化背景下可利用的模态资源进行符号设计,并在特定的媒介和语境下生成话语,以满足交际需要的一种活动^[10]。而设计作为一种意义在模态或模态组合之间进行分配的过程,则体现了意义构建的动态性特征^[11]。因此,二语学习者在转译生成的新话语时,必然会由于学习者/设计者的兴趣、知识背景和交际意图的不同,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产生相应的动态变化。

语境因素制约着源话语到新话语的转译。图1模型中的语境制约因素,首先是指社会文化语境,即转译活动所属的社团文化规约和社会历史背景。所以在转译过程中,译者既要明确转译目的、遵循设计规则,也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内,合理地选择、重组符号资源,从而保证转译的顺利进行。其次是情景语境。它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分别制约着转译过程中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的构建。其中,由于语场是转译活动

的核心主题,所以要求二语学习者在进行转译实践时要紧紧围绕主题,根据不同的交际需求,调用可用的设计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再现意义;语旨作为转译活动中新话语的设计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要求二语学习者在转译的过程中既要充分了解新话语受众的需求和接受程度,也要适时调整转译策略;句式作为新话语的呈现方式,是设计者对符号资源的选择、调用、重组和编排,因而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只有充分考虑各表意模态之间以及模态内部不同媒介之间的互补制约关系,才能在转译过程中,以最佳方式呈现新话语。从图1模型的语境因素来看,社会文化语境投射于情景语境,而情景语境制约意义转移并呼应文化语境,所以转译只有在这两种语境的互动下才能得以实现。

转译首先在于“转”(trans-),即从一种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亦即只有当“转”发生在同一模态,且该模态内部诸元素由于历时或共时的原因而须重新排列组合时,该模式方可称为“转换”,诸如音乐曲目的改编、文学作品的改写,等等。转换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多样,但却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意义在单一模态内发生的转移。以语言模态为例,转换可分为语内转换和语际转换。其中,语内转换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由于语言的历时变化而产生的转换,譬如古汉语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再或者是由于语类体裁的变化而产生的重新表述,譬如二语学习者将英语诗歌体转换为叙事体。语际转换指两种语言的共时转换,即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如汉语译成英语。语内转换和语际转换有时是相互依赖而交织在一起的,譬如儒家经典作品的英译,就涵盖了“古汉语→现代汉语”(语内转换),“现代汉语→英语”(语际转换)这两个过程。其中语内转换是语际转换的基础,而语际转换则决定了语内转换的传播效果。

其次,转译的形式还在于“转导”(transduction,亦有学者译为“联通”)。转导意义上的转换是跨模态的,它契合了人类表意的多模态本质。转导在英文上表达的词根“-duct”意为“引导”,即将意义从一种模态引进导入另外一种或多种模态,因而转导可以是两种模态之间的意义阐释和再呈现,譬如图像和文字的相互转导;也可以涉及多种模态,譬如二语学习者将课文改编拍成视频短剧,或将文字叙事转换成音乐和舞蹈表达等。转导与Jakobson提出的符际翻译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在跨文化的语际转换中,它们可以弥补由于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原

因造成的信息缺失。譬如中国古典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同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中国的很多古典诗歌的英译,直接进行语际转换并不能使译文的外国受众真正理解和感受其意象和诗境。如果能在文字转换之外,假以与之相应意蕴的国画作为辅助的图像符号,摩画出古诗中特有的意境,那么,中国文化的传播将更为全面透彻而富有新意。所以转换与转导只有相辅相成,才能协同完成意义在模态内部以及模态之间的转移。

意义的转移是转译的核心。在转译过程中,由于新话语和源话语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不同,加之受模态媒介供用特征的局限,以及转译者的兴趣、知识和交际目的差异的影响,必然会导致转译的概念、人际和谋篇这三个层面意义上的变化。概念意义是转译活动的重中之重,而译者也只有通过重复、同义、反义、上义、替代、搭配、缩减、拓延等转译手段,才能使源话语的概念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转译无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对等再现,但却契合了交际活动的目的需求。人际意义体现的是新话语的社会交互性。虽然交际语境和各模态供用特征的不同,但转译后的新话语在度值、情感、判断,以及与受众的社会距离和互动方面都会产生变化,从而实现不同效果的人际意义。基于谋篇意义的变化是由新话语的呈现方式不同而引起的,所以,在转译再设计过程中,语篇信息值、突显度、框定程度、时空路径等的不同,都会影响新话语的连贯和衔接,并进而改变新话语谋篇意义的实现。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三个层面意义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增强或减弱。

基于模态间性的转译理论模型的构建,有助于二语学习者对多模态化的源话语进行有效的转译,尤其是能够为二语学习者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转译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切实指导。

四、二语学习者语图转译能力发展

随着网络媒体、数字媒体、移动媒体、虚拟媒体和各种自媒体的勃兴,作为人类表意最常见的两种交际模态,语言和图像的相互转译成为常态。正如芝加哥大学的Mitchell所言:“语言和图像之间的辩证法似乎是符号之网中的恒定因素,一种文化就是环绕着其自身来编织的。变化的恰恰就是编织法的特性,是经纬关系。”^[12]因此,语图之间的转译有着深厚的间性基础。

(一) 语图转译的基础

语言文字和图像是两种属性不同的表意模态。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线性的、重时间顺序,且具有自指功能和稳定结构的符号,能够揭示隐藏于表象之下的深层意象,所以语言文字带有明显的理性建构原则;而视觉图像作为一种非线性的、重空间排列、不具有自指功能的结构性符号,只与消费主体的直观感性和视觉享乐密切相关。作为表意符号,语言文字和图像在意指过程中具有共同的属性,即它们都具有指号功能,都是对指称对象的一种象征或特征的揭示,且都具有“衍生性”,即可通过各自内部诸元素之间的连接、组合、汇聚、协同而衍生出新的属性或意义。

语言文字和图像在功能属性上的相似性,为实现语图之间的相互转译提供了前提,而语言文字的“可视性”和图像的“可读性”则构成了语图转译的基础。首先,语言文字的视觉性毋庸置疑,因为“语言本身就内含一种图像,即语象,它与语音联结,文字不过是用线条把语象模仿并固定了下来。”^[13]中国汉字始于象形,美学史历来崇尚“诗中有画”,诸如“大漠、孤烟”的空旷和“长河、落日”的雄浑。西方哲学也认为,理性的语言命题与命题所表现的事态具有摹画关系,同一事态可以有不同的摹画,这些事态构成了世界^[14]。诚然,受“经济原则”的制约,人类语言的发展由“冗长单调”走向“简明形象”,而语言愈“生动”,其视觉性和画面感则愈强。其次,“读图”已成为常态的阅读体验,图像的可读性不言而喻。从本质上讲,所谓的“读图”是图像借助语言而实现的自我言说,是在意义共享的层面,将图像的表意功能“滑向”语言,从而使得图像的受众对图像“以图言说”意义的接受过程。换言之,图像之所以“可读”,是因为图像中的表意要素,亦称为“图符”,它兼具图像和语言的属性。在图像的识读过程中,读图者的感知系统通过“滑向”这些图符的语言文字属性,使其中蕴涵的意义转化为语象,最终被理解和感知。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讲,每一幅图画都是文字,因为每幅画总代表一事物……然而一幅画在本意上是不会变成一篇文字的,除非那幅画已失去原来的目标,而仅在于说明某种意义。绘画的本来目的是印象,文字的本来目的却在说明。”^[15]新媒体语境中,语图的这种“间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各类“聚合型语图文本”意义的交互共生过程中,并在表意实践中实现语图模态间“语言描绘”和“图像言说”的多元互动与相互转译,正

所谓“图像引起词语表达,而词语则在一种无限的运动中引起图像”^[16]。而语图模态各自的可供用特征(affordance)则决定了语图转译的不同策略。

(二) 语图转译策略

语图互动转译过程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和迭示性。在语图转译策略方面,学界多沿用语际转换,即传统翻译术语,如直译、意译,异化、归化。但语图转译确切地说是一种跨模态转导,无论是语言对图像的释解,还是图像对语言的示例,都是有选择的,所以无法完全对等,但在意义上却也是一种互补。显然,语际转换策略术语不能涵盖语图转译这一复杂而又独特的翻译过程。Barthes的图像修辞理论认为语图之间存在着三种阐释关系“锚定(anchorage)、说明(illustration)和接递(relay)”,即语言表述可以锚定图像意义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拓展、细化图像的意义;图像可以阐释说明文字语篇;但语图在表征意义上则始终处于一种互补接递的状态。

基于此,本文将语图互释转译策略整合为定译(anchorage)和接译(relay),以期为二语学习者进行语图转译实践时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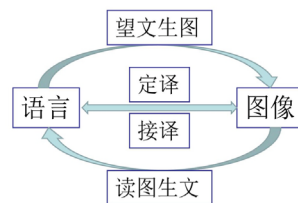


图2 语图转译策略

图2中的定译策略主要是应对图像意指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图像具有多义性,其能指蕴含系列‘滑动’所指,图像释读者需对其所指进行选择,……每个社群都发展出稳固图像所指滑动的许多技巧,以抗衡符号不确定性引起的恐慌,语言便是手段之一。”^[17]在从图像到语言的转译过程中,受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以及释读者知识背景、主观需求等因素的制约,对图像指示意义的阐释具有选择性,旨在对图像多义性有意或无意的限定,以使意义的滑动“定”在某一视角或层面,从而实现图像意义潜势的实例化。语言到图像的转译,是为了使原本模糊的指涉形象化。但由于图像自身能指的局限(如逻辑关系、时间维度和心理状态的表达),图像对语言的阐释往往表现为示例或截图。“用图像清楚无误地表达任何事情都是十分困难的。”^[18]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语言到图像的转译就是图像对语言

多层意指的选择和瞬间定格。

接译策略是对定译策略的补充接递。语图模态各自的能指局限决定了语图转译过程中意义递补的必要性。如果说定译转译的是一种显性能指,那么接译转译则是对隐性的指涉。在图像到语言的转译中,语言接译递补的是图像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使图像的意义进一步生动丰满,而“探索图像的意义,还要意识到图像是动态的社会权利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图像是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图像而产生,并在图像中得以体现。”^[19]在语言到图像的转译亦是如此,图像也可“补充和充实语言叙述”^[20],并通过递补语言叙述中的背景、形象、文化和意境的不在场,使原本间接或暗示的语言指涉得到彰显固化。

可见,定译是对语图所指多义性的选定,接译是对语图能指局限性的递补,二者在语图转译过程中彼此制约,相辅相成。比如Leo Lionni的经典绘本Swimmy封面标题(见图3)的转译,从表面上看,这是英语到汉语的语际转换,但其实却隐含着图像到语言的转导。首先,swimmy一词多义,语际翻译策略的音译和意译都无法起到吸引读者和预示内容的作用,但封面背景图像中的深海、红鱼群以及醒目位置上独游的一条小黑鱼则为标题的转译起到了限定作用。其次,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层面而言,小黑鱼的颜色和位置的与众不同,预示着它可能是故事的主人公;在英美文化中,名字后面为了表示亲昵往往加“y”,而事实上Swimmy正是这条小黑鱼的名字,为了使新话语的小读者更易于接受,绘本的标题便转译成了《小黑鱼》,这样既契合了目的语篇的文化,也使封面语图浑融一体。



图3 语图转译实例

由此可见,无论定译还是接译,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等转换,而是基于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的重构和再设计。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同一模态

内的转换,更多的是跨模态的转导。虽然“对等”是翻译活动的根本,但设计者(转译者)的介入,必然会带来不同的阐释(选择和递补)视角,从而使转译语篇在概念意义,人际(互动)意义,谋篇(构图)意义上都会有所变化。定译与接译策略的提出,对二语学习者进行语图转译实践,发展转译能力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三) 二语学习者转译能力的发展

在学界,翻译(转译)能力的多元观逐渐得到学者认可。如Neubert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主题能力和转换能力^[21]。吴赞则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技能、百科知识、转换能力等方面^[22]。笔者认为,这里的转换能力应涵盖语言模态之间、语言模态与其他模态之间的转换两个层面。在多模态话语时代,语言与非语言模态之间的转译能力尤其应引起学界的重视。

New London Group在阐述学习者多元识读能力培养时曾提出四个方面的实践模式框架:1.情景实践。即浸入实际情景,运用已有知识,进行仿真操练。2.明确指导。即通过明确的元语言指导,使学习者系统地、分析性地、有意识地理解实践任务。3.批判性框定。即使学习者从社会文化语境的视角来批判性地、建设性地看待实践任务。4.转化实践。即学习者反思、内化所学的知识,并创造性地应用到不同的实践语境^[23]。对二语学习者来说,交际语篇的多模态化使翻译活动不再仅限于语言模态的转换,还应包括语言与其他模态之间的转导。尤其是在二语环境下,基于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语图跨模态转译实践,应是发展二语学习者转译能力的不二之选。

基于New London Group的实践框架,二语学习者转译能力发展亦可分为以下四个过程:1.转译实践。二语学习者运用已有知识结构,对含有图文的不同语类的多模态语篇进行转译实践,特别是图像→语言,或语言→图像的转译操练。2.明确指导。二语学习者进行转译实践时需要从理论方面得到明确的指导,包括多模态话语转译的元语言,图文转译的哲学基础以及定译、接译转译策略等,使学习者系统了解语言与图像模态的可供用特征,以便在转译时运用相应的策略。3.批判性框定。二语学习者在进行多模态语篇转译时应从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着眼,批判性地分析、评价、反思自己或他人的转译实践,特别是二语与一语环境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对语图转译带来的影响。4.转化实践。二语学习者通过对转译实践、明确指导和批判性框定环节对所学知识的进一步反思,把利用语图模态构建意义以及相互转译的能力固化提升,并在不同的语境中用于新的转译实践。这四个过程彼此联结,相互促进,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可以在不断进行二语语图转译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二语学习者多模态话语转译能力的累积式发展。

五、结语

传媒技术的发展,使除了语言之外的其他模态在交际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并赋予了转译研究新的内涵。表意模态的间性特征拓延了翻译活动的研究视角,奠定了转译的哲学基础。作为人类交际活动中最基本的两种表意模态,语言的“可视性”以及图像的“可读性”使语图转译成为可能,而定译和接译转译策略的提出,不仅能为二语学习者进行跨模态语图转译实践,也为其累积式发展转译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更为新媒体时代,译者和学者全面认识转译现象,科学构建转译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Kress G, Van Leeuwen T.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Hodder Arnold Publication, 2001:5-8.
- [2]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M] // Reuben B. On Trans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2-239.
- [3] Iedema R. Multimodality, resemiotiz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3, 2 (1): 29-57.
- [4] Stein P. Multimodal Pedagogies in Diverse Classrooms: Representation, Rights and Resourc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98-120.
- [5] Wyatt-Smith C, Kimber K. Working multimodally: challenges for assessment [J].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 2009, 8 (3): 70-90.
- [6] Lemke J. Transmedia Traversals: Market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M] // Baldry A. cMultimodality. Campobasso: Palladino, 2011: 576-596.
- [7] Kress G.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0: 129-130.
- [8] Newfeld D. Transformation, transduction and the transmodal moment [M] // Jewitt C.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Abingdon, Oxon; Milton Park,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14:100-115.
- [9] 张德禄, 瞿桃. 多模态话语中的转译现象研究——以从大学英语课本到英语课堂教学的转译为例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5 (6): 17-23.
- [10] Van Leeuwen T.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05: xi.
- [11] Jewitt C. Multimodality and literacy in school classrooms [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08, 32, 241-267.
- [12] Mitchell W J T.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43.
- [13] 赵敬鹏. 再论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3 (5): 156-162.
- [14] 刘靖. 模态耦合视域下的图像识读 [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 91-95.
- [15]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150.
- [16] 玛蒂娜·乔丽. 图像分析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133.
- [17] Barthes R. Image Music Text [M]. Stephen Heath (Ed. and trans).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39.
- [18] 阿瑟·阿萨·伯杰. 眼见为实——视觉传播导论 [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 79.
- [19] Sturken M, Cartwright L. Practices of Looking: 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21.
- [20] Oittinen R. From thumbelina to winnie-the-pooh: pictures, words, and sounds in translation [J]. Meta, 2008; 53 (1): 76-89.
- [21] Neubert A. Competence in language, in languages, and in translation [M] // Schaffner C, Adab B.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0: 3-18.
- [22] 吴赞. 翻译能力建构与中译外人才培养 [J]. 外语学刊, 2015 (1): 148-153.
- [23] The New London Group.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6 (1): 60-92.

[责任编辑 祁丽华]

学分制改革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影响

○ 尹洪山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 学分制改革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构建个性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不仅有助于创新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而且能够满足社会对不同行业人才的多元化外语能力需求。文章阐述了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从课程定位、课程设置、课程资源等方面论述学分制改革对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影响。

[关键词] 学分制; 需求分析; 大学英语; 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 H3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6)10-0097-02

学分制作为与学年制相对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最早发源于18世纪的德国,后为许多国家所效仿,目前已经成为国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近年来也成为我国高校教育制度改革趋势之一。^[1]学分制遵循以学生个体发展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教育理念,在这种教学管理体制下,教学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为前提,教学计划具有较大的弹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安排个人的修学计划,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突出人才培养的个性化,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多样性需求。

山东省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高校学分制改革的意见,但当时的改革并没有突破学年制的局限,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并没有完全落实。2013年秋季,山东省在7所高校进行学分制改革试点,开始向完全的学分制过渡。2015年,学分制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省内高校逐步推广。学分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创新课程教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通过设置多个方向选修模块,增强学生选课的指导性。大学英语作为高校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在学分制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大学英语课程体系面临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历经数次改革,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课程设置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破解。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职业需求与大学生外语能力之间的矛盾。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的职业需求。因此,高校的公共英语教学应当始终围绕社会对人才的外语能力要求,在课程设置方面及时做出调整。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社会对英语的需求

比较单一,多侧重文献的阅读和翻译,当时的课程设置则以培养阅读能力为主。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社会对英语能力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增长和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英语能力要求进一步提高。例如,根据胡学文等的调查,用人单位对英语的需求总体比较强烈,但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外企业对员工的英语能力要求较高,需要大部分员工或全部员工掌握较好的英语应用能力,而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只需部分员工掌握英语。就语言技能而言,调查单位对听说技能的需求最大,也最为重要,其次是翻译技能、阅读技能和写作技能。^[2]针对大学生英语能力需求的变化,高校的公共英语教学应主动改革现有的课程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

2.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课程内容之间的矛盾。大学英语教学除了需要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外,还要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大学生入学时的英语基础差异较大,自己期望达到的英语水平也不尽相同。另外,学生的个体差异决定了其对不同的语言技能和语域会有所侧重,而这恰恰是过去的大学英语教学所忽略的方面。无论是在教学大纲还是在课程设置方面,都未能充分体现学习者的这种个性化需求。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韩东围绕大学生英语学习需求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调查,发现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后,学术英语和通识英语共同构成了其新的学习需求。^[3]蔡基刚研究了学习需求对大学英语教学定位的影响,认为随着我国中学阶段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部分高校的公共英语教学开始从传统的综合英语或基础英语定位为专门用途英语。^[4]祝珣、马文静

[基金项目] 山东省教育厅本科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基于学生多元化需求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2015M084);

青岛科技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学分制背景下的大学英语个性化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2014142)。

[作者简介] 尹洪山,男,山东济南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对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课程设置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高年级学习者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需求显著大于低年级学习者,不同专业学习者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需求差异与其专业具有相关性,说明学习者的需求呈现复杂性、个性化、多样化趋势,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5]

3. 课程设置与教师知识结构之间的矛盾。在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是基础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基础阶段教学之后,学生面临着与其专业相关的专门用途英语的学习需求,大学英语教学要在拓展选修课的设置方面适应这一需求变化。专门用途英语涉及面广,涵盖机械、建筑、化工、农林、地矿、航空、经贸、法律等不同学科,虽然并不要求大学英语教师精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对教师深入领会教材内容、提高授课质量至关重要。

然而,长期以来,大学英语教师的来源主要是高校外语专业的研究生,在校时主要学习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知识结构比较单一。^[6]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学英语教师队伍短期内实现知识结构重组存在较大的困难,一方面,有些教师由于年龄原因失去了通过攻读学位完善知识结构的机会,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年轻教师通过读博获得了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但也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很多高校在应聘职称时要求教师所学专业应当与所任教学科一致,导致一些大学英语教师在获得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后,申请调离大学英语教学岗位,到相关的学院任教。因此,大学英语教师的知识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与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之间的矛盾也愈发突出。

二、学分制改革对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影响

学分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实施弹性学制,学生可以在教学计划的指导下,自主选修课程,教学管理过程具有灵活性。高校实施学分制之后,现有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1. 对大学英语课程定位的影响。从课程的地位来看,大学英语是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大学英语课程也是高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教学既要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交际能力,也要注重人的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鉴于学分制的弹性制度设计,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也会体现出不同的校际差异和学习者的个人差异。因此,随着学分制的实施,大学英语课程必然要着眼于学校的办学目标,院系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大学英语课程定位的这一变化适应了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和学习者需求个性化的趋势,学分制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保障。学分制改革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实施学分制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创新,也是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创新的良机,有利于体现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和目标。另一方面,学分制改革也为学校内部不同院系的人才培养提出不同的要求,在学分制背景下,不同院系之间开设的外语课会体现出不同的学科特色,对外

语技能的要求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英语教学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培养适应不同学科发展的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学分制改革着眼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潜力,适应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大学英语课程的定位必然会发生变化,以回答“老师教什么、如何教;学生学什么、如何学”这个关键问题。

2. 对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的影响。学分制的核心是选课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在符合学科规律的基础上,应当充分体现出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对大学英语课程来说,传统的英语知识和技能课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要,大学英语课程设置需要进一步优化。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需要适应学分制这一动态的教学管理模式,在选课制的框架内对已有的课程进行优化,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内容。不过,在传统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课程的设置比较单一,主要开设必修的语言技能课,课堂教学在于帮助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随着学分制的实施,原有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这是因为,一方面,基于学制的弹性设计,学生可以自主决定修业年限,自主选择课程模块,过去那种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已经不能适应学分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学分制也赋予了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学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因此,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与其职业规划的关系会更加密切,这也对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从学分制改革的初衷来说,其目标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应当充分体现这一教育理念的转变,通过课程体系的创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历来是改革的难点问题,学分制改革应充分考虑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和持续性,处理好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好课程模块之间的合理衔接,构建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体现不同院校特色的动态开放的课程体系。

3. 对大学英语课程资源的影响。教学资源是为开展大学英语教学,拓展学习空间,支持课程管理等提供的直接教学条件,涉及教材、读物、网络资源等软硬件环境。学分制改革涉及面广,在实施过程中原有的教学资源配置方式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何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习需求进行优化整合,进而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是改革中需要突破的一个问题。

大学英语作为高校重要的基础课和公共课,通过学分制改革可以实现原有课程教学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学分制提出的跨专业、跨学部、跨院校选课,学分替代与互认、学分预警等,有利于专业之间、学部之间、跨院系的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文理渗透、克服师资短缺与办学条件的不足。此外,还可以借助网络资源搭建的学习平台,营造内容丰富的多媒体语言学习环境。通过建设和使用微课、慕课,利用网上优质教育资源改造和拓展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实施基于课堂和在线课程的翻转课堂等混合式教学模式。

(下转第 104 页)

估量进行考核。这种考核办法的弊病就是难以精确考查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学生很容易凭借最后的突击学习过关。而新的考察办法则加大过程考察在学生考核中的比重,考察方面精细化到若干方面。这样,既可以督促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提高学习动力与兴趣,又可以对学生形成一个科学的考核结果,便于掌握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

2. 建立新的试卷架构模式。原来的试卷各部分权重比中客观题占很大部分。客观题虽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核学生学习的效果。但是相比较而言,主观题可以较为真实、客观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状况。因为完成这种题型往往需要学生综合应用所学语言知识。

3. 赋予学生一定的考核评价权利。在讨论课环节,非值周的同学对值周同学进行评分考核。这就使得学生们能从一个不同角度审视别的同学,审视本课程的这一环节。这样不仅让学生加深对课程的了解,也可以促进学生积极深入地参与到课程中来。

4. 学生对新的教学模式有较高的认可度。在本课程进行的期末考试中,设置了一道题目,针对学生对本课程的看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学生对新的教学模式持认同的态度,尤其是对讨论课的认同度较高。

5. 学生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和思辨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也有了相应提高。

(上接第98页)

需要指出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学分制改革后很多高校开始大幅度压缩英语课堂教学的时数,从而产生教学任务与课堂教学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导向,组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丰富英语学习体验,拓宽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此,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课堂教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自主学习路径和丰富的自主学习资源,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从而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内课外相补充的课程学习体系,使英语的教与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发展方向发展。

三、结 语

基于学分制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构建个性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不仅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而且弥补了以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学分制所倡导的差异化培养模式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有利于调动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真正实现外语教学的

少数民族地区汉蒙生混合班基础课程“综合英语”教改虽然有所收获,但是要形成较为全面、深入、科学的认识,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每个学科有其自身独特的情况和规律,此次教改做了有益的尝试工作,为英语学科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探索做出些许努力。教改后多环节形成的大量任务对教改教师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应建立硕士研究生助教制度,分担教师过大的负担;还应加大教师培训学习的投入,加强与区外同类院校的交流,从中获取更多的有益经验。

【参考文献】

- [1]梁亦华.从教师角度看影子教育对师生之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2014(4).
- [2]孙云梅.大学综合英语课堂环境调查与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6).
- [3]王晓如,负大强.第二课堂与课堂教学关系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1).
- [4]王茁.美国教学改革对我国综合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18).
- [5]文旭,夏云.全人教育在外语教学中的现实化[J].外语界,2014(5).

因材施教原则。另外,通过构建大学英语特色课程体系,有利于拓展大学英语教学的领域,丰富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满足学生对大学英语教学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 [1]叶飞帆.学分制实现模式与应用型人才培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6).
- [2]胡学文,吴凌云,庄红.大学英语社会需求调查分析报告[J].中国外语,2011(5).
- [3]韩东.学习者需求调查对新一轮大学英语教改方向的启示[J].大学教育,2013(10).
- [4]蔡基刚.从通用英语到学术英语——回归大学英语教学本位[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1).
- [5]祝珣,马文静.课程设置的学习者需求分析——基于大学公共英语课程的研究[J].外语界,2014(6).
- [6]高战荣.大学英语教师知识结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高阶二语习得手册》述评¹

尹洪山 于梦初

青岛科技大学

© 2020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原名《中国外语教育》) (1), 82-85 页

提 要:《高阶二语习得手册》(*The Handbook of Advanced Proficienc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一书聚焦第二语言的发展问题,从多重维度描述了高水平学习者的语言特征及个性差异,深入研究了影响第二语言水平变异的复杂因素。本文在介绍该书主要内容的基礎上,从前瞻性、新颖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简要评价其学术价值,以期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 第二语言; 高阶水平; 发展; 变异

[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105(2020)01-0082-04

1. 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期间衍生出各式理论假说和概念模型,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影响二语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不过,学者们更加关注二语初始状态中的习得问题以及后续的动态变化(如de Bot 2008; Lenzing 2015; Schwartz & Sprouse 1996),针对稳定阶段的高水平学习者所作的系统研究比较匮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国际社会对高水平的二语人才需求不断增强。在这一背景下,二语习得研究的趋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围绕高水平学习者及其语言特征的研究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并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著作,如Brown & Bown(2014)、Hyltenstam(2016)等。为了反映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Wiley-Blackwell出版公司于2018年推出了由P. A. Malovrh和A. G. Benati主编的《高阶二语习得手册》(*The Handbook of Advanced Proficienc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一书。该书共28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高级阶段的学习者特有的语言习得规律和研究发现。下面首先介绍该书的主要

内容,并作简要评价。

2. 内容简介

在绪论(第1章)部分, Malovrh和Benati首先介绍了该书出版的意义。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学术和专业领域的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特征及其习得规律,但是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检验。该书在文献梳理、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一部分“高阶二语能力:习得理论面面观”由六章(第2—7章)内容组成,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讨论了第二语言高阶水平方面的话题。第2章首先阐述了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和语言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了高阶二语水平在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功能中的语类特征。第3章从心理语言学视角讨论了句法分析和一致性加工与高阶二语水平的关系,不仅涉及增量加工、语法加工和推理加工等习得过程,而且涉及主谓关系、格、性等语法范畴的习得情况。第4章在关键期假设的理论框架下,从形态、句法、词汇和

¹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二语句法操作的界面研究”(项目编号:19YJA740074)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能力发展的界面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CWZJ16)的阶段性成果。

搭配等方面考察了二语学习的起始年龄与高阶二语水平之间的关系。第5章以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为切入点,探讨了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与普遍语法的可及性问题。作者认为,成人二语学习者依然能够利用语言习得机制的原理,儿童和成人在语言发展水平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源于母语迁移和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第6章基于互动理论讨论了反馈类型与同伴交互对二语学习的促进作用,并对任务教学和计算机辅助环境下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探究。第7章从社会文化的视角阐述了内化和协调对二语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系统理论教学、动态评估和协调发展在解释和促进高阶二语水平方面的作用。

第二部分“高阶水平与运用:多重维度与多元语境”由五章(第8—12章)内容组成,从多维视角讨论了高级阶段语用的复杂性。第8章着重探究了课堂教学环境下高水平学习者的语法发展问题,文章首先就如何理解“高级语言能力”这一关键概念进行了讨论,并从语言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等方面对相关的实证研究展开了评述。第9章探讨第二语言高级水平的个体差异,分析了影响学习者达到高级语言水平的几个因素,如国外学习经历、族裔语言背景、课外学习资源、学习动机强度等。第10章则专门讨论了族裔双语者的语言学习经历对其高阶二语水平的影响。文章指出,族裔双语者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性。第11章从全球化的视角讨论了高阶二语水平的社会需求和相应的教学改革。作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对高水平的外语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课程改革应围绕六个方面的目标进行。另外,本章还介绍了美国“加州项目”(California Project)运用混合翻转设计进行的课程改革。第12章讨论了任务条件对高水平外语学习者语言运用的影响。文章从任务前准备、实时准备、任务重复等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并结合本族语者的任务表现进行了对比分析。

第三部分“高阶音系”由五章(第13—17章)内容组成,多角度阐释了高水平二语者的音系习得与发展问题。第13章从音系层面定义了高级水

平,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讨论了音系系统对比、可理解性和本土性视角下的二语发音特点、影响二语音系产出的因素、语码转换以及高水平二语音韵特征等问题。第14章聚焦近40年来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旨在探究类型标记对二语音系高阶发展的塑造性。文章指出,类型标记性原则可客观地衡量二语音系习得的相对难度,解释学习者在特定辅音群和某些位置上所经历的习得困难,是一种有效检验高级语言水平的三角验证方法。第15章以音段及超音段习得为框架,总结了高阶二语音学习的过程和产出情况,并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高水平二语习得者之间的差异,包括习得年龄、认知能力、学习动机和语言输入的质量与数量。第16章讨论了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连贯语流现象及其过程,并探讨了教学视角下学习动机与难度、训练效果和个体差异对连贯语流理解和产出的影响。第17章围绕嗓音起始时间(Voice Onset Time,简称VOT)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习得内容,并从涌现论和先天论的角度讨论了习得时间与方式。

第四部分“高阶语法”由六章(第18—23章)内容组成,从不同语法层面介绍了高水平学习者的二语习得情况。第18章以法语和西班牙语为例,介绍了高水平习得者对二语中不同语气的区分,并将相关实证研究根据四种不同类型的实验对象进行了划分与述评。第19章以时和体为切入点,讨论了高级阶段学习者对二语时间性的习得问题。作者认为,只有高水平二语习得者才能真正在语言产出时将深层的体态含义与浅层的词汇意义整合在一起。第20章从曲折形态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曲折形态的功能及其在衡量语言能力中的作用,并从动词性和名词性角度分别论述了高水平外语学习者在曲折形态使用中的变异性。第21章关注语言学习者对词汇高级水平的达成以及高水平学习者的词汇再发展问题。文章指出,应从词汇量大小、词汇复杂度、公式化语言的使用和词汇处理等方面衡量词汇的高级发展。第22章从形式派和功能派出发,结合句法—话语界面和信息结构的相关实证研究及语料库研究,探讨二语学习者能否习得特定结构的语法形式及话语功能。第23章围绕瓶颈假说探讨了高水平二语学

习者对名词性形态的错误使用和对刺激贫乏问题的克服,并从句法—语义界面讨论了高水平学习者的二语语义变化的敏感性。

第五部分“高阶语用、话语与社会文化素养”由五章(第24—28章)内容组成,多角度展示了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及语言运用。第24章考察了教学对高水平及中高水平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影响。文章指出,高阶二语水平并不能自动转换为高阶语用能力,因此,需要教学干预。第25章从语言水平和阅读能力的角度出发,解释了高级阅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不同语言知识对二语阅读的促进作用以及教学实践中大学阶段外语学习者阅读能力的发展。第26章围绕高水平二语学习者对间接语义的理解和言语行为的产出讨论了其语用能力的特点。文章通过横向比较高、低水平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考察了高水平学习者在语用领域的语言处理能力。第27章阐述了修辞和写作如何影响社会情境中语言习得及发展的问题。作者认为,修辞知识模型将习得的焦点从目标语言的复杂性、准确性和流利性转移到多元知识框架,凸显了修辞和写作对高阶二语习得的独特贡献。第28章讨论了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社交语言变异问题。本章通过对比母语者的语用能力,解释了高水平二语学习群体在交际中的语言变异程度,并对促进社交语言能力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3. 简要评价

纵观全书,本书有以下三大特色值得推介。

第一,视角的前瞻性。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有近50年的学科积淀。然而,学界对高水平学习者语言特征的认识相对模糊,围绕高级阶段的研究依旧处于萌芽状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专业领域对高阶二语水平的需求日益迫切,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应运而生,该书以其极具前瞻性的视角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风向标。该书从不同的语境、体裁、交际方式和语法结构入手,对高水平学习者的语言特征及其个性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

试图在不同语言体裁和社会情境下定义高阶语言能力,运用不同方法描述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使用,以此探究高水平学习者在语音、形态、句法和语用方面表现出的语言特征。另外,该书从不同维度介绍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最新发现,为后续对高水平语言能力的理解 and 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向。例如,该书第23章围绕瓶颈假说开展的研究极具启发性,有助于人们从语言界面信息整合的角度认识第二语言水平发展的障碍,开阔了研究视野。该书独特的研究视角使得语言习得水平这一话题焕发了新的生机,再次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热点。

第二,内容的新颖性。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较早的研究中以语言习得的高阶水平为讨论核心的著作并不多见,该书的出版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容不乏许多亮点和新颖之处。该书不仅着眼于高水平学习者在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中的能力及潜力,还将多语者承担的社会角色纳入考察之中。作者将认知、社会、语义与语言习得相结合,较为全面地描述和阐释了高水平语言发展、心理语言现象、语用变异性以及课堂干预下的语言潜力等问题。另外,该书梳理了不同语言流派和理论视角对高阶二语水平的认识,如从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出发研究二语学习者能否习得与本族语者水平相当的语言能力;从涌现论及先天论视角观察二语音系的习得与产出,其包容性和科学性更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展开思考。除此之外,作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地,如将族裔语言背景作为影响学习者达到高级语言水平的外部因素进行考察时,作者认为族裔双语者在外语环境中学习母语时,其外部社会条件在一定情况下有助于语言的习得。高水平族裔双语者与中、低水平族裔双语者、二语学习者以及单语者的语言模式虽有共性,但在语法结构等语言模式中仍表现出差异性。

第三,研究的实践性。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应用,该书在理论层面的概述和讨论的基础上,自然地过渡到对教学实践问题的探究。以往的研究或侧重二语学习者由于个体差异、社交约束而表现出的语言变异性,或采取教学干

预方法探索针对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教学误区和盲点,并主张对课程设计进行改革。该书进一步挖掘了以往研究中遗留的问题,如大学本科高年级课程内容是否全方位涵盖了高阶语言知识、学习者在四年的课程学习中实际能达到什么样的语言水平、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产出是否能兼顾语言的流利性及准确性、留学是否为促使学习者达成高级话语水平的唯一途径等。该书主张详尽识别高水平二语学习者在语音、形态和语用等领域表现出的特征,以便研究者更好地探索如何达成二语学习者高阶语言水平以及如何再提升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因此,该书不仅为二语学习者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更有利于加强教师对学习者的异质性的认识,从而在课堂教学中分层设计教学活动,其应用价值不容小觑。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该书作为一本文集,虽然内容比较丰富,但部分章节之间的逻辑不够紧密,编排略显松散。以第五部分为例,这一部分涵盖了语用、话语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主题,章节之间的主题跳跃性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读性。其次,该书提及的课程案例大多仅涉及西方国家的情况,因此在教学干预方面的讨论和建议也有其局限性。然而,瑕不掩瑜,这些局限不足以影响本书对高阶二语习得研究所做的独特贡献。该书全面审视了高阶二语习得涉及的多重影响因素,既有系统的理论阐释和深入的实证探索,也有提升语言学习水平的可行性方案。随着全球化时代对高阶语言习得者的需求不断增长,该书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将愈加凸显。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高阶二语习得方面的研究仍不甚系统,该书提供的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何在中国语境下进行系统

的开创性研究,进而探索高阶二语习得的共性和个体差异,研究者可从该书中获得不少灵感和益处。

参考文献

- Brown, T. & J. Bown (eds.). 2014. *To Advanced Proficiency and Beyond: Theory and Methods for Developing Superior Second Language Ability* [C].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de Bot, K. 2008. Introduction: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as a dynamic proces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2: 166-178.
- Hyltenstam, K. (ed.). 2016. *Advanced Proficiency and Exceptional Ability in Second Languages* [C]. Boston/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Lenzing, A. 2015. Exploring regularities and dynamic systems in L2 development [J]. *Language Learning* 65: 89-122.
- Malovrh, P. A. & A. G. Benati (eds.). 2018. *The Handbook of Advanced Proficienc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Oxford: Wiley-Blackwell.
- Schwartz, B. D. & R. A. Sprouse. 1996. L2 cognitive states and the 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model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2: 40-72.

作者简介

尹洪山,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电子邮箱: yin739@126.com

于梦初,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 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电子邮箱: 626624815@qq.com

(审稿编辑: 许宏晨)

地方高校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与发展策略

○ 李庆领, 吕耀中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地方高校走国际化发展之路,既是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趋势的需要,也是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地方高校在教育国际化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所处区域环境、师生认知、校园氛围等因素的制约,教育国际化尚存在许多不足。为了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地方高校需要从意识理念到具体工作、从制度到机制等方面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地方高校;教育国际化;问题;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2-0079-05

DOI:10.16800/j.cnki.jqustss.2017.02.016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ing local universities

LI Qing-ling, LV Yao-zho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al, the local universities must adhere to the path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hich meet the demand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self-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though many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done some good work in making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more international,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ahead, due to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environment,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gnition, campus respiratory. To advan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seek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new strategies for the foundation concept and the concrete work as well as the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challenges; strategies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任务: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通过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和特色学科,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

联合攻关,加强国际前沿和薄弱学科建设,借鉴世界名校先进管理经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助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6年8月,教育部关于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通知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要立足各自发展战略和本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与沿线各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重点做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来华留学质量、优化境外合作办学、

[基金项目]山东省属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5D004)

[收稿日期]2017-05-10

[作者简介]李庆领(1959-),男,山东曹县人,青岛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吕耀中(1966-),男,甘肃会宁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助推企业成长等各项工作的协同发展。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层推进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主体,其国际化水平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背景下,众多地方高校纷纷提出了新时期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区域环境、办学实力、师生认知、校园氛围等因素的制约,其教育国际化尚存在许多不足。为此,地方高校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培养社会急需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一、地方高校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

地方高校是指主要靠地方财政支持,由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划拨经费,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我国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为1219所^[1],除去100多所中央属院校,其他属于地方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占本科院校总数的85%以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主体部分。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对国内高校国际化发展进行了调查,多方面展示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状况。调查对象为教育部2014年7月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中的所有普通本科院校(共计1205所),有效样本为556所(回收率为46.1%),其中地方高校484所(回收率为44.3%)。

《调查报告》从国际化战略、组织与管理、教师、学生、课程与教学、科研、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9个方面对调查高校进行分类比较分析。调查显示,地方高校国际化在许多方面都比较落后。例如,在师资方面,地方高校外籍专任教师的平均人数为12人,仅占专任教师的1.7%,而“985”高校外籍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达近3%;地方高校有海外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平均人数是16人,仅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而“985”高校和“211”高校的这一比例分别是11.8%和7.5%。在学科建设方面,地方高校使用全外语授课学科专业(不含外语类学科专业)数占学科专业设置总数的比例平均为4.0%,而“211”高校的这一比例达到了近9%。在师生赴海外交流学习方面,地方高校刚刚起步。2015年专任教师通过学校办理的短期出国考察、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地方高校平均为40

人次,在“985”高校平均为1271人次;通过学校办理的在海外修读学分的在校生,在地方高校平均每校为65人,在“985”高校平均为496人。海外学者、学生或其他人员来我国地方高校交流学习的人数更少,2015年通过学校办理的海外学者短期来华讲学与合作科研的人数(停留一个月及以上),在地方高校平均为7人,在“985”高校平均为229人。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地方高校尚处在发展阶段。2015年地方高校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平均为225人,仅占在校生的1.3%,其中学历生人数105人,占全日制在校生的0.8%;而“985”高校外国留学生人数平均为2143人,其中学历生人数达1100人。

《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大多数高校认识到国际化发展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性,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际化组织与管理机制,但缺乏有效的措施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

二、地方高校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地方高校在教育国际化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化办学水平,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领导认知、战略规划、教师态度等方面面临一些挑战。

(一) 领导认知差异

学校领导的国际化教育观念和认识是开展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前提。受地理位置、地方使命、声誉和地位所限,许多高校领导没有树立教育国际化发展理念,把学校发展重点仅放在本土化或区域化领域,将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在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狭窄领域,更多地关注当前最为迫切的职业发展任务和教师的基本技能,而忽视了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地方高校的领导需要树立教育国际化的理念,从全球视角认识教育的发展问题。一些领导对教育国际化的发展缺乏了解,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国际化发展形势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对教育国际化在培养学生全球学习意识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缺乏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没有形成积极有效的行动计划。

(二) 战略规划的落实机制有待完善

战略规划从出台到落实通常包括战略规划的制定、战略规划的执行、战略规划的评估等环节。但在战略规划的执行环节,部分高校认识不充分,部分步骤出现空缺,影响了战略规划落实的可能性^[2]。虽然

许多学校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但没有把国际化置于学校发展的优先位置,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国际化发展计划,通常局限于一两个独立的活動,比如招收更多国际学生或增加出国学习的学生人数。国际化战略实施没有形成合力。

有些学校尚未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国际化战略规划,学校的国际化工作委员会或领导小组通常只是协调或加强已有的活动。好的战略必须有完善的战略行动计划,将学生的学习结果与学习活动联系起来。因此,地方高校需要审视各种国际化活动,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化战略实施方案。

(三) 国际化项目与活动不系统

虽然许多地方高校进行多种形式的国际化实践,但零碎且相互独立。大多数学校的二级教学单位和职能部门没有意识到在其他领域增加国际化专门知识或项目的重要性,其国际交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各自独立的领域,没有将校内各种项目和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综合效应。

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和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认为,一所学校在拥有众多国际化活动时,应该判定这些活动的优先顺序和如何将它们整合进国际化战略计划中,这样才有利于国际化^[3]。许多地方高校的国际化活动是自发形成的,这些自下而上的行为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缺乏自上而下的布控,容易造成局面不清,对大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许多地方高校的国际化实践也缺乏一定的统筹,学校整体国际化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有待充分渗透整个办学体系和全过程。

(四) 经费不足

经费不足是制约地方高校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国际化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没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国际化活动便无法开展。地方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的生均拨款。由于地方经济和教育投入不足,几乎所有地方高校都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直接影响课程开发和国际交流活动。许多高校教育国际化的边缘地位因经费不足而不断加剧。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增加了高校生均拨款,但难以满足地方高校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此外,许多地方高校扩建与扩招,政府没有增加相关的经费,加之学费收取标准较低,且自身的创收能力有限,学校的建设资金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学校债务压力沉重。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地方高校教

育国际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五) 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限制

出国学习和利用校内国际化资源是促进学生国际化素质发展的两种主要途径。出国学习可以让学生置身于国际化的环境,直接体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生活,是提高其国际化水平的有效方式,但存在费用昂贵、受益群体小等问题。近年来,虽然一些地方高校与国外高校开展国际化合作形式,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未能给学生提供相关经济支持,因此难以满足学生出国学习的愿望和需求。

利用校内国际化资源可以有效地促进学校教育的国际化。校园里的社交生活对于学生发展的影响力,绝不亚于纯粹的课堂教学和专业学习^[4]。目前,大多数地方高校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处于发展阶段,许多高校缺乏专业的留学生服务与管理队伍,对留学生的日常管理基本采用隔离模式,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中国学生分开,致使他们之间缺乏交流机会,没有真正营造出中外学生文化交流的国际化校园氛围。国际化元素的缺乏导致校园国际化环境氛围不浓^[5]。

(六) 教师参与国际化的意愿不足

教育国际化的障碍并不仅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上,个人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教师参与国际化的动机主要依靠其对国际和跨文化的学习。有些教师可能对此感兴趣,而有些则认为这些学习与他们个人及其专业学习没有关系,他们对国际和跨文化学习的重视通常与其个人经历相关。

对教师来说,参与国际化的意愿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及其文化和语言的经历。来自不同文化或不同国家的人可能因其文化和语言传承而产生强烈的参与意愿;有海外经历的人一般拥有参与国际化的文化与语言能力,参加过正式国际培训的人有可能继续从事国际化的教学与研究。但地方高校的大部分教师没有受过国际教育环境的熏陶,也缺乏国际交往经历,对于教育国际化没有建立起感性和经验的认识,在其专业生活中常常忽视教育国际化。

三、地方高校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

教育国际化包含学校的管理制度、课程设计、文化价值、国际交流活动及教职员工的国际认识等层面。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学校针对现有问题积极寻找解决策略,从意识理念到具体工作,从制度到校园文化建设,从学校领导到基层工作人员环环相扣,需要互相协作,共同努力。

(一) 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教育国际化成功的前提是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首先,学校领导要清楚地认识到推动国际化的意义与效益,并向教师、员工、学生及相关人员阐明国际化对当地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其次,领导要树立发展意识,明确国际化是学校工作的一部分,是推动学校整体发展的机遇和途径。再次,领导要有广阔的视野,应将地方与全球联系起来,认识到教育国际化与学校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解其在培养学生公民意识中的重要性,及在多元文化环境工作的重要性。

学校领导是思想实践者、学习引领者、教学管理者,必须具有宏观的国际视野,在解决问题与学习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教育国际化理念,以开放的办学观念引领学校变革与发展。各级学校领导参与教育国际化,不仅可以提高对国际化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可以产生行动思想和力量,从而在管理政策、管理制度、手段与措施上适应国际化的要求,以国际视野来指导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等各项工作。

(二) 落实国际化战略行动计划

教育国际化不只是添加一些常规课程或增加国际学生数量,关键在于将国际的和跨文化的元素与大学层次的教育项目的目标及实践相结合。教育国际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教学和管理等各方面资源的配置,影响整个学校的院系及活动,深深体现在学校文化、价值、政策与实践之中。

国际化必须要有战略引导。地方高校需要把国际化理念整合到学校的使命、政策、规划和质量保障之中,保证国际化成为学校的目标、规划和制度的核心。学校培养目标、学生学习结果、学校计划与活动必须是学校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因此,学校应将国际化纳入战略规划中,制定具体的国际化整体发展战略计划和目标,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国际化管理体系。同时各部门应协调配合,统一部署学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进而使各项国际化政策得以有效实施。

(三) 提高教师的国际化参与意识

教师是学校教育国际化的行动者。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是推动学校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一旦教师成员有直接的国际经历,他们对国际化的兴趣和热情就会高涨。“拥有国际知识和国际意识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世界意识、全球观念以及掌握世界科学知识的国际人才”^[6]。当今,

教师除了应该具备出色的专业基础能力,还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国际化的背景^[7]。地方高校可采取“走出去”的多种形式为教师提供出国学习、进修与交流机会,丰富他们的国际跨文化经历和全球知识,同时可以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面向世界招聘教师和学者。学校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培养教师的国际意识与国际化心态。

具有国际化心态的教师能够从各种环境、文化和语言中获取知识,并善于发现文化的影响。教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也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开放的教育理念。为此需要将国际观念融入教师的教学与研究中,鼓励教师参与建设国际化课程,支持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等国际交流活动,创造机会丰富他们的跨文化经历和全球知识,提高他们的国际化水平。

(四) 满足学生的期望与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当今世界日渐成为一个“地球村”,这就要求大学教育要使学生获得在全球范围内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竞争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学生对知识的要求已超越了国界,他们渴望了解他国的知识,出国学习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然而,地方高校给学生提供出国学习与交流的机会远远落后于学生自身的需求。学校应设立海外交流奖学金,资助学生参加海外游学项目;建立学生国际学术交流项目,支持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建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项目,组织开展校园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与国外大学之间开展学分互认、学历和学位互认工作。如此,学校才能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各种海外学习机会,提高其全球意识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提升其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地方高校只有实施国际化教育,学生才能有机会拓宽对世界的理解或改变对全球关系的认识与态度。

(五) 充分利用校本资源

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国际交流合作资源,利用学生组织,积极开展语言学习与服务学习项目,推动学生进行语言或者文化方面的学习交流。同时要重视与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实习机会,使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中,提高他们的国际化就业能力。高校还可以成立或通过海外或境外校友会,发挥海外校友的能量,促进学校的教育国际化进程。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时代, 信息资源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国际共享。国际互联网、虚拟大学、电子图书馆等设施把全球的学生和学者联系在一起, 使其共享最新的知识和技术。地方高校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直接引入国际化的教育资源, 使本地区、本国甚至邻国学生在支付相对少的教育费用的情况下, 无须到教育输出国, 便可享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8]。地方高校应按照国际化发展要求, 结合区域实际, 整合各方资源, 开发与引进网络学习, 丰富国际化教育课程资源。

(六)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国际化校园需要把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 构建一个有意义的学习环境, 让更多的学生增加国际化学习经历。学校需要在校园景观、标识等视觉形象系统建设中充分考虑国际化因素, 也可举办国际文化节等各种校园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从而营造国际化的“软环境”, 提高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和认知。

同时地方高校应积极开展国际教育的宣传、交流、展示活动, 吸收一流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到学校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访问, 促进留学生同本土学生间的交流, 围绕国际前沿、焦点和热点问题邀请国外著名学者来校做报告, 提升师生对国际问题的关心和关注, 全面营造学校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国际化是地方高校发展的内在要求, 它是一个将国际和全球元素引入高等教育的过程, 是一个致

力于改善高等教育的目标、功能和实践的过程^[9]。地方高校在培养学生成为合格公民以使其能够应对未来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 地方高校需要充分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 积极实施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 为学生创造国际化学习机会, 促进学生对其他文化、历史的理解。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 地方高校要谋求自身的发展, 必须走国际化之路。学校应树立国际化办学理念, 加强地方与全球的联系, 充分调动师生参与国际化的积极性, 进一步促进教育国际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EB/OL]. [2016-08-15].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607/t20160706_270976.html.
- [2]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际教育研究中心. 2015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EB/OL]. [2016-08-16]. <http://ceaie.edu.cn/xm/zyyxm/1876.html>.
- [3] 李薇. 肯尼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策略与实践探析——以莫伊大学为例[J]. 外国教育研究, 2010(1): 47-51.
- [4] 侯定凯. 国际化校园: 应更多融合而非隔阂[N]. 中国科学报, 2012-07-25(7).
- [5] 李成明, 张磊, 王晓阳. 对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中国高等教育, 2013(6): 18-20.
- [6] 张树泉.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若干对策[J]. 江苏高教, 2006(2): 54-55.
- [7] 姜澎. “未来教师”需要广阔国际视野[N]. 文汇报, 2016-03-23(7).
- [8] 刘晓亮. 地方高校国际化问题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 [9] 汉斯·德维特. 高等教育国际化: 九个误解[J]. 国际高等教育, 2011(4): 139-141.

[责任编辑 张桂霞]

翻译职业化时代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孟 婧

(青岛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 与传统翻译相比, 职业化时代的翻译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翻译人员的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目前高校培养的翻译硕士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达到时代要求。论文从三方面剖析了当前我国翻译硕士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培养翻译硕士人才的新型路径, 以期对翻译硕士教育提供借鉴。

[关键词] 翻译硕士; 职业化; 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 2018年青岛科技大学人文社科项目(18XB27) 2016年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研全作培养模式与机制研究(SDYY16012)”

[作者简介] 孟 婧(1978—), 女, 山东淄博人,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导, 主要从事外语教学、翻译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0)37-0043-03 [收稿日期] 2019-11-25

一、引言

随着信息社会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跨境电商平台、移动应用、进出口贸易、海外工程等实用文献为主要翻译对象的新型翻译业务激增, 标志着翻译职业化时代的到来^[1]。职业化时代的翻译业务已不仅限于口笔译, 对翻译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也超出语言能力范围, 强调技术能力、专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职业素养及服务意识等^[2]。在此背景下, 对翻译专业人员的培养应重新审视, 在职业化背景下开展对翻译人才培养的研究其价值不言而喻。

二、翻译职业化时代人才需求的变化

近年来语言服务业发展迅速, 原有的以个体行为为主的翻译已无法适应行业的新发展。

(一) 翻译方式日趋团队化

历史上, 翻译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 而今大型国际活动增多, 涉及的翻译活动在规模上越来越大, 翻译也变为一种团队行为。在翻译形式上, 单打独斗已不复存在, 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的翻译团队逐渐成为翻译市场的主力军。在内容上也会出现同一文本涉及多种语言的问题。职业化时代翻译项目的客户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口译或笔译服务, 而是需要翻译提供方即语言服务企业具备更大的处理产能、更高效的处理流程和更有效的成本控制。

(二) 翻译对象以实用文献为主

当今时代, 实用文献、产业文书、政府组织机构文件等日益成为翻译的主要对象(谢天振 2014)。民意测验机构Flash Eurobarometer曾经在2011年对来自27个欧盟成员国的13752名互联网用户进行了“在线用户语言偏好调查”, 结果显示, 42%的受访者称他们从未用外语在网上购物, 可见若要为国外客户提供良好的购物体验, 就必须解决语言问题。

(三) 翻译技术的运用逐渐普及

传统的翻译以纸笔为主, 在语言服务行业大发展的背景下,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翻译工作者面临着机器翻译的巨大挑战, 未来的翻译工作模式将会是人机协同翻译, 因此翻译人才的培养除基本的口笔译能力外, 必须涉及计算机辅助翻译领域, 熟练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 并熟悉翻译项目流程管理。

(四) 翻译需求由“外译中”为主转变为“中译外”, 本地化需求加大

本地化行业标准协会(LISA)将本地化定义为跨国公司把特定产品转化成在语言和文化上都符合不同目标市场需要的产品的完整过程^[3]。从翻译角度来看, 随着“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大量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政治文本等内容需要借助翻译向国外传播, 以展示中国形象, 在中译外的过程中对本地化的重视也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当前翻译硕士培养存在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 翻译硕士培养须重实践、重应用。MTI培养院校均按要求开设科技翻译、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项目管理等专业课程, 凸显应用性及时代特征, 但纵观全国翻译硕士培养高校的整体情况, 在翻译职业化背景下, 高校翻译硕士人才培养模式依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主要问题如下:

(一) 实践教学课程比例不高

长期以来, 翻译硕士培养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存在与学术型学位课程同化现象, 课程内容理论性过强, 对实践能力培养重视程度不够。伍志伟、穆雷(2015)指出翻译专业教学实践性不够, 必须根据语言服务行业的动向对课程进行适时更新与调整, 为学生创设实践机会, 提升职业化技能^[4]。任文(2018)指出不少学校

翻译实务教学缺乏有针对性的设计,多模态翻译在教学中很少涉及,导致学生在处理这类真实翻译任务时无从下手^[5]。根据2018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数据,75.7%的MTI教师认为实践教学课程比例需进一步提高,以避免教学与市场需求的脱节。

(二)实习基地建设不完善

实习基地是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衔接的平台,是企业与翻译硕士培养高校间开展产学合作的重要形式,而目前大多数翻译硕士培养高校的实习基地存在着追求数量但质量不达标现象(穆雷2017)。很多院校没有根据自身学科特点以及地域特点进行实习基地建设,实习形式以企业、或政府外事部门接收学生进行短期实习为主,或者学生自行寻找实习单位,学校对实习过程缺乏监管,无法保证实习质量。2018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MTI教师呼吁完善校内外翻译实训基地建设,以提高教学效果。

(三)翻译师资跟不上职业化发展步伐

2007年学位办19号文就规定,MTI核心课程及重要必修课程的任课老师须具备较高的实践经验,笔译教师应承担过30万字以上的正式笔译任务;口译教师应担任20次以上的正式场合的连传同传任务,MTI院校聘请的兼职老师须具备丰富口笔译经验^[6],然而实际情况与学位办要求相差甚远。穆雷、李希希(2017)考察了92所开设MTI口译方向硕士点的院校,发现所聘请的兼职老师中绝大多数来自高校,并非资深翻译工作者,专职口译老师每年口译实践量低于10次甚至没有^[7]。18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调查显示,近五成受访教师累计笔译项目总字数不足20万字,超七成老师参与的会声口译累计总场数低于10场。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联合培养学生的院校占比低,只有近四成受访院校有与企业/政府/机构联合培养人才的经验。

(四)翻译技术教学重视不够

2018行业报告中的调研数据显示,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普及度相当高,MTI院校没有开设技术类课程的仅占2.7%。技术类课程中最热门的当属计算机辅助翻译,但该课程以翻译软件的操作使用为主,没有将真实翻译项目与CAT课程结合。翻译技术师资的缺乏直接导致学生对技术掌握的不足。学生依然聚焦于文本翻译,停留在对机器翻译产出的译文进行校对,对不恰当之处再进行人工翻译阶段。不少学生将机器翻译视为节约翻译时间的手段,并不了解信息化手段下整个翻译项目的运作流程。

四、翻译职业化背景下翻译硕士培养的路径探索

国内翻译专业从2007年成立以来,目前已经有272所高校开设了翻译专业的翻译专业本科,249所高校招收MTI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针对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高校MTI培养存在的问题,笔者尝试从

以下方面入手,创新MTI培养路径。

(一)以职业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

翻译硕士人才培养的不是单纯的学术性人才,而是要体现翻译专业人才素质的学术性+专业性的应用人才,“应用”就必然要与市场接轨,与特定职业相关。

1.在师资上吸引专职翻译进课堂,让学生熟悉项目管理流程,构建翻译硕士教育的“双师制”。要在短期内改善翻译师资力量不足问题,让学生得到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培养,就必须建立“双师制”,依靠专职翻译的实践经验与学校教育的理论基础,双管齐下达到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2.课程设置上,突出特色,扩大实践课程比例。实践课程可以解决知识传授与问题应对能力之间的关系。理论讲授与实践训练之间要把握好比例关系,不能只“重视理论学习,忽视能力培养”。适时添加专业背景知识,以体现学生的未来职业倾向,确保学生离开学校进入职场能很快融入角色。课程设置要突出特色。翻译产业化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增长,这就要求MTI学生要有所专长。MTI培养高校要充分利用学校的优势学科资源,建设独具特色的学位点,吸引学生报考。

3.评价环节把实践纳入考评。我国对翻译硕士的评价主要体现在科研水平和翻译实践上。虽然在科研水平上,对学硕和专硕的要求有所区分,但论文发表依然是评价学生专业能力的一项主要指标。笔者认为,翻译硕士从课程设置到教学过程都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那么在评价阶段,就应将实践内容纳入考评体系,除实践课程外,学生去公司实习都可换算为学分。同时鼓励学生考取CATTI证书、参与翻译竞赛,就读期间的翻译成果若被翻译公司或出版机构采纳,均应纳入考评。

(二)以综合能力培养为目标,完善实习基地建设

翻译硕士培养的实践教学,很大程度上依赖实习基地的建设。目前,翻译公司提供语言服务大多以团队合作的形式进行,通过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学生不仅了解翻译项目的团队合作流程,运用所学知识完成指定的口笔译任务,在项目运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努力找到解决方法,并且在翻译任务完成过程中关注与客户的沟通,在任务完成后根据客户反馈对自己的翻译过程、翻译质量进行反思与评估,既对所学知识进行了实践,又锻炼了认知能力。此外,在实践基地进行的真实翻译任务可以作为学生毕业环节翻译实践报告的来源,这要比模拟的翻译过程更具代表性。近年来,翻译实习基地建设已涌现出不少成功案例,如上海瑞科翻译有限公司和南京瑞科翻译有限公司为上海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六所高校的翻译硕士建立翻译教学与实习基地,以研究生培养为纽带,促进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的相互转化,提高翻译硕士的培养质量与服务社会水平。笔者认为,还可以借鉴MBA培养院校与企业合作的实习基地建设模式,既为

MBA学员提供专业的培训,也使企业员工得到了将自己的实际操作经验进行整合、思考以及升华的机会^[8]。

(三)以项目教学为突破 提升专业能力

高校可以从项目教学入手,在教学、实践、毕业论文各个环节中渗透项目内容。语言服务企业与高校之间可以通过项目合作组织学生进入职场,在真实环境中更好的发现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问题,进而开展补救性教学以及对策研究。

1.积极开发教学案例。案例教学注重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产学合作模式下翻译硕士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围绕具体项目展开,每一个项目又可以分为不同阶段,每个阶段设计相应的案例,聚集于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改变目前翻译教学局限于文本的困境,同时,案例教学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师制”在案例教学中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2.在项目教学中加大现代化技术运用的投入力度。语言服务企业的翻译项目大都依靠翻译技术完成,《2016年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在271家受调查企业/单位中,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占比达到62%,2018年的行业调查中,使用各种技术的企业占比达到了93.5%。MTI院校应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按照语言服务企业的项目需求开设相应的翻译技术课程,在自己院校师资缺乏的情况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资深翻译技术人员进课堂。高校和企业以实习基地为桥梁,让专职教师和学生加入企业翻译项目的实际工作中,为企业节约人力资本的同时也增强了教师与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此外,高校应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努力营造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让专任教师和学生主动适应技术的变革,提升学习翻译技术的自主性。

(四)以人才出口为核心 实现人才培养分流

1.MTI学生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学生毕业后从事翻译工作的意愿不强,全部按照高水平翻译人才培养也不现实,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一些通用、综合类的文本翻译课程,包括基本翻译理论、文化、文体、术语等知识以及翻译技术工具的使用,学生毕业后可从事语言服务行业相关的翻译工作,或编辑、审校工作。对于MTI办学特色鲜明的院校可以培养学生走专业化翻译道路。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MTI项目,开设多

门口笔译法律相关课程,在实践环节组织学生到公检法、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习,学生在专业导师指导下进行为期半年的集中规范实习和分散实习,该校所培养的法律翻译硕士供不应求^[9](任文,2018)。对于翻译师资力量雄厚、生源优秀的院校,应以培养高端翻译人才为目标,为国内外高级别会议、外事外交活动培养精英学子。

2.高校受企业委托定制培养翻译人才。近年来,MTI培养院校招收的非全日制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这为高校与企业合作定制培养翻译人才创造了条件。从2018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外资企业是语言服务的最大需求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政府或事业部门也对语言服务有极大的需求,MTI培养院校应加大与这些部门的合作,在授课时间和学制上灵活处理,以适应在职人员攻读学位的需求。在职人员在校学习期间会比全日制学生有更明确的学习方向,会促进学校按照企业实际要求培养翻译人才,在职人员与全日制学生的沟通交流也会对学生未来的就业提供指导与帮助。

参考文献

- [1]谢天振.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J].东方翻译,2014(2):4-9.
- [2]穆雷.面向国际语言服务业的翻译人才能力特征研究——基于全球语言服务供应商100强的调研分析[J].上海翻译,2017(1):8-16.
- [3]杨朝军.产业化视域下的翻译硕士培养模式[J].中国翻译,2012(1):24-28.
- [4]伍志伟,穆雷.构建翻译专业实践教学的创新模式[J].外语教学,2015(1):98-102.
- [5]任文.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问题与出路[J].当代外语研究,2018(6):92-98.
- [6]国务院学位办.学位办〔2007〕19号文“关于申报开展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Z].2007.
- [7]穆雷,李希希.MTI口译教育:问题与对策[J].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12):109-119.
- [8]李玲,李燕萍,陶厚永.产学研用四位一体的MBA人才培养新思路[J].当代教育科学,2012(1):42-46.
- [9]任文.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问题与出路[J].当代外语研究,2018(6):92-98.

Exploring the Ways of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MENG J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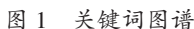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 era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new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ability of translators, but the translation masters train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not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ion masters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and puts forward a new way to train translation tal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ranslation master educ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masters; professionalization; talents training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习者 there be 存现句式产出研究*

【文章编号】2095-9648(2020)04-0066-08

首先,本研究通过 CNKI 的学术期刊语料库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研究进行检索,检索条件为:主题=语料库英语,来源类别=核心期刊 & CSSCI。经筛选,共获得从1982年到2020年与本研究相关的436条记录。通过运行CiteSpaceV.5.6.R1,得到436条数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围绕语料库,英语教学,词块等做了大量研究。

表1 关键词中心度表

Centrality	Year	Keywords
0.27	1997	语料库
0.08	2002	英语教学
0.03	2010	词块
0.03	2010	新闻标题
0.03	2010	二语习得
0.02	2004	英语写作

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中,对语料库的选用主要有两类:1)基于SWECCL,LONCNESS,COHA等语料库的研究(胡元江、石海漫、季萍 2017;孟庆楠、李基安 2019);2)基于自建的语料库的研究(宋晓舟 2016;王克非、刘鼎甲 2018);从表1可以看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英语教学(徐曼菲、何安平 2016;陆小飞、刘颖颖 2019;石洁琦、郑博文、陈建生 2019);2)词汇或词块(宋晓舟 2016;胡元江、石海漫、季萍 2017;闫长红 2018;邓海龙 2019);3)新闻标题(余阳 2010;陶雪城、张萍 2010);4)二语习得(王龙吟、何安平 2005;盛林 2012);5)英语写作(刘芹、何蕾 2017;娄宝翠、王莉 2020)。从中可以看出,少有学者借助语料库直接研究英语的句法以及语法层面。

其次,本研究通过CNKI的学术期刊对there be存现句式的相关研究进行检索。

首次检索条件为:主题=there be,来源类别=核心期刊 & CSSCI。经筛选,共获得从1993年到2019年与本研究相关的17篇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该句式:1)语法层面(于善志、苏佳佳 2011;徐浩 2013;常辉、赵勇 2014);2)语义层面(李国宏 2019);3)借助语料库(黄冰、何安平 2007;张继东、陈文 2017)。第二次检索条件为:主题=语料库,并且,关键词=存现句,来源类别=核心期刊 & CSSCI。经筛选仅有2篇文献,且均为英汉存现句对比研究。黄冰、何安平(2007)借助CLEC和本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测试,通过比较英汉存现句之间的异同,研究得出两者形式和意义匹配

方面的差异和所接触语言输入的频率会对中国大学生习得there be句式产生影响。刘梅丽、王文斌(2019)借助了BNC和BCC语料库,从认知视角研究了英汉存现式施事宾语句的两种差异,并指出造成此差异的原因是英汉民族在思维层面上的不同时空取向。这两篇文献主要探讨there be句式的习得因素和实施宾语等层面。

研究同时,对硕士生、博士生和会议论文中对借助语料库研究there be句式的研究进行检索,经筛选,共获得硕士生、博士生论文两篇,会议论文一篇。王淑花、吴尚义(2008)在《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借助自建小型书面交际英语语料库,研究了大学生作文中的there be结构使用情况,分析了该结构的失误特征及对教学的启示。刘明莉(2016)借助COCA和CCL,从体特征的角度研究英汉存现动词,探究了英汉存现动词体特征与句子时体结构、存现结构、状语成分的互动关系及异同。徐亮(2018)借助CLEC和TECCL与BNC和COCA,对比分析中国中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使用的“there be”结构,结合语言迁移和认知语言学视角的探讨,总结了该结构的使用特点及使用不当原因,变化趋势以及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的异同。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借助语料库,对中国英语学习者there be句式的产出使用情况做了一定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深化,尤其是该句式存在主体后动词的使用,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3. 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句法研究模式有两种:悉尼语法模式和加的夫语法模式。加的夫语法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组成部分,是由Fawcett等人提出的。此语法模式从功能角度描述语言,将描述性、生成性、认知性相结合,具有一体化句法结构,这也是与悉尼语法模式最显著的不同。

强势主位是通过句法结构得到突出或加强的主位,并且属于有标记主位。强势主位结构通过主位强化语,使其后面的成分得到强化,成为强势主位。英语中有三种强势主位:经验型、存在型、评价型(苗兴伟、秦洪武 2010)。There be句型后的存在主体属于存在型强势主位,如“*There is a restaurant (强势主位) over there*”。

Halliday 认为,每个分句的主位可以分为主题主位,人际主位和语篇主位,并且很多系统功能学者都明确指出 there be 句型中的 there 是主题主位。然而黄国文提出,把表示存在的分句中的 there 当作主题主位是一种主位结构分析法,但并不是最好的分析法,there 并不体现经验功能,它既不是参与者角色,又不是环境成分,也不是存在过程的体现,把 there 当作主题主位在理论上很难令人信服。所以通过加的夫语法分析,得出对于英语中的存在过程的主位分析,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 there be 看作是主位引发语,把存在物看作是主位,这样的分析法对由 be 体现的存在过程更为合适,如表 2 所示;另一种分析法是把 there 和操作词/谓体一起当作主位,这样的处理方法即适用于存在过程由 be 实现的分句,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动词表示过程的情况(黄国文 1999)。对于采用加的夫语法模式分析而不用 Halliday 语法模式分析的原因,黄国文经分析后提出加的夫语法的“强势”比 Halliday 提出的“谓化”更含有“功能”味道,所以采用加的夫语法来进行句法-语义分析(黄国文 1996)。

表 2 黄国文对存在型强势主位的句法-语义分析

	There	was	a cat	on the mat
(a)	主语	操作词/谓体	补语	状语
(b)		存在过程	存在物	环境成分:地点
(c)	语气		剩余成分	
(d)			主题主位	
(e)	主位引发语		主位	述位

这里的分析包含五个层次:(a)层是分句的句法分析;(b)层是及物性情况(属概念功能);(c)层是语气情况(属人际功能);(d)层和(e)层属主位结构分析(属语篇功能)。

由于本文研究的 there be 句型为由 be 实现存在过程的分句,所以采用第一种分析方法。

邓仁华从加的夫语法视角对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了本研究涉及到的属性类强势主位分析。从句法上看,属性类存在结构有 4 个基本部分,它们是空主语 there,操作词兼(作)主要动词(O/M),补语兼“载体”兼“强势主位”(C/Ca/ETh)和补语兼“属性”(C/At)(邓仁华 2007)。本研究涉及到的由“载体”充当强势主位的属性类存在结构的句法分析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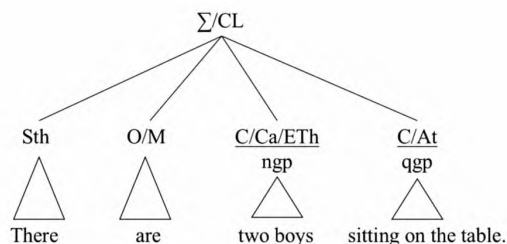


图 2 由“载体”充当强势主位的属性类存在结构的句法分析

在此英语结构中,be 为操作词兼(作)主要动词。而 Lyons(1967)提出,汉语的“有”是一个类似于 be 的“消极系词”(阮炜 020)。在汉语“有两个男孩坐在桌子上”句中,“有”与英语强势主位属性类存在结构中的“be”并不完全对应,其动词属性弱化,而其后的补语中“坐”的动词属性则得到了强化。所以,英语学习者在产出此类结构时,受“消极系词”的影响,易导致 there be 句式的误用。

4.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借助语料库及问卷,分析探讨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中 there be 句式的产出使用特点和该句式存在主体后动词形式易错的原因以及理论分析。

4.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问题:

1. 中国英语学习者 there be 句式使用上有什么特征;
2. 该特征是由何种原因造成,中国大学生如何应对英语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带来的二语负迁移现象。

4.2 研究方法

4.2.1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了 TECCL (Ten-thousand English Compositions of Chinese Learners)中大学部分的语料 TECCL_C, NESSIE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Similarly and Identically-prompted Essays)和 CLEC (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的子语料库 ST3 和 ST4 三个语料库。中国学生万篇英语作文语料库 (TECCL)V1.1 中含有 10,071 个文本,类符数量为 29,823,形符数量为 1,822,378。其中所有语料产生于 2011-2015 年,语料来源于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 32 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为中国大学生,所以从 TECCL 中提取中国大学生的语料,建立 TECCL_C 子语料库。英语本族语者作文语料库 (NESSIE)V1.0 中含有 257 个文

本,类符数量为11849,形符数量为176,135。语料主要来源于英美本族语者依照中国四六级、专业四八级作文题目撰写的英语作文,也有部分语料来自BAME、MICSUP等英美大学生语料库中话题近似的作文文本。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中收录了5个等级学生(中学生、大学非英语专业四、六级和英语专业一、二阶段)笔头作文中的11类错误,动词错误又分为9类,按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时态错误、一致错误、及物动词模式错误、固定短语错误、语态错误、有定式/不定式错误、情态错误和语气错误(桂诗春、杨惠中2003)。其中的子语料库ST3和ST4分别为大学非英语专业四、六级作文语料库。

4.2.2 调查问卷

本研究依据《第二语言研究中的统计案例分析》(2013)和《外语教学问卷调查法》(2009),制作了中国大学生there be句式使用调查问卷并用问卷星发布,主要探讨存现句型中存现主体后动词形式使用错误的原因等。

4.3 研究过程

首先,本研究采用AntConc3.5.7来进行语料库检索。由于TECCL_C和NESSIE两个语料库大小不同,在进行there be频数统计时,采用相对频数。其次,研究使用SPSS 26进行频数差异统计。为了进一步探究,检索ST3 & ST4中出现的存现句式误用情况,并概括出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写作中there be句式的使用特征。最后,通过自制的中国大学生there be句式使用情况调查问卷,主要探讨该句式中存在主体后动词形式产出使用错误的原因等。

5. 结果与讨论

本部分先借助语料库及检索工具对there be

句式的产出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调查问卷探究更深层次的问题。

5.1 there be使用频数的对比分析

在语料库对比分析中,涉及到形符数量、绝对频数和相对频数的对比。形符数量是语料库总共含有的单词数量。绝对频率(absolute frequency)是语料库中某一特定语言特征发生的所有实际计数,在本研究中指there be句式出现的频数。相对频率(relative frequency)用于两个语料库或多个语料库之间的比较,通过绝对频率/形符数量*标准化基础算出。本文中的标准化基础选用100,000。即用绝对频数与语料库的形符数量相除,再乘以100,000所得出的每100,000词出现的次数。

经过语料库检索工具AntConc3.5.7统计,在TECCL_C中,there be句式出现的绝对频数是3757次,相对频数是206.16次每10万词;在NESSIE中,there be句式出现的绝对频数是434次,相对频数是246.4次每10万词,如表3所示。再用SPSS26对两组数据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TECCL_C和NESSIE中there be出现的频数

	TECCL_C	NESSIE
形符数量	1822378	176135
绝对频数	3757	434
相对频数	206.16	246.4

由表4可知, $\chi^2=633.860,df=1,p<.001$,Cramer's V = .369。p < .001,表明有显著性差异,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写作产出中有超用或少用there be句式的情况。由表5可知,Cramer's V 效应值大于.30,小于.07,表明相关程度中等,与本族语者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写作产出中超用或少用该句型程度中等。

表4 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						对称测量			
	值	自由度	渐进显著性 (双侧)	精确显著性 (双侧)	精确显著性 (单侧)			值	渐进显著性
皮尔逊卡方	633.860 ^a	1	.000			名义到名义	Phi	.369	.000
连续性修正 ^b	630.339	1	.000				克莱姆 V	.369	.000
似然比	454.947	1	.000			有效个案数		4643	
费希尔精确检验				.000	.000				
有效个案数	4643								

a. 0 个单元格(.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66.20。
b. 仅针对 2x2 表进行计算

表5 克莱姆 V 值表

Degrees of freedom (table type)	Effect size		
	Small	Medium	Large
1(2×2)	.10	.30	.50
2(2×3 or 3×2)	.07	.21	.35
3(2×4 or 4×2)	.06	.17	.29

表6 CLEC 中 there be 句型涉及到的部分误用类型

误用类型	码	类型	说明	频数
词形	fm1	spelling	spelling, coinage, abbreviation, apostrophe	99
词语	wd3	substitution	error in word choice: right word class but wrong selection (any part of speech)	89
名词短语	np3	agreement	number agreement of a noun with its determiner or a word that refers to it	68
动词短语	vp3	agreement	number agreement with its subject (noun or pronoun error in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a sentence)	65
句子	sn8	structural deficiency	improper splitting, pattern shifting, confusing structure, etc.	49
词语	wd4	absence	omission of a word (any part of speech)	49
名词短语	np6	number	countable noun used with not determiner or -s/ a or -s with plural noun	46
词形	fm3	capitalization	lower initial letter for upper initial letter or vice versa	31
词语	wd2	part of speech	error in part of speech: right root but wrong word class	30
句子	sn1	run - on sentence	improper addition of clauses/fused sentence	26
句子	sn9	punctuation	overuse, absence, choice, apostrophe, comma splice, etc.	25
词语	wd5	redundancy	oversuppliance of a word (any part of speech)	24
词形	fm2	word	derivation, inflection, compounding, plurality (noun), irregularity (verb), 3rd person	20
动词短语	vp6	building tense	singular form (verb), syllabification, hyphenation, word division or fusion error in tense use within a sentence/the sequence of tenses between sentences	16

经筛选,与 there be 句式的使用密切相关的有 np3, vp3, sn8, sn1 和 vp6。

参照涉及到五个类型的 there be 句式,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英语作文产出中使用的 there be 句式有以下几个特征:

(1)there be 句式 and 别的小句并列连用(如: There are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y are usually very poor.[sn1,s]);

(2)there be 句式存在主体后动词形式使用错误(如:The world often changes, there are a lot of new things wait [sn8,s-] for us to discover. [sn1,s]);

(3)there be 句式 be 动词常用一般现在时态形式(如:When I studied in a high school, there are [vp6,-s] a national physical competition [fm1,-]);

(4)there be 句式 be 动词与后面的存在主体不一致(如:There are [vp3,s-] a large number of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5.2 there be 句式的语用特征

为探究there be 句式的误用情况,进一步了解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写作中 there be 句式的产出使用,本研究借助 AntConc3.5.7 对 CLEC 中的子语料库 ST3 和 ST4 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398 个含有 there be 句式的句子。其中的失误类型部分排序如表 6 所示,频数低于 16 的误用类型将不作为参考。

(5)there be 句式存在主体的定语和数量不一致(如:There are all kinds of view [np3,3-] on Job-Hopping.)。

其中,(2)中存在主体后的动词形式使用错误,即没有将动词名词化,而是 there be 后的部分自成一局,存在主体后使用动词。

5.3 调查问卷

由于第(1)、(3)、(4)、(5)条特征分别涉及到了标点、时态、一致性等其他语法层面,而第(2)条涉及到了该句式的句法层面的使用,所以本研究针对第(2)条特征设计了问卷调查,以探究造成此特征的原因以及英语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带来的二语负迁移现象。

首先,选择了青岛科技大学大一韩语专业某班级 24 人参加了此问卷的前测。研究数据信度系数数值为 0.883,高于 0.8,综合说明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本次问卷最终收到 442 份有效答卷。填答者

来自全国29个省和直辖市;女性占61.31%,男性占38.69%;大一学生占21.95%,大二学生占27.6%,大三学生占28.51%,大四学生占21.95%;文科专业占51.36%,理科专业占48.64%。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在英语作文中使用

there be句式的大学生达到96.83%,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占比61.54%。表明there be句式在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写作中很受青睐。初步判断there be句式在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存在超用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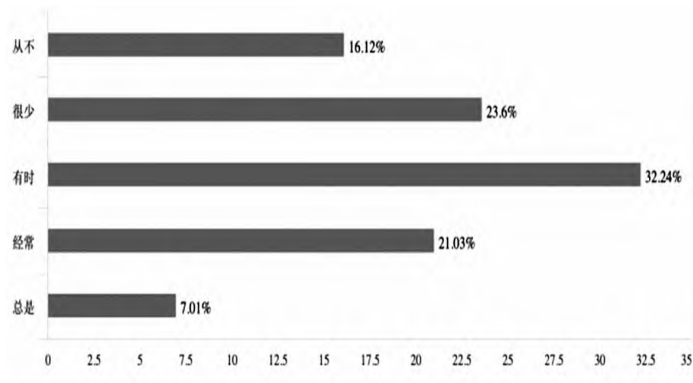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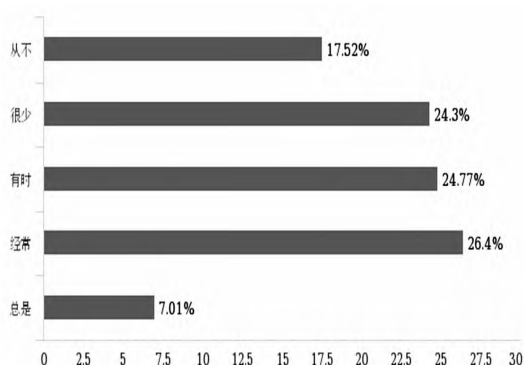


图3 第7题和第8题的填答情况统计分析

由于第5题量表题(我在英语作文中会使用there be句式)设置了跳题,所以第7题和第8题有效填答为442次。第7题和第8题都是量表题,题目分别为“因为我不觉得be是动词,所以there be句式后面的动词出错”和“因为我忘了be也是动词,所以there be句型后面的动词形式出错了”。两题的填答情况如图3所示。从中可以发现,有82.48%的大学生会忽略be是动词,表明中国大学生在使用存现句时普遍会忽略be的动词词性;有83.88%的大学生在使用该句式时会忽略be的动词词性,而导致动词形式使用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大学生在使用该句式时往往会忽略be的动词属性,即中国大学生大多知道在一句英文中只能出现一个谓语动词,但在使用该句式时,往往会忽略be的动词词性,从而导致存在主体后面的动词形式使用错误。

综上,中国大学生在使用there be句式时,存在主体后动词形式出错最可能的原因是忽略了be

的动词词性。正是由于英语存在型强势主位的特殊结构,there为主语,there be为主位引发语,而汉语中的“有”与英语存在型强势主位属性类存在结构中的“be”并不完全对应,其动词属性弱化,从而影响了中国大学生there be句式的使用,使存在主体后的动词保留动词词性。

由于英汉思维的差异,即一般认为英民族为强时间性思维,汉民族为强空间性思维,所以汉语为一种有动态倾向的语言,英语为一种有静态倾向的语言。汉语动词活跃,可以连用,也可以广泛代替名词,或广泛代替形容词,因而叙述呈动态;英语名词占优势,伴随着介词占优势,因而叙述呈静态。There be句式中存在主体后的动词名词化,正是与英语语言的静态特点有关,而中国大学生受母语汉语动态思维影响,在英语语言写作输出过程中没有很好的运用英语静态思维,而由于“be”为消极系词,所以there be句式存在主体后的动词没有名词化,而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所以要在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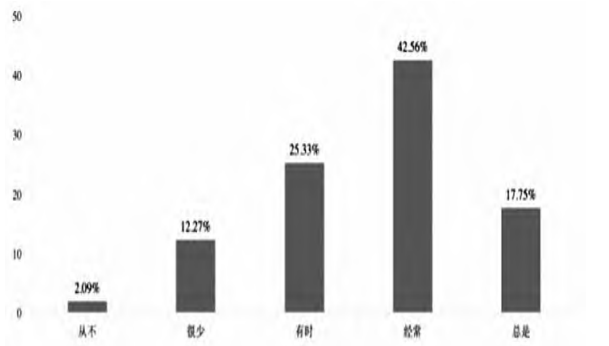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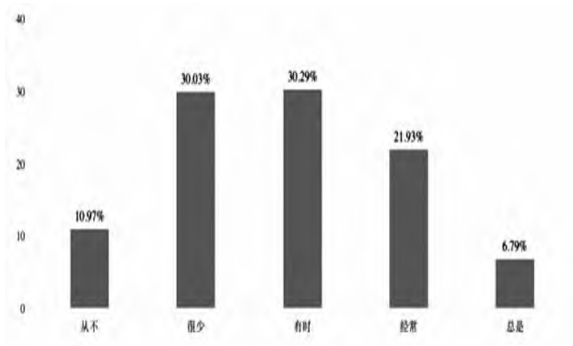


图4 第10题和第11题的填答情况统计分析

语写作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大学生的英语思维,有利于英语语言的正确产出。

由于第9题量表题(老师纠正过我的there be句式)设置了跳题,所以第10题和第11题有效填答为383次。第10题和第11题都是量表题,题目分别为“老师纠正了我的there be句式中动词使用错误后,我之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和“老师纠正我的there be句型中的动词时,我也同时可以意识到错误”。两题的填答情况如图4所示。图4表明,89%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在老师纠正过存现句后还会错误使用该句式。在老师纠正存在主体后的动词形式时,85%以上的中国大学生会同时意识到动词形式的错误,表明中国大学生是可以在there be句式中正确使用动词形式的。

调查问卷的结果表明:there be句式在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写作中很受欢迎,可能存在超用现象,因为there be与汉语中的“有”相对应而想到使用该句式。然而,中国大学生在使用该句式时,存在主体后的动词形式经常出错,而错误原因可能是产出there be句式时,be的动词词性常常被忽略。存现句中be的动词词性被忽略是因为英汉语言差异以及英汉思维差异,即存在型强势主位的特殊结构,弱化了be的动词词性,以及英汉语言的思维差异,使中国大学生将汉民族的强空间性思维应用到英语写作输出中,造成了二语负迁移现象。但这种错误在教师的干预下是可以被意识到并得到纠正的。依据Corder提出的三种语言错误类型(Corder 1973),这种错误属于形成系统后阶段的错误,即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经内化已形成比较完整的there be句式系统,但由于熟练程度不够,仍会出错,且学生知道错误的原因,能自行纠正。

6. 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TECCL_C和NESSIE对比检索there be句式,问卷的相关调查,以及在CLEC中ST3 & ST4的检索分析,发现因为there be与汉语中的“有”对应,所以存现句式在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写作中存在超用现象。经综合分析,总结出中国大学生there be句式常见的5大特征:a. there be句式和别的小句并列连用;b. there be句式中存在主体后动词形式使用错误;c. there be句式中be动词常用一般现在时态形式;d. there be句式中be

动词与后面的存在主体不一致;e. there be句式中存在主体的定语和数量不一致。经问卷调查分析,在存现句中,英语中的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弱化了汉语中的“有”以及英语中的“be”的动词属性,从而对中国大学生产出英语there be句式产生了负迁移影响,导致there be句式中存在主体后动词形式使用错误;并且受英汉思维动静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写作中输出存现句时易受汉民族强空间性思维影响,而使其在英语写作中出现忽略be动词属性并出现存在主体后动词未名词化的现象。所以中国大学生在英语作文中产出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时会忽略了be的动词属性,而根据Corder的语言错误类型理论,这种错误经纠错可以被大学生意识到并得到改正。本研究认为,可以对中国大学生there be句式的产出使用情况进行干预,加深学习者对该句式误用的意识,并最终成功习得该句式。

基于对中国大学生there be句式的相关研究,本文对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写作教学提出如下建议,以促进学习者的写作产出效能。

(1)学习者的英语写作中,书面纠正性反馈是有效的,没有注意就无习得(Schmidt 1990)。单纯接触目标语难以解决顽固性错误,故特别需要反复提醒与纠错(苏建红 2014)。写作模块虽然在大学英语各类教学模式都有涉及,但实践表明,由于作文反馈的延时性,其对学习者的纠错效果并不理想。而智能写作软件纠错的及时性,可以有效地帮助学习者意识到错误,不断强化词汇句法在作文产出中的正确使用。如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从语言、内容、篇章结构、技术规范四个维度对学习者的写作产出进行智能评阅,同时辅以教师的针对性评价指导,实现机评与人评深度融合,促进学习者书面语产出能力的提升。

(2)在大学英语教材研发方面,现行教材中的写作模块可适当增设作文纠错题型,充分利用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精选具有代表性的句法语用错误,设计改错任务,并与写作产出有机融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系列教材为例,由于学时缩减,目前大学生所使用的新视野系列教材中以《读写教程》为主,含有纠错题型的《综合训练》基本被忽略。因此,有效整合教材资源,最大限度地提升学习者的外语能力,是学界和教材研发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Corder, S. P. 1973.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Lyons, J. 1967. A Note on Possessive, Existential and Locative Sentences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4): 390-396.
- Schmidt, R. 1990.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 *Applied Linguistics* (2): 129-158.
- 常辉、赵勇, 2014, 冠词缺失与中介语法损伤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 10-16+92。
- 邓海龙, 2019, 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词汇语义动态发展研究——一种语义计算路径[J], 《现代外语》(1): 56-68。
- 邓仁华, 2007, 存在型强势主位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J], 《外语学刊》(5): 40-44。
- 桂诗春、杨惠中, 2003, 《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胡元江、石海漫、季萍, 2017, 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议论文词块的结构与功能特征——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J], 《外语研究》(4): 58-62。
- 黄冰、何安平, 2007, 中国大学生 There BE 句型习得初探[J], 《现代外语》(1): 57-64+109。
- 黄国文, 1996, 英语强势主位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3): 46-50+82。
- 黄国文, 1999, 《英语语言问题研究》[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李国宏, 2019, There 的“三域”及其主观化——以 there be 结构为例[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4): 72-80。
- 刘梅丽、王文斌, 2019,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存现式施事宾语句对比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1): 37-43。
- 刘明莉, 2016, 英汉存现动词体特征比较研究[D], 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芹、何蕾, 2017,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写作自主学习模式构建[J], 《外语电化教学》(6): 44-49+77。
- 娄宝翠、王莉, 2020, 学习者学术英语写作中自我指称语与作者身份构建[J/OL],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 1-7。
- 陆小飞、刘颖颖, 2019, 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程式语研究与教学应用[J], 《外语界》(5): 30-38。
- 孟庆楠、李基安, 2019, 英语临界情态动词构式变化研究——基于历时语料库数据的语言学动态图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6): 103-112。
- 苗兴伟、秦洪武, 2010, 《英汉语篇语用学研究》[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阮炜, 2020, Be 动词与 Have 动词的深层语义统一[J], 《外语学刊》(3): 1-11。
- 盛林, 2012, 二语习得中介语语体色彩的偏误分析——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66-70。
- 石洁琦、郑博文、陈建生, 2019, 基于语料库的体育院校英语高效教学探索[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6): 106-110。
- 宋晓舟, 2016,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专业教材词汇研究[J], 《教育评论》(8): 123-126+130。
- 苏建红, 2014, Bruton 与 Truscott 二语写作语法纠错之争[J], 《现代外语》(6): 855-863+874。
- 陶雪城、张萍, 2010, 基于自建语料库对 NBA 英语新闻标题的分析[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S1): 165-172。
- 王克非、刘鼎甲, 2018, 基于超大型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英语被动结构汉译考察与分析[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6): 79-90。
- 王龙吟、何安平, 2005, 基于语料库的外语教学与二语习得的链接[J], 《外语与外语教学》(3): 28-32。
- 王淑花、吴尚义, 2008, 基于语料库的学习者英语作文中 there be 结构的研究[A], 北京物资学院外语系编, 《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C]。语言与文化研究编委会, 5。
- 徐浩, 2013, 论虚指 there 结构的限定性效应[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 7-14+93。
- 徐亮, 2018, 基于语料库的中学生英语写作中“there be”结构使用研究[D], 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曼菲、何安平, 2016, 语料库技术促进英语深度阅读教学[J], 《中国电化教育》(12): 87-90。
- 闫长红, 2018, 英语课堂教学对基于语料库的词汇学习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S1): 94-96。
- 于善志、苏佳佳, 2011, There be 存在句习得中的定指效应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5): 712-725+800。
- 余阳, 2010, 网络体育英语新闻标题研究——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7): 151-154。
- 张继东、陈文, 2017, “There 存现构式”的语言特征研究——以存现动词为切入点[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 53-60+107+160。
- (刘 靖: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王 琳: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0-07-15

通讯地址: 266061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松岭路 99 号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学生 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探索*

曹 兴¹, 段振亚¹, 李庆领¹, 吕耀中²

(青岛科技大学 1.机电工程学院, 2.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青岛科技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改革实践,对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构建了以培养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为目标的课程体系。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为新时期本科生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跨文化交流; 课程改革

Investiga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Students in Process Equipment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Cao Xing, Duan Zhenya, Li Qingling, Lü Yaozhong

Abstract: With constant promotion of globalization,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Drawing on the reform carried out at process equipment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i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the intercultural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curriculum system aiming at fostering English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t proves that this approach has a favorable effect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which can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Process equipment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rriculum revolution

一、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本族语言者与非本族语言

者之间的交流,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流^[1]。近年来,我国综合

[作者简介] 曹兴(1984-),男,讲师,博士。

* 基金项目: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2016M006, M2018X134)。

国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提出,我国与沿线各国在经济、人文、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这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要求高校培养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熟悉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具有国际化意识的复合型人才^[2]。

2016年6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CEEAA)认证的工程专业,其本科学位将得到美、英、澳等该协议所有正式成员国的认可。此举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了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高校亟须拓宽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大学外语教学兼具“工具性”和“交流性”,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但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外语教学侧重语言技能的训练,过度强调“工具性”的作用,而忽视了“交流性”的功能,学生的实际交流能力得不到有效培养,跨文化教学更是处于弱势地位。在当前复合型英语人才需求较大的背景下,积极探索新型跨文化教学模式、加强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已经成为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任务^[4]。

青岛科技大学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前身为1958年设立的“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是青岛科技大学最早设立的本科专业之一。该专业也是山东省率先设立的本科专业之一,被批准为山东省品牌与特色专业和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并于2018年通过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近年来,本专业针对如何有效支撑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国际化视野”和“有效的沟通能力”等方面,不断开展探索与实践。

青岛科技大学在教育部“构建具有国际化意识大机械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改项目的支持下,决定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设立“本科生外语教学改革试点”。在高等教育外语教学改革的背景下,本专业立足于有效提

高工科专业毕业生的外语沟通能力,通过逐步建立具体、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以点带面,为新时期本科教学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主要对改革的思路和实践情况进行介绍,以期为新时期本科外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实施方案

按照本专业的教学改革思路,我们决定以2015级本科生为对象,采取学生自愿报名的方式,设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强化班,培养具有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在传统英语教学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强化班的英语教学体系。在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同步强化训练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能力,并将中西方文化对比贯穿教学全过程,着重强化本科生的英语水平,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培养方案的制定需要重点突出以下原则。

1. “订单式”教学原则。在完成专业培养计划的基础上,我们为强化班的学生单独设置了培养方案,增加了拓展提高类课程,实行小班化、精英化培养,以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的需要。

2. “全程式”教学原则。从新生入学直至本科毕业,强化班各学期均安排了不同层次的英语课程,分阶段、持续性地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确保学生在英语应用与交流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

根据教学方案,强化班的英语课程包含通用课程和拓展课程两个模块。第一学年以通用英语教学为主,强化学生的基本语言技能,夯实基础,使其为后续的进阶课程做好准备。我们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开设了必修课“大学英语A1”和“大学英语A2”,并增设了“演讲”“英语视听说”“时文阅读与写作”等课程。

第二学年继续强化基本能力的训练,同时将涉及英美文化知识的人文课程有机融入课程体系。我们开设了“大学英语交际口语”“跨文化交际”等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第三学年在夯实英语基础的前提下,本专业

开设了“机械英语导论(双语)”“科技英语翻译”“科技论文写作”等课程,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及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第四学年开设了“专业英语”“学科前沿讲座及文献检索”“世界工业标准概论”等课程,以英文讲授为主,使学生熟悉国际化标准和规则。同时,我们采取与国际化企业共建国际工程师培训中心或联合培养的方式,选派学生到外资、合资或涉外企业等具有良好跨文化环境的企业完成毕业设计,培养学生运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和跨文化适应力。

3.多元评价原则。与以往过分注重终结性评价不同^[5],强化班采用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并突出过程性评价在学生英语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教师通过课堂互动、随堂测试等活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有效评价,根据学生学习效果及时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案,以便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终结性评价也有别于传统的期末考试形式。以第一学期考核为例,学生自拟题目,结合多媒体进行演讲,我们邀请外籍专家、外国语学院教师及本专业教师共同组成考核小组,针对学生演讲主题进行提问,并参照评分标准,对学生演讲的选题、PPT制作、演讲、交流等方面进行打分,最终分数作为学生期末考核成绩。

三、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效果

为了建设并完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我们针对强化班的授课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强化班的教学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73%的强化班学生对于英语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主动性明显增强;93%的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92%的学生认为与传统英语授课模式相比,强化班的授课方式更加灵活、先进,授课内容更加新颖、充实,授课强度和信息量更大;92%的学生认为该模式非常有必要,值得大力推广。

强化班的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外语知识,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外语交流能力,提高了其跨文化素养。在期末考核中,考核专家给优秀学生的评语中提到“被考查对象的英语口语和应用能力

已经高于研究生复试时考生的平均水平”,可见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有了较大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显著提升,国际化视野明显拓宽。

为了评价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效果,我们对2015级本科生英语考试成绩进行了对比分析。以第一学年为例,经过第一学期的试验,非强化班学生“大学英语A1”的平均成绩是73分,而强化班学生的平均成绩达到81分,比非强化班提高了10.9%;非强化班与强化班的最高成绩相当,分别是91分和93分(见图1)。第二学期之后,非强化班学生“大学英语A2”的平均成绩和最高成绩分别是65分和79分,而强化班学生则达到73分和88分,与非强化班相比分别提高了12.3%和11.4%(见图2)。此外,非强化班学生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次通过率仅为45%,而强化班学生则是78%,可见强化班的教学改革优势明显(见图3)。以上表明,强化班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实现跨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的预期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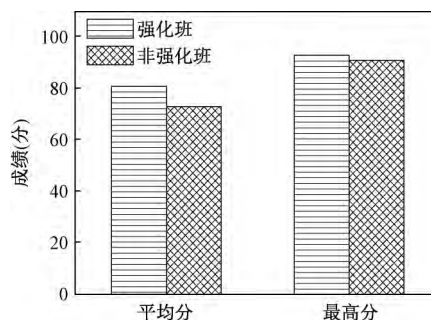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英语A1”考试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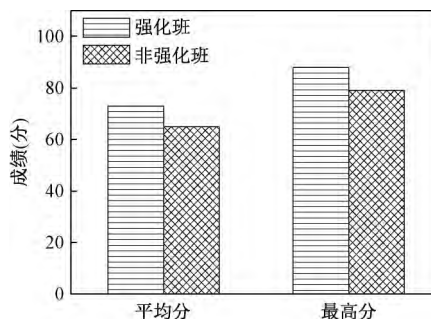


图2 “大学英语A2”考试成绩

四、结语

本次试点在2015级本科生中设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强化班,是在继承本专业办学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大学外语课程体系的创新之举,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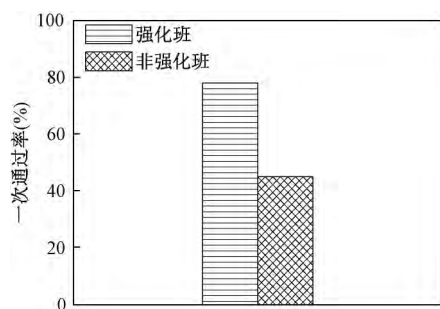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一次通过率

应了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强化班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培养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提高其综合素养。本次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一套适用于新形势下本科人才培养的模式,为本专业及外语专业的专业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作为一项新型教学改革项目,本次改革涉及两个学院的分工配合,由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目前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如授课教师的教学时间与精力投入都将极大地增加,如何调动教师投入教学改革工作积极性的问题亟待解决。另外,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强化班的少部分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这主要是由于其对未来工作的定位不清晰。随着当代企业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这一问题会得到解决。要加强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除了课堂讲授,大力营造跨文化交流的环境与氛围也很重要。在后续的教学改革中,我们将开展专题讲座、学术报告、演讲、辩论等与跨文化知识运用相关的活动,吸引大学生主动学习,努力提高个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文字编辑:李丽妍)

参考文献:

- [1] 王福祥. 文化与语言论文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2] 成雪岩. “一带一路”国际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途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 36(27): 9-11.
- [3] 王守仁.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要点解读[J]. 外语界, 2016(3): 2-10.
- [4] 曹路漫. 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J]. 中国高等教育, 2011(23): 56-57.
- [5] 金艳, 何莲珍. 构建大学英语课程综合评价与多样化测试体系: 依据与思路[J]. 中国外语, 2015(3): 4-13.

(上接第12页)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社会伦理道德及责任感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尤其需要校园环境的熏陶。不可否认,当前我国高校的工程伦理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无论从社会还是个人的角度出发,形成工程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工科类高校的工程伦理教育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教育机制,在课程定位、教学、教材等方面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暴露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人才缺乏的问题。未来,高校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切实有效地完善教学方案。此外,社会各界、工程组织和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携起手来,聚

焦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途径,挖掘实践案例,汲取经验教训,提升高校学生的伦理素质。

(文字编辑:李丽妍)

参考文献:

- [1] 苏伯格. 技术理论批判[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梁军. 工程伦理的微观向度分析[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6, 38(4): 9-16.
- [3] 杨少龙, 徐生雄, 樊勇. 近15年来国内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综述[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46-50.
- [4] 李世新. 借鉴国外经验, 开展工程伦理教育[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8(2): 48-49.

生肖文化在剪纸艺术中的呈现与对外传播

□赵洪娟

【摘要】生肖文化是民俗文化的一种,生肖动物是中国民间剪纸的重要题材。生肖文化通过在剪纸艺术中的呈现得以广泛传播,而剪纸艺术则以生肖文化为主题得以发展传承,二者互为载体,互促发展。生肖文化起源于民间,在剪纸艺术中呈现,生肖剪纸具有欣赏价值和实用价值,其欣赏价值担当了文化传播的重任,而实用价值则承载了民俗功能。

【关键词】生肖文化;剪纸;属相

DOI:10.16017/j.cnki.xwahz.2017.11.020

一、前言

十二生肖又为十二属相,古时称十二兽、十二神、十二禽等。十二生肖纪年最早始于十二兽纪辰,《蒙鞞备录校注》记“又按明陆《深春风堂随笔》云: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为人命所属,莫知所起”。^[1]而关于十二生肖所属“属相”的记载则最早见于南北朝时之文献,如《庾开府集笺注》记载,“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当时已有此语”。至宋元之时,关于生肖属相的记载逐渐增多,至明时学贤即开始讨论十二生肖之源起,李诩、杨慎等认为,子鼠丑牛十二属之说朱子谓不知所始。对于生肖起源,学者各抒己见,虽未有共识,但大多认为十二生肖主要源于图腾崇拜、动物崇拜和天文星象。

十二生肖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关联密切。“生肖文化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传统纪时、纪月、纪年的历法,更主要的在于由此衍生、发展出许多同人生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事象”^[2]。经由民俗事象,又可逐渐衍化出诸多民俗活动及艺术。作为民俗文化阐释符号的十二生肖是民间剪纸艺术的重要题材,而剪纸则是对当地民俗生活、民俗文化的一种表达,其可生动、传神地展现传播生肖文化,二者互为载体,互动发展。挖掘、开发生动多彩的生肖文化,而后用剪纸这一带有强烈生活和艺术感受的表现方式,同时用其虚实切换、粗细结合的线条将十二生肖动物传神地展现出来,二者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通过考量生肖文化与剪纸艺术的互动关系,本文将深入探讨生肖文化在剪纸艺术中的呈现方式及对外传播途径。

二、生肖文化在剪纸艺术中的呈现

(一)十二生肖是剪纸艺术的重要主题

关于剪纸与人物、生肖的结合最早可见于南北朝时期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其中有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3]此处的华胜,最初时又叫人胜,即剪、镂出的小人儿,剪出的华胜可谓最早的剪纸。正月初七为人日节,为祈求生命繁衍、兴旺昌盛,则多用纸张剪出连串的小人贴在窗格之处或头鬓之上,以示祈愿。而后随着人日节的兴盛及生肖文化的发展,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逐渐发展出人日节时剪作“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老鼠灯”等图案,以作节日庆贺之礼。人日节衍生附会出老鼠嫁女及老鼠娶亲等传说及其他民俗,主要出于对老鼠极强繁殖能力的崇拜,期望各家各户均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最初之时,将鼠作为子神,作为十二生肖之首,必定是对其繁衍能力的崇拜。

以十二生肖为主题进行剪纸创作的地区当属山东高密。高密位于胶东半岛东部,东依青岛,西靠潍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剪纸、泥塑与扑灰年画并称“高密三绝”,它们将高密的传统文化与丰厚民俗延传至今。高密的剪纸历史非常久远,虽具体起源时间暂不可考,但其自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兴盛至清朝时期达到辉煌鼎盛的发展历史至今还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剪纸艺术在高密可谓深入人心,各户人家虽不是人人都能剪出一种动物,但各家主妇还都是有自己拿手的一两个剪纸样式的。高密剪纸因其风格粗犷而细腻,样式喜人而多变,以十二生肖为题材、突出而鲜明的剪纸特

色在胶东一带独成派系。其动物剪纸风格独特,即便有人物的融入,也多是人怀抱动物或托举、骑坐动物等主题。

为寻找生肖文化和剪纸艺术的相关资料,笔者在2016年6月到7月间多次拜访了高密剪纸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范祚信老先生。范老出生于1944年,生活在高密市井沟镇河南村,主要以务农为生,其祖先早年由山西迁居山东。老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剪纸巧手,在儿时他对剪纸非常着迷,常常缠着母亲要求学习剪纸,等稍大些的时候,在掌握了基本技能之后,他就琢磨着如何自己创作新的花样。翻看老先生所有的剪纸作品,发现主要主题都是人和动物,十二生肖一应俱全。关于为何以十二生肖为剪纸主题,老先生认为一来是因为本村自古以农耕为主,农家生活不免天天与马牛羊猪狗相关联,见得多了体会多了自然也就有了想法;二来可能是本村村民的先祖特别重视生肖,所以在剪纸作品中生肖较多;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有几个剪纸能手都爱剪动物,结果带动了大家剪纸动物的热情。

展现生肖文化的剪纸样式多种多样。以范老的作品为例,其作品中不仅有形态各异、活泼灵动的十二生肖动物,还有诸多半人半兽的剪纸样式,具体包括鼠头人身、虎头人身、半龙半人等内容,此类造型可谓古代半人半兽形象的图腾崇拜的体现,中西古代文明中均多有记载。如中国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埃及人首蛇身的守护女神瓦吉特,波斯人首鸟身的祭司,以及雅典的人头马、埃及的狮身人面等均是古代信仰崇拜的主体。老先生的每一幅生肖剪纸都是一个生肖故事,一幕生活展现,因其将生肖动物与人结合在了一起,而非孤立的动物体现。老先生1991年已有《中国民间十二生肖剪纸》作品集出版,他现在的愿望是将近十几年剪出的生肖作品集成册子,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村的民俗生活,了解生肖剪纸艺术。

(二)生肖文化融民间故事、生活习俗与剪纸艺术于一体

真正的生肖剪纸艺术并非仅是呈现一种姿态可爱、招祥纳瑞的动物形象,而是将与生肖相关的各种故事及生活习俗融入其中。由于生肖文化亦是民众对生活现象和规律的总结,通过剪纸艺术讲述生肖故事,展示生肖文化内涵,即用一种艺术叙事呈现另一种艺术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以鼠为主题的剪纸则更为丰富多彩,因为很多地方目前仍保留着每年正月初七过“人日节”的习俗,根据传说正月

初七不但是人的节日,也是老鼠娶亲的节日,“老鼠娶亲”这类剪纸在各地极为流行,许多民间剪纸艺人都进行过各式创作。

许多地方的剪纸一般仅用于装饰窗户、房间等,但在胶东一带其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以婚嫁为例,订婚、请亲、纳彩、拜堂等处处都要用到图案各异的剪纸。如若男女双方相互相中之后,男方需去女方家送彩礼,也就是形式上的订婚,在当时称为“定亲”,定亲之时男方需将提前准备好的上百个两斤多重的大馒头及其他各种鸡鱼猪肉装满大筐小笼送往女方家,且每一个筐每一个笼中都需放上事先剪好的剪纸,剪纸样式多以喜字打底,字上衬托新郎、新娘的生肖属相。

除婚嫁外,生肖剪纸也被广泛应用于贺寿等场合仪式中。由于老虎被称作林中之王,也多与长者和威严相关联,因此当地生肖虎的剪纸多以寿字打底,威猛之虎立于寿字之上。祝寿之日,寿虎剪纸多被贴在桃子形状的面饽饽上,当地人将其称为寿桃,寿桃之上再加猛虎之寿,寓意老人愈加虎虎生威,长命百岁。此外由于老虎威武异常,还被看作是丰收的象征,所以北方很多剪纸作品亦将老虎与收成结合起来。再者,老虎也多与孩童相关联,较为常见的成语就有“虎头虎脑”“虎虎生威”等,因此在胶东剪纸中,多有孩童将猛虎高高举起的作品,以预示孩童的威猛之势强于老虎。范老先生的老虎剪纸也多是威猛之中透着可爱。

生肖剪纸具有欣赏价值和实用价值,其欣赏价值担当了文化传播的重任,而实用价值则承载了民俗功能。过去遇到干旱,需要祈雨之时,胶东百姓除了去当地龙王庙求雨外,鉴于龙与雨的密切关联,还会请村里或乡里的巧手们裁剪一些龙的剪纸,将其放进水井、池塘等处,以此祈雨,据当地百姓说,老一辈儿人说在水塘之处放置龙形剪纸,效果非常灵验。

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常常有“白马怕青牛”“黑猪反猴”“龙虎两相斗”等迷信忌讳。以猪猴相克为例,为破解夫妻不和或生活不美满,有些人家就将有一只长鼻子猪上骑着一只小猴样式的剪纸贴在家中,意味着猴子骑在猪身上,黑猪反不了猴,且寓意猪猴是象猴,一起到白头。^①剪纸中积聚了此类民俗信息,反映了民俗文化主体,即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

近些年来,我们用剪纸艺术不断呈现十二生肖文化,同时又将生肖剪纸作品印刷在邮票、明信片等物象上在海外发行,这种做法不但传播了生肖文化,

而且传承、发展了传统手工剪纸艺术,二者互为载体,既体现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又展现了欣赏价值,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生肖文化与剪纸艺术的对外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其有利于在互动交流中实现文化的发展^[4]。据笔者调查,走向海外的中国剪纸图案十二生肖占较大比重,相较于京剧脸谱、花草树木等内容,反映农耕生活、与命理运势密切相关的生肖剪纸更受外国人欢迎,这与西方亦有与命相运势相关的十二星座文化不无关联,不同文化的相通与共性更易于其交流与传播。如何真正地让我们的生肖文化、剪纸艺术“走出去”,与西方文化对接互动,克服文化交流中的负迁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一)生肖剪纸邮票海外遍地开花

对外传播主要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且具有受众国际化、目的明确化、传播方式多样化等特征^[5]。若要推动生肖文化的对外传播,发行带有生肖图案的邮票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生肖邮票已被公认为是世界上连续发行时间最长,题材内容最统一的主题”^[6]。此外,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物质载体与文化价值内容同样重要,海外国家生肖邮票的发行,不仅使异文化者认识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生肖邮票,而且生肖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也得到了一定展现。自1950年日本发行第一枚生肖虎邮票伊始,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发行了生肖邮票。大量生肖邮票的海外发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域外呈现的重要渠道。

以1996年鼠年与2016年猴年为例,1996年亚洲、非洲、欧洲的众多国家发行了生肖剪纸邮票,其中越南以中国民间故事为主线,设计了鼠新郎、鼠新娘、老鼠娶亲乐队三种形式的邮票,不仅让越南人了解了中国的生肖,而且使中国的民间故事亦得以传承。当年,冈比亚发行了丙子鼠剪纸,加纳发行了四只老鼠轿抬新娘、老鼠娶亲的邮票,而帕劳则发行了10只老鼠娶亲的生肖邮票。此外,鼠年的剪纸灯笼,单纯的剪纸老鼠的邮票在各国的发行更是数不胜数。2016年,英国根西岛、加蓬、美国、列支敦士登特别发行了剪纸风格的生肖“猴”邮票,这一年邮票的设计大多邀请华人设计师操刀,由此将更多的中国

文化、中国元素融入其中,不但向海外传播了生肖文化,而且极大推广了剪纸艺术。

因此,将剪纸艺术与生肖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生肖剪纸邮票的发行,传播了剪纸艺术,承载了生肖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任。相较于泥塑、雕刻等艺术形式,剪纸作品因具有取材便捷、视觉呈现效果明显、鉴赏价值高、易于推广等特征,在国际传播中拥有独特优势。

(二)生肖文化、剪纸技艺绽放对外汉语课堂

对外汉语教学是专门针对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者开设的课程。由于外国学习者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拥有同样的兴趣,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仅要教授给学生可用于日常交流及其工作交际需要的汉语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文化的交流学习来进一步提高其汉语能力,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以生肖文化为例,许多外国人看到十二生肖时因不能真正了解其文化的意义和精髓,仅将其看作是十二种形态各异的动物,某些动物反而会让其感到恐惧,如龙、虎、鼠等。因此生肖文化的对外传播不能仅仅以展览的形式展示之,而是希望外国人能真正了解其背后蕴含的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以生肖龙为例,我们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神圣之物,而外国人大多将其看作是非常惊悚、让人惧怕的怪物,是罪恶的象征,文化的不同造成了诸多认知上的隔阂和差异。如何消除生肖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误,克服给汉语习得带来障碍的负迁移现象,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此外,孤立地介绍十二生肖文化给异文化人群,有时会略显枯燥和单一,搭载某种艺术形式的生肖文化传播想必更具意义。若将生肖文化和剪纸艺术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应用到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去,不但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效率,亦可使其充分理解、深刻体会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内涵。

因此,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在给外国学生讲解生肖文化时需首先介绍一下生肖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生肖“龙”为例,教师在讲解时可由龙的传说、故事,龙图腾在中国先人生活中的意义入手,向学生作“龙”的相关介绍;而后向学生展示有关“龙”的各式剪纸,让学生了解到龙在中国文化中是威严、崇高、可敬之物,而非罪恶、恐惧之代表。此时,当学生的文化负迁移逐渐消除,对龙文化的兴趣逐渐产生时,则应积极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参与“龙”的剪纸,调动起其学习生肖文化的积极性,丰富课题生活。同

时,中国剪纸艺术所体现的美的期许、寄托,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亦可通过这种生肖文化的教授得以呈现。

总之,将生肖文化、剪纸艺术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不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效率,同时由于将民俗文化渗透到文化类教材中去,极大地增强了此类教材的趣味性、多元性和文化厚重性。

(三)海外展览、文化艺术节呈现中国民间技艺

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在生肖和剪纸的对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而海外展览、文化艺术节中所呈现的生肖内容和剪纸艺术却引起了外国人的广泛兴趣。以美国俄亥俄州为例,每年5月,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都要举行规模宏大的“亚洲节”,每到节庆之日,中、日、韩、马来西亚等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艺术展演就齐聚一堂,不仅让身处异域的亚洲人尽情回味了家乡文化艺术,而且深深感染了当地的美国人。2014年亚洲节时,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几名河南籍留学生就进行了剪纸技艺的展示,同时对中国剪纸的历史、发展做了详细阐述,引起众人围观欣赏。除此之外,美国的社区公共图书馆对民众免费开放,也欢迎不同背景文化的民众进行优秀作品展览。这种展览为中国生肖、剪纸艺术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机遇,让外国人不仅惊叹于中国手工艺的伟大,而且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人热爱生活、期许幸福安康、友爱和善的品质。若此时将生肖内容融入剪纸,不但可增加剪纸艺术的花样,活泼可爱的生肖还能吸引更多人群了解、关注中国文化,尤其能引起孩童的兴趣。

我们的民间文化因其民族性及与异文化的差异性,在最初时对异文化者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和吸引,但最初的印象和冲击消失之后,又会因其独特性和历史性,较难被异文化者所理解和接受,所以在文化“走出去”时需要做到原文化与异文化的适度结合。也就是说,“传播者在选择传播内容和方式时要有所取舍、提升与创新,注重对世界文化共性的展示和文化差异的改造,注重用现代元素展示传统文化主题”^[6]。

笔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访学期间,在哥伦布市上灵顿区图书馆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剪纸作品的展览。所展示的作品均为我从国内带去的生肖剪纸,之所以展示生肖主要源于美国人对星座的认可和了解,十二生肖与十二星座在某些方面的匹配使他们能更加理解我们的生肖文化。展览期间,我一方面尽可能地将与各个动物有关的生肖故事及生肖的文化意义讲解给外国友人听,同时指出生肖和星座的异同;另一方面也以笔者拙劣的技艺剪出一些简单的

花草及星座图案剪纸,但当外国友人看到他们熟知的星座图案竟能通过一把剪刀在一张纸上被如此奇妙地呈现出来,无不感到震惊。但由于笔者仅会简单剪纸,对复杂图案无能为力,不能现场展示,不失为一种遗憾。希望以后我们的留学生在做类似展览时能现场展示更高的剪纸技艺,也希望中国的剪纸艺人能走出国门,将其精湛的剪纸技术呈现给外国友人。

四、结语

生肖文化与剪纸艺术可谓互为载体的民间文化传承方式。生肖文化将生活习俗、民间故事融为一体成为剪纸艺术的重要主题,而剪纸艺术又通过其独特的视觉呈现效果、极高的鉴赏价值等特征将生肖文化用多样化的艺术展现方式予以呈现。让中国丰富的生肖文化和精湛的剪纸技艺走出国门,开展对外传播,更有利于其在多文化交流中实现进一步发展。通过海外生肖剪纸邮票的发行,对外汉语课堂中生肖文化和剪纸艺术的融入,海外展览和文化艺术节中生肖剪纸作品的大力推广展出等多种文化对外传播方式的运用,将极大地促进生肖文化和剪纸艺术的传播。随着时代变迁,习俗更易,生肖剪纸的样式内容亦在不断发生变化。如何通过剪纸艺术将生肖文化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承下去,如何借助泥塑及由此为基础衍生出的动漫、影视产品将生肖文化传播出去,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为山东省社科联2016年年度课题(16-ZZ-WX-12V);山东省社科普及课题“图说山东民俗文化”的阶段成果]

注 释:

①关于猴骑猪的剪纸除在山东高密某地方过去有所流行之外,周卫先生在《中国民间十二生肖剪纸》一书的序言中亦有提及。

参考文献:

- [1]孟珙.蒙鞞备录校注[M].清光绪二十七年刻笈经室丛书本.
- [2]曲彦斌.生肖文化考(上)[J].文化学刊,2012(4).
- [3]宗懔.荆楚岁时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15.
- [4]赵跃.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交融: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问题探析[J].理论学刊,2014(2).
- [5]郭可.当代对外传播:全球传播丛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9.
- [6]李楠.民间生肖文化传播的当代意义[J].现代传播,2013(6).
- [7]张莉.民间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文化调试[J].河南社会科学,2014(9).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讲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

《〈诗经〉翻译探微》述评

□ 赵洪娟

中图分类号: H315.9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23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浪潮推动下,典籍翻译及其研究层出叠见。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海外传播,开展各种典籍翻译的热潮中,我们不禁要问,典籍外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把中文典籍变成异语言所要达成的愿景是什么?由此总结出的典籍翻译的原则方法又是什么?对于上述疑问,李玉良教授的《〈诗经〉翻译探微》一书作了颇为深入的探讨。

李玉良教授从《〈诗经〉英译研究》之宏观视角探究,到《〈诗经〉翻译探微》(以下简称《探微》)之多译本、译家批评及《诗经》翻译的多角度微观分析,历时十载,朝乾夕惕,孜孜不倦。《探微》一书不但从翻译技巧方面给予了一定剖析,最主要的是通过方法论的阐述分析,在翻译思想以及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两方面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作者以许渊冲、汪榕培、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詹宁斯(M. A. William Jennings)、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1844—1920)等中外译者《诗经》英译本为根据,对《诗经》名物翻译的文学性、《诗经》韵律翻译的价值规律、《诗经》意象翻译的可能与否以及《诗经》的修辞和题旨翻译等六个方面展开“中西会通的尝试”,^①并对典籍

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规律、方法进行了颇有启发性的探究。

探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一定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要把典籍翻译“跳出简单的两种语言转换的层面,一定要把翻译的问题放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社会背景之下,去审视、去思考”。^②《探微》指出,经传、笺、疏、注得以实现,成为政教工具的《诗经》,对其开展的语内翻译实际上就是翻译《诗经》文化,而《诗经》文化就是《诗经》接受史,是其在传承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的深刻影响。^③而对于《诗经》的跨语际翻译则不免要涉及翻译与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中国典籍翻译从译者到译本都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以译者为例,不仅有传教士、汉学家,还有大量的诗人、文学家也涌入到中国典籍翻译的浪潮之中;且在20世纪30年代,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和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相继在美国成立,美国的汉学研究一度展现了勃勃生机。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无论是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翻译,还是以西方读者的接受性为关注点的归化翻译,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的内部危机。正如周宁所言,无论是丑化中国形象,还是美化中国形象,其背后不变的是西方现代性构建中的话语构成原则,^④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外来宗教与中国中古节日风俗嬗变”(项目编号:17YJC770045)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西平:《〈诗经〉翻译探微·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

② 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东吴学术》2013年第2期,第47页。

③ 李玉良:《〈诗经〉翻译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8页。

④ 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页。

是出于要改造并完善自身文化的一种迫切需要。诚然, 由于被翻译作品在译者的掌控下, 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又会搭建出新的话语空间。因此, 此时的典籍英译便成为解决西方文化内部危机的重要工具。以《诗经》为例, 外国译者的典籍英译多是“因《诗经》之名, 行创作之实”,^① 借鉴别的民族文化来发展和完善本民族文化。

此外, 由于文化交流的意义主要源于两种文化间的差异, 因此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目的的典籍翻译, 其译本都应忠实原作。以史为鉴, 在侧重解读翻译文本的同时, 要关注历史, 探析源语在其历史语境下的意义。但实际上, 要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让我们的“异文化”被认同和接受, 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有自己的原有文化, 需根据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 选择恰当的文化传播和翻译策略。简言之, 从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综合角度考量文化传播和典籍翻译策略, 这不免要涉及《诗经》的意象翻译问题。

何为意象? 庞德认为意象是在一瞬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种思想, 而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② 在 20 世纪初期, 掀起了西方哲学、美学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危机进行批判的浪潮, 为解决其内部文化危机, 为西方文明探寻出路, 诸多文人试图在东方国度的东方文化中寻找希望。庞德的翻译就是为了颠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是寄希望于翻译活动创造出新的话语空间的一种尝试。庞德作为诗人, 而非汉学家或翻译家, 其尝试中国古籍翻译的目的就是“改革美国诗歌艺术形式, 完善其于 20 世纪初所提出的意象主义诗学”,^③ 为西方文化服务。因此庞德用意象主义理论指导诗歌翻译, 对《诗经》原意象的改变程度之大便可想而知。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活动, 实际上是一种再叙事的体现。因“叙事是一个或数个叙事者向另一个或数个受众讲述一个或多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事

件”,^④ 《诗经》翻译作为文本叙事的一种, 译作的失真、意象的扭曲以及内涵的缺失必为常见之事。对于意象翻译中存象失意的问题, 《探微》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 译者和原作者既不处于同一时代, 又不处于同一文化背景, 二者在意象寓意问题上不存在共有信息, 因此对于存象失意问题不要过分归责于译者。此外, 《探微》不但对有关《诗经》意象的文献史料进行了爬梳剔抉, 而且对意象在西方文献中的意义进行了详细考证, 对中西意象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探微》还指出, 《诗经》中的原始意象多来自神话体系及具有隐喻性的周代民俗。而对意象的翻译问题, 詹宁斯强调意象的文学特征, 而许渊冲则认为其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达最为重要, 作者指出要实现《诗经》翻译的上述目的, 最有效的操作方法就是在译文后面加以注释。诚然, 若译者在正文翻译之外, 多提供文化和历史背景信息, 对典籍中所涉及的难以理解的物象做出面向当下的诠释, 必能极大地促进读者对译文的接受。

实际上, 要使《诗经》意象在语际翻译中得到有效传达, 语内诠释是其必要前提和基础, 因此需对典籍的训诂和阐释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所谓训诂, 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整理及古籍文献的意义阐释。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训”之含义为“训者, 说教也”,^⑤ 班固《汉书》中提到“诂”的含义则为“师古曰: 诂谓指义也”,^⑥ 实质是指解释古代汉语之意义。由于典籍的英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古代思想文化的一种再创造, 而这种再创造必然要建立在合理的语内诠释的基础上, 若语内诠释背离了古籍文献本意, 那忠实可靠的异语翻译和文化传播便无从谈起。《探微》以“睢鸠”为例, 指出不同译者对“睢鸠”理解不同, 其英译亦多种多样, 有些翻译完全相悖于“睢鸠”为性情凶猛的鱼鹰之本义。如理雅各和韦利将其译成“osprey”, 庞德译成“fish-hawk”与“睢鸠”原意基本一致, 而高本汉的“ts'u-kiu bird”翻译

① 《《诗经》翻译探微》, 第 239 页。

② 同上, 第 280 页。

③ 同上, 第 240 页。

④ Gerald Prince, *The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7, p. 58.

⑤ (清)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 3 (上),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第 183 页。

⑥ 《汉书》, 卷 87 (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第 3514 页。

则不知其所云。此外,作者还指出英国阿连壁的《鹊巢》翻译基本是无视训诂,任意篡改字义之作,目的是为迎合英国读者的审美诉求。外译中出现此种意义背离,除了与译者的理解、翻译目的有关之外,概与译者所用的训诂译本有一定关联。因此在典籍翻译时,译者所使用的训诂译本应当选择善本。所谓善本应该是校勘缜密,讹误较少的版本。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认为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史越久远,古史中的人物就越被放大,顾先生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典籍的版本,越古老的版本越发可靠。

《探微》中特别强调了训诂的意义,认为重视训诂与注疏是翻译好《诗经》的第一法门。对于后人为《诗经》所做的《诗序》,其认可的翻译原则为正确的要翻译,错误的也要翻译,但一定要做出必要合理的说明。这种原则的坚持主要是从文化传播和文化接受的角度予以考量,因各种对《诗经》的传、笺、疏、注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创作和传播。因“翻译不仅赋有忠实于原作的道德义务,而且赋有建设本民族文学和文化,满足本族读者什么需求的道德艺术”,^①而且阐释是人对存在的理解,^②所以对《诗经》传、笺、疏、注的语内翻译诠释和将其翻译成外文的语际翻译在建设民族文学和文化,满足读者的艺术需求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除具有五经之首、文学之源的地位之外,其独特的迭句、迭字、迭韵,适于吟唱的诗歌韵律表达方式亦彰显出其独到的魅力;而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表现手法,则刻画出了自西周到春秋时期生动的民俗生活画面。因此,《诗经》的韵律翻译规律和民俗事象也是《探微》一书探讨的重要内容。

在近代,西方传教士曾在中国进行过大量的文化交流传播工作,他们曾试图用中文写诗歌,或将其赞美诗翻译成中文。传教士在最初翻译基督教的赞美诗时,为符合中国的诗歌表达习惯,多用浅近的七字或五字文言进行表述,虽然这种翻译既不符合赞美诗的特点,也不符合赞美诗的

音乐乐律,但他们认为这样的翻译更具接受性,更能被中国人所认可,如“行善修持品最高,随时检点用心劳。恶人道路休趋向,敬畏圣神莫侮污”等。^③《诗经》在古时为吟唱之歌,对韵律十分讲究,但对《诗经》英译时是否用韵,如何用韵的问题,学界争论已久。对此问题,我们在《探微》一书中找到的答案是:《诗经》译韵虽然难度较大,但不能成为不进行韵律翻译的阻碍,《诗经》为诗歌,诗歌必有韵律;此外,因东西文化中诗歌韵律的差异和审美习惯的不同,译诗韵律当不必与原诗韵律一致,若《诗经》译文能为英语文学输入新鲜血液,并让译文读者了解《诗经》的本来面目,翻译的目的便就此达到了。

此外,典籍翻译要有跨学科的研究和思维方式,不能在增译、减译、正说、反说等翻译技巧方面过于纠缠,而是应该将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美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和方法融汇其中;在对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关照之后,从多角度解读文本,解除翻译仅是文字间的字面转换和对译的误解。《探微》立足于语料,通过多译本比较分析,既考量单个译本的独特之处,又对所有译本的共通点进行了细致分析,为读者了解《诗经》的翻译状况提供了非常综合而全面的分析。由于民俗文化是“民”的文化,最能真实地反应民众生活及文化习俗的内容,不论各国家民族在具体习俗习惯上有多大不同,其作为“民众”的一员,必具有“民”的共通之处。若在忠实翻译的基础上,较好地保有原文化的民俗事象和意象,不但能反映出译者的文化态度,而且更能为异文化读者所接受,更好地实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在《探微》中,作者指出韦利的《卫风》译文就是从民俗学的视角进行的阐释翻译,英国读者亦较为容易理解。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这种考量、融入民俗文化的翻译,不但较大程度地反映了原文化,而对文本的塑造和异文化读者的接受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方式。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实践摸索中,《〈诗经〉翻译探微》一书的出版对中国文

① 《〈诗经〉翻译探微》,第30页。

②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3页。

③ 《养心神诗》第一首,无出版年月。

化“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翻译能让读者接受,典籍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此前对《诗经》的翻译研究多注重从诗歌的韵律及诗学、美学等角度予以分析,而《探微》则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的外传问题,且在翻译策略上作者强调要尽可能地使用归化法和诠释法,最大限度地传播原语文化的同时,又要使译文具有较好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这一点与谢天振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要考虑“时间差”和“语言差”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今后《诗经》的翻译研究中,我们是否

可以通过《探微》中提到的修辞、韵律、题旨、意象等内容的翻译问题,进一步思考典籍翻译处理策略的通用性问题?是否可以在系统梳理《诗经》翻译史的基础上探究《诗经》译作的海外传播情况?是否可以在传统文化走出去效果机制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完善“走出去”的文化策略问题,特别是典籍翻译问题?诸多问题仍待我们继续思考研究,在开展典籍翻译,推动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的道路上我们还需扎实、坚定地走下去,让世界真正地认识、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文化。

(赵洪娟: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澳大利亚殖民地与中英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

18世纪下半叶,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发现了澳大利亚,并首先在东海岸登陆。在该世纪晚期,英国在此建立了重犯流放地,这块广袤的土地随即成为那些十恶不赦的英国罪犯的永久栖息之所,同时也被视为英国在美洲所丢失殖民地的一个替代品。它同时是英国追逐财富、建构帝国以及实施社会阶层隔离制的一个缩影。在19世纪末,大英帝国面临着两大中国问题的挑战。其一是如何维持在中国口岸的英国利益及如何赋予英国的东亚政策以意义。其二,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开始在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实施殖民政策。如何处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未来关系,成为英国政策制订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的广东矿工涌入太平洋沿岸淘金。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入境澳大利亚以及当地人对此的反应,成为大英帝国殖民事务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本著通过追溯自18世纪80年代第一批英国人来到澳大利亚以来的历史,探讨其早期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追溯作为中英接触重要节点的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发展历程。

本著主体分为三大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英国、中国与澳大利亚殖民地:1788—1888”,由两章构成,分别为“作为前往中国的中转站”和“两个巨大的溢水库:金子、移民与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第二部分“1888年的阿富汗危机”,分为三章,分别为“英国的政策制订与中国的移民问题”“他助者自助:作为帝国危机的阿富汗事件”“官方思维与寻找解决方案”。第三部分“新帝国主义”,分为两章,分别为“澳大利亚与远东问题”“小王国的时代已逝:澳大利亚、中国与帝国未来”。本著首次将澳大利亚、中国与英国的互动放在19世纪全球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而又细致的探讨。

作者本杰明·芒福德(Benjamin Mountford)现任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历史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澳大利亚史、英国史、全球史及帝国史。(秋叶)

教科书研究的新动向

——《帕尔格雷夫教科书研究手册》述评

刘 靖¹ 王 琳²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 教科书在现代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教科书研究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不同角度对教科书进行研究,有助于规范、完善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使用。基于对《帕尔格雷夫教科书研究手册》一书的概述和评析,探讨对教材研发的启示,并以大学英语教科书为例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 教科书 述评 大学英语

DOI:10.16830/j.cnki.22-1387/g4.2019.02.015

1. 引言

《帕尔格雷夫教科书研究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是由 Eckhardt Fuchs 和 Annekatrin Bock 主编,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于 2018 年出版的有关教科书研究的一本手册。

该书概述了教科书的研究现状和趋势。专家学者围绕教科书的理论、方法和主题等方面的前沿问题进行探讨,为教科书的研发提供了新的视角。该书是乔治·埃克特研究所(George Eckert Institute)对国际教科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介绍了教科书研究的历史、影响教科书的生产过程的因素和背景,探讨了基于文化、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教科书研究者、学生和教育实践者提供了跨学科参考。本文对《帕尔格雷夫教科书研究手册》一书做简要评析,以期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和借鉴。

2. 内容简介

这本手册分为五个部分:教科书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第一部分),各种背景下的教科书(第二部分),教科书及

其内容(第三部分),教科书的使用、效果和实践(第四部分)以及教科书研究的新方向(第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解教科书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第二至第四部分侧重于教科书的应用。

该书从三个层面为教科书的研究提供了创新性思路和启示。第一个层面是教科书与出版商、作者和教科书评价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教科书中有关阶级、性别、国家民族、宗教、殖民、战争等内容,第三个层面是教科书的使用过程及效用。

第一部分:教科书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第二至第四章)其中,“学校教科书的历史”(第二章)追溯了近代初期至今教科书的发展史。“教科书研究史”(第三章)从国际化视角探讨了教科书研究的主要趋势,说明了关于教科书的影响和接受度以及研发情况。“教科书研究理论与方法”(第四章)中则强调了既有的和被忽视的教科书研究方法,旨在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本部分概括了教科书研究的背景以及方法论,为后续的研究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各种背景下的教科书(第五至第十二章)其中,“教育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第五章)批判性地指出当代教科书出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教

1 刘 靖(1974-),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多模态语篇分析,翻译

2 王 琳(1994-),女,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教科书作者、原创者和作者职能”(第六章)提出教科书的读者和研究者都是隐形的,对其作者有着长期的影响。“教科书和教育”(第七章)概述了教科书在教育中的角色转变,说明了教科书的属性和功能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教育媒体、复制和技术,走向教育媒体的关键政治经济”(第八章)探讨了在教材编辑出版活动的背景下当代教科书的生产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教学中使用教科书的思想和概念”(第九章)以及“特定学科教育下的科学和地理教科书”(第十章)聚焦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教科书及其与社会科学教科书的统一。“教科书质量标准 and 评价”(第十一章)概述了教材评价的一般因素、方法原则和发展方向,以及教科书评估在教育政策、文化趋势、指导教学价值和潜在应用方面的作用。“教材的物质性和中介性”(第十二章)首先概述了中介的概念,然后描述了三种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来探索教科书的中介性。本部分主要研究了生产教科书所涉及的社会条件、利益攸关方和过程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内容。

第三部分 教科书及其内容(第十三至第二十六章)其中,“1951-2017 年教科书研究中的国家、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第十三章)介绍了教科书研究领域之外的方法,这些方法已经成功地适应教科书的研究,包括历史化、比较法、结构主义、叙事文本分析等。“教科书和课程中的跨国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第十四章)认为跨国价值观是共同承担道德责任的基础,论述了当代教科书研究中对跨国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关注。“区域”(第十五章)探讨了区域对教科书研究的意义,回顾了区域对不同类型的教科书研发的影响及其所采用的方法。“教科书中关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第十六章)从不同的国家和学科出发,分析了阶级、种族和性别在教科书中的体现。“规范和缺位:LGBTI 在教科书研究中的表现”(第十七章)仔细回顾了教科书中有关 LGBTI 的研究,指出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宗教作为教科书分析的主题:一个示范性的概述”(第十八章)概述了宗教在教科书研究中的倾向和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教科书描述的分析研究”(第十九章)通过在教科书中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大屠杀的体现,提醒学生注意过去的“教训”以及让极端主义、偏见和零容忍扎根的潜在危险。“殖民主义”(第二十章)反映了在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对与殖民主义有关专题日益浓厚的兴趣,找出了变化和研究的差距,确定了今后的

研究重点,例如在研究与殖民主义有关的问题时考虑视觉因素,扩大系统比较研究的范围,或是对教科书和其他媒体进行更多的比较分析。“过去的概念:社会主义”(第二十一章)讨论了这一领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结果的异质性,指出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创新研究。“历史教科书和独裁政权建设”(第二十二章)通过对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出版的著作主要研究分析,概述了语篇分析的视角以及教育和社会的视角,探讨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教科书中的战争”(第二十三章)侧重于历史教科书及其对战争的表述,指出了教科书被普遍理解为国家叙事的容器,探讨了战争表现形式随时间而变化,以及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例如对二十世纪欧洲国家、美国、日本和以色列战争的关注。“怎样划分我们的教科书?国际视野中的研究成果”(第二十四章)研究了世界各地教科书中关于移民、宗教和文化少数群体以及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研究。多样性仍然被认为是对社会凝聚力的挑战,在遏制潜在的冲突等方面是存在问题的。“人权作为文化全球化:1890 年至 2013 年人权在教科书中的崛起”(第二十五章)研究了关于人权教育的辩论,概述了人权教育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未来的研究趋势。“环境”(第二十六章)评价了教科书分析对环境教育、灾害教育和批判的地缘政治三个与环境主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相关性。本部分对将教科书与文化 and 概念表征相结合,并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第四部分 教科书的使用、效果和实践(第二十七至第二十九章)其中,“教科书的使用”(第二十七章)论述了教科书在教室中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强度。本章集中讨论教师和学生如何与传统(印刷)教科书互动的定量研究。介绍了四种混合方法设计,以克服纯定量的研究教科书使用所带来的挑战。“教科书的效果和有效性”(第二十八章)总结了教科书和教育媒体在不同领域产生的经验证据。“教科书练习:阅读课文,触摸书籍”(第二十九章)将教科书理解为实物形式的文字制品,研究具体的主题是如何在课堂上制定、中断、争论和转化。本部分采用传统的媒体研究方法,系统地描述了当前教师和学生正式课堂教学和其他非正式环境中实际使用教科书的情况。

第五部分 新方向(第三十章)总结了教科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主题趋势,指出了研究上的空白,并批判性地反思了该书结构的局限性。从这些考虑出发,作者得出结论,

教科书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已成功地将应用、改进和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外,还提出了教科书研究中超出该书范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应由今后的研究加以解决。

3. 简评

本手册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教材研究,每一章基本都是一篇研究论文,包括引言、文献综述、研究理论与方法、结论等部分。

3.1 启示

(1)教科书的研究时需要理论支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各种不同理论观点有效融合的跨学科研究是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例如,将行为学和媒体理论研究相结合,通过研究学生阅读教材的行为以及学生对教育媒体的反馈,更好地探究教材对学生的适用性以及教育媒体对学生学习绩效的有效性。

(2)教育媒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教科书的研发提出了新的挑战。视觉教育媒体成为研究的需要。教科书能否维护其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以及是否必要仍有待观察。同时,融媒体时代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媒体如何融入课堂教学实践进行更多的研究,比如慕课、微课等不同课程载体与教科书的关系研究,不同媒介构建相同主题的比较研究,以及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在线教育视频、APP互动应用程序与教科书的融合研究等。

(3)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可以探索教科书知识的变化和延续性。系统地关注知识生产的结构,加深对教科书知识如何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的理解。目前的研究仍聚焦于特殊的地理区域,如欧美和日本,忽略了其他具有研究潜力的区域,如南欧、南美洲、中东和亚洲等。

(4)教科书出版研究在社会教育系统的研究中具有复杂性。比如以纸质印刷为导向和完全数字化,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出版方法,出版审查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等。学界难以提出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出版理论。然而,对教科书出版现状进行反思,却可以使教育出版成为一个值得开篇的学术话语。

(5)教科书编写要基于诸如产出导向、赋权增能等现代教育理念,符合多模态话语信息呈现模式的排版设计。教科

书要在融媒体时代保持竞争优势,在内容编排上要与时俱进,不仅要体现知识和能力的累积式发展,而且要向使用者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习者建立批判性辩证思维。

3.2 问题与反思

本手册收集了关于教科书各个层面的研究,虽然论据充分,但主题过泛不利于读者对教科书研究的焦点与前沿有深层次的把握。研究多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心,缺乏对亚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案例,这可能造成一些研究结果失准。

以大学英语教材为例,国外研究更多从学习者角度出发,考虑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性别、认知能力、阅读能力等。国内研究则多聚焦于教学策略、教学模式及教学改革等方面,从教材在教学实践中的适用性角度探讨大学英语教材。国外相关研究在过去十年来一直呈上升的趋势,而在国内对大学英语教材研究的关注程度在2015年后有所下降。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结合了折衷主义教学理念,配有音视频资源、“课程中心”、TOP课件、“随行课堂”APP移动应用等丰富的数字资源,并提供二维码背景知识链接。单元题材与当前国内外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联,包括“AlphaGo”人机大战、人类首架太阳能驱动飞机“Solar Impulse 2”的环球飞行、智能手机的利弊、网络英语等。课文的练习部分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精心设计,为进一步夯实学生的英语基础作了细致编排,例如词汇复现等。

《新一代大学英语》是国内第一部基于“产出导向法”理念进行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面向大学一年级英语程度较好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该教材配有数字课程、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移动学习应用等资源。取材英美原版书刊,挖掘思想深度,挑选原汁原味的视听资源,语言鲜活地道,场景生动多元,主题新颖独特,高度与深度兼备。以单元任务为引导,练习活动环环相扣,启发学生思考。中西结合,中外文化并重。

根据对以上两本典型的大学英语教材的研究,本文对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出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增强文化自信。目前大学英语教材中所用的材料大多都是对英美文化的引介,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体现明显不足,甚至有缺失现象。因此,大学英语教材的编

写要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以外语思维理解中国文化底蕴,增强中外文化异同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学习者在对外交流中的软实力,服务于国家“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2)融入思政内容。大学英语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真正地实现全过程育人。要找准政策、理论、意识形态等与大学生个人发展的结合点,将教学版块与时政类课后作业相结合,以听、说、读、写、译等不同方式将思政内容融入教材,在培养大学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提升自主学习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其对国家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3)发展智慧教材。大学英语教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历经数次迭代,目前处于第五代教材使用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实用性、主题化、任务型、立体化、内容型、多样化,除了纸质教材外,还有光盘、课件、网络课程以及教学系统上的电子资源等,是现代教学理念、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高校教学需求三者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外语教学

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智慧学习的第六代大学英语教材成为发展趋势。第六代大学英语教材将以个性化、互联网+、AI&VR技术、学习共同体支持为主要特色,大学英语的教与学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课题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模态间性理论视域下外语学习者多元能力发展研究”(编号:18CWZJ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Fuchs Eckhardt & Bock Annekatr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8.
- [2] 李荫华, 张传根.“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的编写理念与特色[J].外语界, 2018 (02): 87-92.
- [3] 杨莉芳. 产出导向法“驱动”环节的微课设计——以《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2》“艺术与自然”单元为例[J]. 中国外语教育, 2015, 8 (04): 3-9.

New Trends in Textbook Research —Review of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

Abstract: Textbook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schooling. Textbook study has been a new research area. Studying textbook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may facilitate, normalize and improve the compiling, publishing and using of textbooks. This paper, giv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 explores its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extbook. In order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in relative fields,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suggestions based on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s.

Keywords: textbooks; book review; college English

多模态英语教学研究的新动向

——《图文小说在英语课堂中的应用:多模态识读的教学可能性》述评

刘靖¹ 张鑫娜²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 新伦敦小组于 1996 年提出的“多元识读”引领了多模态外语教学的研究。图文小说是一种灵活的文学体裁,它运用视觉、空间、语言等不同的模态,使文本与图像相互耦合,协同表意,创造出复杂的文学作品。图文小说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媒介和语类,其多模态性和创新性使它非常适合大学课堂。本文基于对《图文小说在英语课堂中的应用:多模态识读的教学可能性》一书的概述和分析,探讨图文小说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 图文小说;多模态;述评

DOI:10.16830/j.cnki.22-1387/g4.2020.01.009

1. 引言

《图文小说在英语课堂中的应用:多模态识读的教学可能性》(*Teaching Graphic Novel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Pedagogical Possibilities of Multimodal Literacy Engagement*)是由 Alissa Burger 主编,由 Springer Nature 公司于 2018 年出版的关于多模态教学研究的一本论文集。这本合集通过分享具体的教学事例和教学方法,论述了图文小说在英语课和文学课中的应用模式,例如作者将传记、回忆录、哥特式文学等题材的图文小说运用到入门乃至高级写作课中,为学生提供研究基础和创造性写作的灵感。每一篇文章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理念:图文叙事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独特、动态的阅读以及学习和参与的机会,而这是仅靠文本或图像无法实现的。该书从图文小说视角,为从事英语教学及研究工作的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借鉴与参考,值得国内同行研读。

2. 内容简介

本书共十一章,第一章是引言,第二章到第十一章为该文集收录的十篇论文,分为三部分:将图文小说和修辞学融

入写作和阅读课(第一部分),图文小说在大学课堂中的运用(第二部分),图文小说能够激发社会公正、身份认同和与学生共情(第三部分)。下文对本书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图文小说和修辞、语类研究融入写作和阅读课的方法(第二至第四章)。

Andrew Bourell 在《不只是小说:图文叙事在教学中的应用的可能性》一文中介绍了教授写作课程时运用的手法及其优点。Andrew 将图文叙事描述为二十页以内的独立漫画故事,这种简短的叙事形式使学生广泛了解各种故事的创作风格,并在阅读后产生共鸣。在写作课中图文叙事或漫画应被作为学习者学习的多模态语篇类型之一。作者以 Isabella Rotman 的漫画“Sometimes I have feelings”为例进一步说明,这种多模态教学模式能够发展学习者的兴趣和多模态读写能力。Sara Austin 在《理解修辞:理解语类:写作课中的修辞语类研究》中对中级写作课程进行了探讨,该课程的主要目标是为日后从事写作相关工作的学习者提供实际的写作经验。在这篇以漫画形式呈现的研究论文中,作者主张通过研究修辞和语类,使学习者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探索,并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兴趣进行写作。Sara Austin 明确提出说明文写作是理解修辞的基础,且修辞学的学习应分阶段进行。本部分的最后一章是 Riki Thompson 的《通过漫画

1 刘靖(1974-),男,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多模态语篇分析

2 张鑫娜(1994-),女,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写作》,作者提出,对于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其课程学习的主要目标是锻炼批判性思维和写作技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提高分析解释技能和创意写作能力。据此,Riki 讨论了组织创意写作课堂的方法,通过故事创作与分享、漫画角色与故事背景的创建等步骤,最终使学习者创作发行自己的漫画。作者认为,这些分享和创作漫画的经验可以应用到学习者毕业后的工作中,如报道写作、新闻和公共关系工作等。本部分中的每个章节都详细描述了课下作业,这些作业和课堂活动能够帮助学习者熟悉文本与图像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第二部分:图文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语类在大学文学课堂上的运用(第五至第八章)。

Lauren E.Perry 在《美国漫画的历史和理论教学:作为一种复杂文学语类的 20 世纪图文小说》一文中认为漫画应该被视为文学,甚至在很多方面比传统文学更具挑战性。作者介绍了阅读各种风格的图文小说的方法,以培养学习者精读复杂图文语篇的能力。Lauren 将 Grant 的《超神》(Supergods)作为运用图文小说的案例,详述了课程目标、教学步骤及方法,同时对作业设置及作业形式提出了独特见解。Alison Halsall 在其论文《如果没有图片或对话,书有什么用:将图文小说纳入大学课程》中提倡在教学中运用图文小说,并举例说明大学各学段的教学任务。通过解读《V 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蝙蝠侠》(Batman)、《奥德赛》(Odyssey)等作品,作者多维度诠释了图文小说对学习者的阅读技能、抽象理解能力及情感的作用。通过对维多利亚文化和传统文学的接触,强调这些作品可以加深学习者对图文小说语类和传统文学的理解。图文小说具有挑战性,同时它鼓励学习者进行批判性思考。Guy Andrew Risko 通过对《守望者》(Watchman)的故事背景、体裁、人物形象的详述,发现学习者能够从政治、哲学角度思考知识的准确性,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作者从学习者精读《守望者》的过程说明其体现出的心智理论,并进一步论述了其吸引学习者的多方面原因。本部分的最后一章是关于在哥特式文学课堂中使用图文小说、漫画及视觉叙事。这是一门高级写作课程,探讨了如何利用图文叙事来帮助学习者理解和接触哥特传统文学。以 Robert 的《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案》(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为例,展示了如何将视觉叙事引入哥特文学课堂。这不仅为较低水平的学习者填补了空白,还能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更好地理解哥特主题文学。

第三部分:图文小说 移情与社会参与(第九至第十一章)。本部分中的文章强调图文小说可以激发学习者的身份认同、同理心和社会意识,能让学习者参与到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中来。

Susanna Hoeness-Krupsaw 在《在社会正义与流行文化之间讲授图文回忆录—March》中,通过描述历史上的民权运动和主人公的个人经历,说明图文叙事能够激发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和移情能力。Jennifer Phillips 在《通过对〈船〉的交互式图文改编,修改“船民”的修辞》中分析了在全球和澳大利亚背景下的难民和移民危机,同时指出“统计麻木”削弱了学生的同理心。通过对 Nam Le 的作品《船》的解读, Jennifer 强调要通过视觉和声音等协同作用,使读者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一个熟悉的故事,极大地增强移情效果。这有可能激发学习者、读者和公民的同理心,并克服他们如今面临的统计麻木。最后,William Cordeiro 和 Season Ellison 在《角色扮演在语篇教学中的运用:以艾莉森·贝克德尔的〈欢乐家庭〉作为模型》中分析了 Alison Bechdel 的漫画《欢乐家庭》。他们鼓励角色扮演法,即通过阅读一部图文小说,分析故事情节和人物特点,并在课堂上模仿、表演出来。这样可以促使学习者积极学习,并帮助其解决阅读困难的多模态语篇。作者提倡设计依靠视觉媒介的写作课程,并对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进行了说明。

3. 简评

总的来看,该书填补了多模态教学理论下图文叙事语类的运用空白,对于英语教学,尤其是阅读、写作教学等领域的发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3.1 启发

(1)本书蕴含较为前沿的教学理论与方法。例如,作者 Jennifer 强调要对图文进行移情式阅读,她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海量信息实际上减少了对学习者移情作用的影响,而文学能够增强读者的移情。通过对《船》的图文改编,证明图文小说的使用能够更有效地使学习者克服统计上的麻木感并激发其同理心。

长期以来,多数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侧重于发展学习者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忽视了其语用能力和对文化差异敏感性。因此,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外语教学的目标之一。Chen 和 Zheng(2019)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在跨文化语境下基于跨文化知识、技能和态度

进行有效和适当沟通的能力。其中,同理心(移情)、对其他文化的态度、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动机、交互参与和经验五个关键因素对跨文化交流能力有直接影响(Muhamad et al., 2020)。因此,在有关文化教学的课堂活动中加入感知移情内容,能够增强学习者对他者文化的认识,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识。例如,学习者在课堂上阅读包含文化差异内容的图文小说,教师引导他们就其中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强化学习者的文化移情意识,锻炼其文化移情能力。角色扮演是移情式教学设计的方法之一,也是交际教学法中的重要形式。这种方法不仅能加深学习者对语篇的理解,也可促进学习者对语篇的批判性分析,在写作和课堂讨论中更好地组织、表达思想。

(2)本书中提到,学习者的学习目标主要是在精读语篇的基础上,提高写作技能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能力亦称思辨能力,指依据标准对事物或看法做出一种有目的、有依据的判断的能力(文秋芳等,2018)。外语教学中“思辨缺乏”已引起学界重视,相关教学模式及配套教材不断推出。重语言、轻思辨的现象有一定改善,但真正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却乏善可陈。

写作是在语言和思维共同作用下表现出的书面语表达能力,是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和进行思维的能力(高霄、文秋芳,2017)。写作过程中,语言的准确表述、主题的提炼、题材的选择及篇章的合理布局等,均需思辨能力的参与。Alison Halsall在写作课运用图文小说,使学习者以批判的眼光来思考文本,锻炼批判性思维和写作技能。首先,在阅读图文小说的过程中,学习者要尤其注意其中的视觉元素和文字如何描述故事情节。图文小说中蕴含着复杂的视觉语法,这要求读者能够熟练地解读图片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因此学习者需要通过拓展阅读艺术和文学作品,来提高其多模态语篇的识读能力;其次,带领学习者了解漫画类型和历史,鼓励其分析并修改国外作品,这也是运用批判性思维了解外国文化、分析文化差异的过程,能够强化学习者的文化批判意识,进而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最后,进行故事背景和角色的创作,并将其以散文的形式写成剧本,经过讨论、修改后在课堂上展示小组的成果,这个过程在提高学习者兴趣的同时,也可以锻炼他们的写作技能和口语表达能力。

(3)本书选题重点突出,结合实例阐述,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具有借鉴意义。首先,第三章讨论了修辞学和语类融入教学,提出学习者首先要理解修辞学的概念及其理论,再深入探索不同的语类实现形式。语类的融入侧重帮助学习者了解学术体裁的修辞功能和篇章结构(雷军、李詠燕,

2019)。Charles (2012)认为,首次向学习者介绍语类分析法时,最好将学习者不太熟悉的任务置于相对熟悉的任务情境之中,这样不仅有利于满足非探索式学习风格学习者的需求,也有利于降低学习难度,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其次,在第六至八章中,作者提出,漫画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教学工具。随着世界日益视觉化,视觉素养也成为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教学是多数教师所关注的,却很少引导学生运用视觉感官去获取信息。因此图文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教学模式,它可以让学习者磨练他们“阅读”图像的能力,研究文本和图像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解读漫画,也能够加深学习者对各时期、各类型文学的理解。本书为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如何运用图文叙事进行写作、阅读教学提出了具体建议,如教学目标教学计划的制定、课堂活动的介绍、课后作业的要求等。

综上所述,合理利用图文小说这一特殊语类,培养学习者的移情能力和思辨能力,在发展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同时,使学习者更具同理心,在跨文化交际中突破文化障碍,达到有效沟通。该书结合学习者实际使用的范例和反馈,带领读者深入了解图文叙事在课堂中的使用效果,增强对多模态识读的再认识。

3.2 问题与反思

(1)该论文集虽涉及了各种形式的图文小说在大学课堂上的运用和效果,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学者们在论证时多采取个案法和观察法,因此缺少数据支撑。例如在第二章,作者仅仅将几个学习者的课后感悟作为案例,来说明图文叙事可以使学习者更具创造力。其他章节几乎都关注某个理论或者方法的运用,既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也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其结论。个案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其他个体的某些特征和规律,但研究结果通常受观察者的主观印象影响,被试的报告一般经过研究者的筛选,结果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由此可见,该论文集无论是从实验方法还是从受试对象的选择及人数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2)该书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有关图文小说的运用理论框架,在揭示图文小说背后隐藏的语言认知因素方面稍显不足。论文中虽涉及到隐喻及其在图文小说作品中的运用,但没有从认知的角度揭示隐喻如何作用于学习者的思维和认知机制。当代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已经表明,隐喻是语言和认知共有的根本属性,那么隐喻能力的培养必然是外语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母语负迁移的制约作用是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学习者输出错误隐喻的主要原因,教学

过程中应该多培养学生的隐喻意识,不仅仅从语言层面理解词汇的字面义,更重要的是从目的语角度在思维层面帮助学生理解概念(王小璐、王艺臻 2019)。

(3)心理学研究表明,越是直观、形象的内容越能引起学习者的注意,使学习者的注意力更加持久,学习效果更好。文中虽运用了多本漫画、文学作品阐述图文叙事对学习者的英语写作阅读的若干优点,但仅举几例进行分析解释,没有给出相关作品的插图,因此对于读者而言,缺少直观的可视化处理。

(4)第十一章中涉及的角色扮演法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使用也值得思考。首先,教师和学习者的关注点往往都在表演者的表演效果上,其发音、语法是否正确容易被忽视。其次,角色扮演法要求教师将课堂还给学生,而受传统“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影响,往往造成看似是学生为主体,实则是教师“操控”课堂的情况,使课堂中的角色混乱。同时,该论文集的研究对象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生,其中涉及的教学方法、利用的教学工具等是否适用于中国大学生,仍需我国教师与相关行业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

基金信息: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二语句法操作的界面变异研究”(编号:19YJA74007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模态间性理论视域下外语学习者多元能力发展研究”(编号:18CWZJ2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Alissa Burger. Teaching Graphic Novel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Pedagogical Possibilities of Multimodal Literacy Engagement[C].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8.
- [2] Charles M. ‘Proper vocabulary and juicy collocations’: EAP students evaluate do-it-yourself corpus-building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12,31(2):93-102.
- [3] Muhamad Umar Nadeem, Rosli Mohammed, Syarizan Dalib. Retesting integrated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MICC)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Asian context of Malays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20(74): 17-29.
- [4] Yanqing Chen, Xuan Zhe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s self and others in reflective journals of intercultural encounter[J]. *System*, 2019(84): 64-75.
- [5] 高霄, 文秋芳. 思辨能力及语言因素对二语写作影响的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7(04):44-50.
- [6] 雷军, 李咏燕. 面向科研发表的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回顾与启示[J]. *外语界*, 2019(5):48-56.
- [7] 文秋芳, 孙旻, 张伶俐. 外语专业大学生思辨技能发展趋势跟踪研究[J]. *外语界*, 2018(6):12-19.
- [8] 王小璐, 王艺臻. 母语迁移对 EFL 学习者隐喻输出的制约——以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习作为例[J]. *外语教学*, 2019,40(3):56-63.

New Trends in Multimodal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

—Review of *Teaching Graphic Novel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Pedagogical Possibilities of Multimodal Literacy Engagement*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ultiliteracies” proposed by the New London Group in 1996 has pioneered the study of multimod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Graphic novels is a flexible literary genre, which uses different modes such as vision, space, language, etc. to make meaning by interactively coupling texts and images and create complex literary works. Graphic novels are an ever-evolving medium and genre, the multimodal characteristic and creativity of which make it ideal for college classroom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book *Teaching Graphic Novel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 Pedagogical Possibilities of Multimodal Literacy Engagemen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graphic novels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 graphic novels; multimodality; book review

二语学习动机研究的新进展

——《语言学习中的动机变化》述介

尹洪山¹ 张帘秀²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动机的类型及其与语言习得的相关程度,而是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动机强度的变化趋势极其复杂的认知和社会影响因素,《语言学习中的动机变化》一书集中体现了二语动机研究的这一发展前沿。该书首先介绍了动态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在动机研究中的应用,并结合二语动机的发展变化探究了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另外,该书报告了二语动机实证研究的最新成果及研究方法的嬗变,对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前景进行了探讨。该书将动态系统理论确立为动机概念形成的认识论基础,在动机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突破和方法创新意义。本文分章节介绍了该书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并对其特色和不足进行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动机变化;非线性;语言学习;个体差异

DOI:10.16830/j.cnki.22-1387/g4.2020.05.007

1. 引言

动机是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动机的强度和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习者维持语言学习行为的目标取向。传统的动机理论侧重研究动机类型与二语学习成就的关系,近年来动机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动机强度的变化趋势,并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反向”探究影响语言学习动机衰退的复杂因素。由 Multilingual Matters 出版社 2015 年推出的论文集《语言学习中的动机变化》全面反映了二语动机研究的这一最新发展前沿,全书由 23 章组成,分为引论、上编、下编、结论四个部分,其中上编为概念综述,下编为实证研究。下面简要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并作简要评价。

2. 内容简介

第 1 章为引论,主要阐述了将动态系统理论应用于二语动机实证研究的必要性。文中指出,虽然动态系统理论

近年来受到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较多关注,但真正的实证研究却比较鲜见,大多数的二语动机研究所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的、非动态化的研究方法。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以 Dörnyei 为代表的学者积极推动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动机实证研究,2013 年在美国达拉斯召开的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年会为此设立了主题研讨,本书的出版反映了这次年会的标志性成果。

第 2 章至第 9 章为上编,主要介绍动态系统理论涉及的各种概念,并结合动机的变化阐述复杂系统的非线性发展特征。其中,第 2 章重点阐述了复杂动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动态性、空间、复杂性、关系、非线性、初始状态的敏感依赖性、开放性与非终结性等。文章认为,动机的变化恰恰体现了复杂动态系统的这些基本特征,动态系统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动机研究的目标和方法;第 3 章讨论的主题为吸态(attractor states)及其在动机研究中的应用。吸态指的是动态系统中相对稳定的趋势、状况或结果,动机的变化遵循了从一个吸态到另一个吸态的运动路径,影响吸态变化过程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组织和状态空间;第 4 章讨论了第二

1 尹洪山(1967-),男,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2 张帘秀(1973-),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语言发展的时间量程(timescale)问题,文章以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过程为例,对时间量程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语言的发展总是处于不同的时间量程,动机的发展亦不例外;第5章讨论了初始状态(initial conditions)的特点,并以“蝴蝶效应”为例阐述了不确定因素对二语学习动机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对于一个处于初始阶段的学习者来说,即使他有着较强的学习动机,在经历一次意外的负面打击之后,可能会完全失去二语学习的愿望和动力,继而进入一种消极的态度吸态。

第6章讨论了语境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关系。文章把学习者与语境的关系看作一种生态系统,而语境作为一种独立的外部因素会对学习者的一些内部变量(如动机等)产生影响。第7章的主题为人类能动性概念(human agency);及其在动机变化中的作用。根据这一概念,人在受到吸态的引力时,会能动性地做出一些驱避行为,而不会被动地接受吸附。因此,仅仅关注吸态对学习者的引力作用是不够的,也要重视研究动机发展过程中学习者的能动性驱避过程;第8章讨论了社会网络分析与复杂动态系统的关系。文章首先介绍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及其特点,认为社会网络理论有助于了解个人及群体的社会交互过程,对教师和学生动机本质的认识会更加深刻,进而从社会动机的角度观察个人动机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9章从心理学视角讨论了动机系统中“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的动态变化,揭示了“现实自我”向“理想自我”转化过程中的三种影响因素:对理想自我的不断修正;与其他自我概念的交互作用;二语自我形象的细微变化与理想二语自我的可及性变化;第10章阐述了定向动机流(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与复杂动态系统的关系。定向动机流指的是学习者在某个阶段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表现出的稳定的高强度动机状态,具有参数生成性、愿景导向性、显性促进结构和积极情感状态等基本特征(Dörnyei, 2014; 喻荣, 2015; 常海潮, 2016)。

第11至第22章为下编,集中报告了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二语动机研究的最新成果。第11章从时间量程的角度研究了二语学习活动中的驱避动机。研究采用了个体动态法(idiodynamic method),结果发现,较高的驱避动机和焦虑水平与较低自我能力感知和交际意愿是造成交际困难的主要原因;第12章研究的主题为自我(the Self)的动态性。

文章以多层巢室系统(Multilevel Nested Systems)为基础建构了自我的结构模型,语料收集方法包括访谈、多模态叙述、日志、问卷、个体动态法等,结果发现,受试者的自我系统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既体现在自我系统的结构方面,也表现在自我系统变化的驱动力及其动态模式上;第13章报告了学术写作中动机、焦虑和自我效能感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这三项变量在受试者学术写作课的过程中并没有较大波动,但某些相关要素在变化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第14章从动机、情感、认知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二语课堂中的吸态问题。结果显示,受试者的二语学习经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吸态:兴趣、倦怠、中性注意和焦虑,这些吸态的形成与学习者的动机、情感、认知和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第15章研究二语教师面临的职业压力对其教学动机的影响。教师为了应对越来越高的职业压力,会在其心理机制上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系统,即所谓的教师免疫(teacher immunity)。本文研究发现,教师免疫最主要的功能是有助于教师的职业生存,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教学思想的僵化、对教学改革缺乏热情等;第16章报告的是内省式质化建模(Retrodictive Qualitative Modelling)在二语动机研究中的应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介绍了如何在复杂动态系统的研究中应用内省式质化建模的方法,然后以本研究为实例,通过分析教师对学习原型评估,以揭示动机系统的内在变化规律。

第17章从教师作为学习者的视角出发研究动机的发展变化。文章认为,学习者动机与教师动机之间的关系具有交互性和协同性,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本研究带来的启示是,要维持学习者的动机发展需要教师和学生付出共同努力;第18章基于动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的三元模型探究外语学习者的动机变化。根据Valsiner (2007)的三元模型,人类经验的发展由微发生过程、中期形成过程和个体发生过程组成。本文的研究发现,三元分析法有助于探究二语学习动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能够揭示动机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变化规律;第19章研究了第三语言学习中的动机变化。在世界许多地区,第三语言学习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从文献上来看,针对第三语言学习动机开展的研究还不多见。本章的研究发现,有多种不同的因素会影响第三语言学习的动机变化,如学习者对教学活动的喜爱程度、教学活动本身的意义、学习者的考试成绩以及与第二语言

所做的比较等;第20章研究海外留学经历对学习者二语自我概念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留学生在出国前对在国外学习英语普遍存有一种较为理想的观念,确信自己能够学好英语。而在经过了接近半年的留学生活后,受试者的二语自我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失望、满意和茫然三种不同的观念;第21章研究自我调节在理想二语自我演化中的作用。研究显示,自我调节在促进理想二语自我和二语写作能力的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文章认为,自我调节能力属于学习者的一种个性差异,理想二语自我、任务实施和自我调节之间具有相互适应性;第22章研究了未来动机自我导向中的二语意象变化。结果表明,二语自我导向中的心理意象具有不稳定性,在二语学习中会不断发生变化,受试者自我二语意象的变化与产生这些意象的一些认知因素有关。

第23章为本书的结论,本章在总结全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前景进行了探讨,并阐述了动态系统理论“热”与“冷”的辩证关系,对如何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开展相关的动机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3. 简评

3.1 理论突破

本书在二语学习动机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突破。本书将动态系统理论确立为动机概念形成的认识论基础,为二语学习动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动机这个“旧”话题焕发了新的生机,重新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例如,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动机作为一种心理倾向能够激发、维持并使行为指向特定的目标,本书所提出的定向动机流概念恰恰反映了这种愿景驱动的高强度动机状态。其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者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探究动机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了语言学习过程中动机状态的变化趋势,有助于全面和深入了解人类行为动机和成就的关系。此外,本书提出的时间量程、人类能动性概念对二语动机研究也颇有新意。相对而言,传统的研究所揭示的只是动机的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而动机的变化远非这么简单。将动态系统理论纳入动机研究的范围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本书在这一领域所做的研究具有突破性进展。

3.2 方法创新

本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体现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

展。动态系统理论主张动机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变异性等特点,更加重视对学习个体动机的变化进行微观的描述。以往的研究则侧重考察学习者的群体趋势,如果出现与整体趋势不同的变化或不和谐的“噪音”,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所谓的“噪音”恰恰反映了学习者动机变化的非线性特征(周丹丹,2012)。本书的贡献在于,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向读者呈现了多样化、可操作的研究方法,如微变化法、个体动态法、内省式质化建模等。这些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弥补横断式量化研究的不足,并通过高频率的数据采集和密集的观察频率,对二语学习动机的动态发展进行跟踪测量,以便更加全面地捕捉和了解动机的变化情况,有助于揭示这种变化趋势背后的深层次影响因素。

3.3 内容丰富

本书的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动机变化研究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论方面的综述,也有丰富多样的实证研究。本书对动态系统理论的介绍非常详尽,为读者加深对动机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许多二语习得领域的读者来说,如何在动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开展动机研究首先需要突破原有的认识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态系统理论在动机研究领域的应用体现了新兴理论所特有的方法论模型,因此,无论是本书上编各章围绕动机这个主题所进行的深度理论分析,还是下编各章所开展的多角度实证研究,都有助于读者在开拓视野的同时获得研究的启发和灵感。本书这种内容翔实、递进有序的编排方式充分展示了动态系统理论自身的精髓,为读者深刻领会二语动机研究的理论走向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思考框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本书在动机研究方面所呈现的丰富成果体现了动态系统理论的应用前景和价值,为该理论在应用语言学更广阔的研究土壤生根发芽提供了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部会议论文集,本书在某些方面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书所反映的学术成果虽然主题比较明确,但由于收录的文章数量偏多,结构略显松散。另外,本书在上编对动态系统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集中阐述,但由于行文风格的差异,不同的文章梳理概念的脉络并不完全一致,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亦不够紧密。总体看来,瑕不掩瑜,本书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开启了二语动机研究的动态模式,反映了当下动机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

发展趋势,加深了人们对二语学习过程中动机变化规律的认识。本书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二语句法操作的界面研究”(项目编号:19YJA740074)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能力发展的界面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CWZJ1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Dörnyei, Z., Muir, C. & Ibrahim, Z.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Energising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creating intense motivational pathways [A]. In D. Lasagabaster, A. Doiz, & J. M. Sierra. (eds). *Motiv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4:10–42.
- [2] Markus, H.R. and Nurius, P. Possible selve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6, 41: 954–969.
- [3] Valsiner, J. *Culture in Minds and Societies*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 [4] 常海潮. 定向动机流——二语动机理论研究新进展 [J]. *现代外语*, 2016(5):704–713.
- [5] 喻荣. 第二语言学习动机研究:理论变迁与发展 [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5(8):154–157.
- [6] 周丹丹. 应用语言学中的微变化研究方法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Advances in L2 Motivation Research

—A Review of *Motivational Dynamics in Language Learning*

Abstract: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shifted its focus from motivation typ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language achievement to the dynamics of motivation strength as well as the complex cognitive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may play a role in this process. The book *Motivational Dynamics in Language Learning* published by Multilingual Matter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L2 motivation research. This book starts from introducing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Dynamic Systems Theory (DST)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motivation research, probing into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systems in terms of L2 motivational changes. Then it reports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L2 motivation research from the DST perspective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prospects of DST. Th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is book is embodi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DST as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L2 motivation studies, characterized by it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contents of individual chapters of the book with a brief evaluation of its major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Keywords: motivational dynamics; non-linearity; language learn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跨语际身份认同的学习者叙事： 运用多模态方法探索语言学习经历》述评

刘 靖¹ 张鑫娜²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跨语际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工具或视角,目前学界对跨语际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多见。跨语际与双语的含义密切相关,其特点是说话者或者写作者能够在两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中自由转换。其中,跨语际对学习者的身份认同的影响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议题。本文基于对《跨语际身份认同的学习者叙事:运用多模态方法探索语言学习经历》一书的概述和分析,探讨学习者跨语际身份认同的研究方法,并以中国的外语教学为例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跨语际;述评;多模态;手势

DOI:10.16830/j.cnki.22-1387/g4.2021.02.007

1. 引言

跨语际身份认同对外语学习者的影响是学界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呼吁写作教学要从单语言向跨语际范式转换(Zheng, 2017),因为跨语际强调将语言之间的差异视为意义构建的一种资源。Suresh(2015)发现,跨语际学习者能够流利自然地组织文章,实现上下文的过渡,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多种语言。同时,研究者针对跨语际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形成也开展过大量研究(Ishihara et al., 2018; Masters K, Menard-Warwick J, Orque R, 2019),但是以上研究大都局限于在理论上为外语教学提供建议,缺乏相关实证研究。

《跨语际身份认同的学习者叙事:运用多模态方法探索语言学习经历》(*Learner Narratives of Translingual Identities: A Multimodal Approach to Exploring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es*)是由日本明治大学 Patrick Kiernan 撰写,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有关学习者跨语际身份认同研究的专著。该书共12章,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学习者自身与在班级共同体内的身份认同感,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的研究方法,为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和语言教育者提供了参考。

2. 内容简介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思考(第一部分),跨语际身份认同的学习者叙事(第二部分),跨语际共同体(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解研究跨语际身份认同提供了理论基础,概述了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多模态分析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侧重于讨论三种类型的跨语际学习者的学习经历;第三部分讨论了在跨语际共同体内进行的英语教学实践。

在引言中,作者阐述了本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作者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出发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该书的研究对象为一个班级内的21个学习者,作者利用 Nvivo 软件对访谈视频进行标注。

第一部分:理论思考(第二至第六章)。其中,“面对面的多模态资源”(第二章)介绍了多模态和非语言符号的概念,并将手势语视为本书中意义构建的主要模态。“关于手势语及其意义的三种观点”(第三章)通过对一个多模态叙事的分析,阐述了如何通过概念、人际和语篇这三种互补的元功能来探索多模态。“概念功能与跨语际身份认同经历”(第四章)从探索概念功能深入到跨文化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探讨了讲述者自身与身份认同相关的经历。在“学习共同体、身份认同和人际功能”(第五章)中,作者使用三个

1 刘 靖(1974-),男,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多模态语篇分析

2 张鑫娜(1994-),女,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例子阐述了受访者如何使用语言和手势、表情等非语言资源实现人际功能。“框架、叙事和语篇功能”(第六章)中将话轮视为话语的基本单位,通过叙事形成新的框架,由此探讨语篇功能如何唤起身份认同感。本部分概括了在访谈中对跨语际身份认同的探索,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种元功能为后续的研究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跨语际身份认同的学习者叙事(第七至第九章)。其中,“有抱负的跨语际学习者”(第七章)通过展示四名留学归来的学习者的学习经历,介绍了关于跨语际身份认同发展的四个近端区(proximal zone)。“自信的跨语际学习者”(第八章)以班级中最优秀的三名跨语际学习者为例,说明了学习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构建自信,介绍了影响跨语际交流能力发展的三种因素分别为学能、成就和自主性。“混血儿的跨语际身份认同”(第九章)讲述了三个来自混血家庭的学习者的跨语际交流经历,阐述了跨语际学习者童年时期的经历对其身份认同感产生的影响。

第三部分:跨语际共同体(第十至第十一章)对我国交际式教学法的发展有着借鉴意义。其中,“一个跨语际实践共同体”(第十章)提出了将班级视为一个跨语际交流共同体的理念。作者提出,跨语际能力包括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控制语言的混合或适应文化语境的能力。同时,与阅读和写作相比,交谈是一种更亲密的技能,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一个成功的跨语际共同体的课程”(第十一章)描述了受访者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和消极的情感体验,这与外语口语学习密切相关。同时,作者探讨了语法翻译法的应用对日本的英语学习者的交流造成的困难,并强调交际教学法的重要性。作者发现,那些用词更复杂、语言更流畅的学习者更善于运用手势,因此手势的合理运用是提高口语技能的重要途径。

3. 简评

本书以东京某大学的大一商务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为语言学学者和教育学研究者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方法。首先,在方法论方面,利用访谈法对一个班级进行研究,而不是这一领域通常使用的个案研究法;其次,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视阈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全面准确;最后,受访者在访谈中的反思为语言教学提供了批判性见解。

3.1 启示

(1)从事跨语际身份认同的研究,需要理论支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各种不同理论观点有效融合是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自我民族志指作者从“主体自我”和“自我反省”角度,

通过研究自身生活经历与其所在群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之间关系而生成的一种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陈纪、南日,2018)。作为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强调研究者从局内人的视角进行反思和叙事(杭亚静、赵蓉晖,2019),通过描写、分析自身经历,以此达成对他人的理解。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我国大学外语教师和语言学学者可以根据自我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分析自身在跨语际实践中如何获得身份认同感,由此反观在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为跨语际身份认同相关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本书基于访谈,对受访者的手势进行转录与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作为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研究流派,其理论基础是韩礼德提出的语言三大元功能,它同样适用于对包括图像、声音、颜色、版式等社会符号的分析(田海龙、潘艳艳,2018),其中,言语、手势语、视觉三种模态是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重点,手势是激发概念意义的重要资源。学习者语言水平越高,手势使用频率越高。手势不仅有助于语义表达,提高交际效率,还可以反映说话者的思维过程(孙鑫、张丹,2018)。因此,教师可以鼓励外语学习者观察高水平的外语学习者如何在谈话中使用手势,并引导学习者形成自己的技巧。

(3)Kress等研究者发现口头语言只传达给学习者一部分意思(Kress et al., 2001),因此进行多模态分析也需包含对手势资源的解释。手势研究领域不仅对符号学提供了有用的解释,在人类交际手段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对手势的本质也有了深入的理解。McNeill(2012)用“米兹回路”(Meads Loop)这一心理学现象对手势的本质进行阐释,这种现象假设在人的适应性进化过程中,人类大脑中所具有的镜像神经元有一部分存在于大脑皮层的Broca区(主要负责语言的产生和语言加工的区域)。镜像神经元被“扭曲”对手势做出反应,新的被“扭曲”的神经元能够使手势及它的意象产生于Broca区。因此,镜像神经元的活动让观看者在脑中直接反映出他人的行为,有助于理解对方的体态所表达的含义。通过神经影像技术,可以发现人类的手势语与有声语言有着共同的神经基础,并且这一神经基础与镜像系统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人类的有声语言来自于通过镜像系统触发的手势语(耿立波等,2015)。对于语言的起源,“手势说”认为语言起源于手势、手形等体态语言,但研究语言进化,仅靠单一的推测性证据尚不能证明手势理论的正确性,手势理论只能被作为一个研究假设,指导研究者对语言的本质、人类基因与进化本质有进一步了解。

(4) 对跨语际身份认同的研究最终要落实到教学实践上。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身份和目的语文化身份之间具有差异,呈现既分裂又统一的特点。在学习外语、接触异域文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和地域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冲突。外语教学过程中,语言学习者身份认同对语言能力提升所发挥的作用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二语学习者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发展过程就是其语言能力发展提高的过程(王秋菊,2019)。英语教学亟需保证足量中西文化的有效输入,促进语言学习者构建理想的身份认同,以利于英语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潘文国(2013)认为,母语水平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外语的真正水平以母语能力为前提。以中国的外语教学为例,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比例,丰富中西方文化对比内容的学习。同时引导外语学习者主动地发现中外文化之间交融相通之处,这种共性即二语习得中的“共有知识”,正是这些共性使跨语际交流成为可能。

(5) 学习者身份认同对教育的积极作用已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肯定(Gee, 2000; Hyland, 2002; Salvador Falsafi, 2010)。该书中的研究对象多为曾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曾面临不同文化间的对立、对本国文化的迷失等问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学习者对西方文化的过渡追捧,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因此,增强身份认同感是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面临的一大挑战。学习者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在个人因素中,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感往往受自身的英语语言水平、个人经历和价值观的影响;在社会因素中,语言学习者的身份认同感还会受传统文化、课堂教学和学校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从两方面提高学习者的身份认同感。首先,在教学设计中加入中西文化对比的内容,同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学习者树立文化自信;其次,推进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改变目前课堂内母语文化淡漠的现象,引导学习者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

3.2 问题与反思

本书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对访谈中的语言和手势等进行解释,但是对概念的阐释不够清晰,研究方法仍有需要改进之处。

首先,跨语际的内涵还需进一步澄清。明确跨语际的定义,能够推动国际和国内学者发展跨语际教学方法,引导学习者准确地把握词语使用的语义语用环境。本书虽然对双语和跨语际进行了区分,但是对跨语际的定义仍不够明确。布龙菲尔德(1933)对双语的定义是:双语现象即同时掌握两门语言,熟练程度和本地人一样。本书作者认为,跨语际

强调的是一种在语言和文化之间移动的体验,由此与双语的定义区分开。为了帮助语言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完善流动和非流动符号资源的概念,Canagarajah(2013)提出了跨语际这一术语,他将跨语际定义为动态的、进行异质性交流的语码啮合行为,能起到表达权利、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的功能。为了澄清跨语际交流的内涵,可以通过跨学科研究来推动对跨语际交流的系统性研究,如社会语言学、文学批评和身份认同领域等。

其次,从方法论上来看,本书采取以质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Nvivo 作为一款支持质化研究和混合研究方法的软件,可以辅助研究者对访谈和问卷调查等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者虽收集了多个访谈视频资料,利用 Nvivo 对受访者的手势进行编码和分析,但没有利用该软件进行量化分析,因此缺少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其结论。同时,为确保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宜采用三角互证法,通过运用多种资料来源或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资料进行交互证实,例如对学习者的父母和外语教师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而不仅仅关注学习者自身的叙述,如此可以增加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4. 结语

我国目前在跨语际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 CNKI 以“跨语际”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共得到 124 条结果,其中硕士论文 14 篇,博士论文 5 篇,研究主题大多与文学和翻译相联系,缺乏关于跨语际身份认同的研究。该书结合 21 位学习者的具体案例,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进行解读,提出了提高学习者语言学习水平的可行性方案,对于外语教学者和语言学研究来说,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对跨语际学习者的需求不断增长,该书的应用价值将日益凸显。同时,本书也为中国相关行业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例如,跨语际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阐释,教师如何运用跨语际教学方法引导学习者准确地把握词语的语用环境,以及在神经心理学视角下对语言进化理论进行验证等。

基金信息: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二语句法操作的界面研究”(项目编号:19YJA740074)以及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模态间性理论视域下外语学习者多元能力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CWZJ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Canagarajah S. *Translingual Practice: Global Englishes and Cosmopolitan Relations* [M]. 2013:7-9.
- [2] Gee, J.P. Identity as an analytical len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00 (1): 99-125.
- [3] Hyland, K. Authority and invisibility: authorial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 34(8): 1091-1112.
- [4] Ishihara, Noriko, Menard-Warwick, Julia. In “sociocultural in-betweenness”: Exploring teachers’ translingual identity development through narratives [J]. *Multilingua*, 2018, 17: 29-44.
- [5] Kress Gunther, Carey Jewitt, Jon Ogborn and Tsatsarelis Charalampos. *Multimod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hetorics of the Science Classroom* [M]. London: Bloomsbury, 2001:51-52.
- [6] Masters K, Menard-Warwick J, Orque R. The translingual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two California teachers: Case studies of self-authoring [J].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2019, 18(2):110-125.
- [7] McNeill, David. *How Language Began: Gesture and Speech in Human Evolu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58-59.
- [8] Patrick, Kiernan. *Learner Narratives of Translingual Identities (A Multimodal Approach to Exploring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es)* [M].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9.
- [9] Salvador, C.C. & L.Falsafi. Learner identity: An educational and analytical tool [J]. *Revista de Education*, 2010 (1):211-233.
- [10] Suresh, Canagarajah.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ingual practice and L2 writing: addressing learner identities [J]. *Applied Lingus Review*, 2015, 6 (4):415-440.
- [11] Zheng, Xuan. Translingual Identity as Pedagogy: International Teaching Assistants of English in College Composition Classroom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7, 101(S1):29-44.
- [12] 陈纪,南日. 自传式民族志的发展概况及其社会效用论析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 37-42.
- [13] 耿立波,邵可青,杨亦鸣. 语言的手势起源:基于镜像系统的证据 [J]. 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 2015 (6):661-664.
- [14] 杭亚静,赵蓉晖. “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新视角——《语言与全球化:自我民族志方法》述评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9(5):92-96.
- [15] 孙鑫,张丹. 不同英语水平的中国学习者手势使用实证研究 [J]. 现代外语, 2018(6):829-839.
- [16] 田海龙,潘艳艳. 从意义到意图——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发展 [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1):23-33.
- [17] 王秋菊. 二语习得者的文化身份特点对英语教学改革 的启示 [J]. 英语教师, 2019(15):9-13.

Review of Learner Narratives of Translingual Identities : A Multimodal Approach to Exploring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es

Abstract: Translingualism has been regarded as a tool or a perspective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few systematic studies on it. Translingual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bilingualis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bility of speakers or writers to switch freely between two languages or language varieties. The influence of translingualism on learners’ identity is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giving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Learner Narratives of Translingual Identities: A Multimodal Approach to Exploring Language Learning Histories*, explor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earners’ translingual identity. In order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udy in relative fields,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LT in China.

Keywords: transgualism; book review; multimodality; gestures

Multiliteracies in College English Pedagogy*

LIU J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Due to the expanding variety of mod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ools for meaning-making,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 and multiple forms of text have been a common occurrence. It is essential for today's reader/viewer to foster the capacity to critically de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multimodal texts. And it is a must to expand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of literacy to multiliteracie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theories and practices, explores and analyzes visual literacy, media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critical literacy, and postmodern literacy in college English pedagogy, so as to fully develop the learners' multiliteracies.

Keywords: multiliteracies, multimodal texts, college English pedagogy

Introduction

Nowadays, due to the multiplicity of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and the expansion of mass media, multimedia, and the Internet, dramat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ays how young people read and write with words and images. There seem to be few ways of escaping the fact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a moment in which literacy practices are being fundamentally altered...these changes, rapid, and unpredictable as they can be, offer all of us exciting opportunities to rethink how we communicate in words, images, and sound (Williams, 2008). Rather than an encompassing single literacy, English teachers of the 21st century must accept the changing and flexible nature of literacies that address areas as diverse as technology, multimedia,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08).

Multiliteracies

Since human beings make meaning in a variety of ways, and language learners today need to be able to cope with different kind of texts, monomodal or multimodal, linear or nonlinear, on paper or on scree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s of literacy continue to expand in multiple directions, moving far beyond former emphasi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writing ability. 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 of "literacy" is "the ability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and communicate messages in a variety of forms" (Hobbs, 1997, p. 7).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literacy as one of multiliteracies focuses teaching on the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are much broader than language alone. "Multiliteracy implies th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visual, and multimodal literacy, plurilingual awareness,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gital competencies" (Elsner, Armbrust, & Lohe, 2011, p. 34). The

* **Acknowledgements:**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 by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Proje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2015M084),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11XB14), and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oject (2014).

LIU Jing, associate professor, M.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cept of multiliteracies is based on two key premises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glob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context: (1) the expanding variety of mod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ools for meaning-making, including the mass media, multimedia, and electronic hypermedia and (2)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as our communities become more globally connected (New London Group, 1996). Their research on multiliteracies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to engage students in a wide range of literacy practices that are creative and cognitively challenging and that bring together text-based and multimedia forms of meaning making. Digital-age literacy requires students to make meaning in multimodal ways, using bas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cies; visual, gestural, and spatial literacies; information and multicultural literacies and global awareness (Beers, Probst, & Rief, 2007; Cope & Kalantzis, 2000). Multiliteracies focus on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 and multiple forms of text. Therefore, being multiliterate requires not only the mastery of communication, but an ability to critically de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a range of texts and other representational forms which often involve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actions .

This calls for the creation of a multimodal classroom that draws on linguistic, visual, spatial, and digital texts to support the multiliteracies, such as visual literacy, media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critical literacy, and postmodern literacy. For examp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ffer numerous digital texts for the English classroom, including online newspapers, magazine articles, audio programs, narrative films, television documentaries, blogs, and other visual, electronic, and digital media (Hobbs, 2006). Multiliteracies for the students involve not only making sense of these multimodal texts but also try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by composing their own digital text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y should be told that composi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always mean writing, and they may form their own ideas, make full use of what they have known about multimodal texts, and then “think about which media and modality best represent their ideas and how to format their pages in ways that invite their readers to select those links leading readers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Doering, Beach, & O’Brien, 2007, p. 43).

Visual Literacy

Anthony Pennings (2002) argues that “visual literacy is an emerging area of study which deals with what can be seen and how we interpret what is seen. It is approached from a range of disciplines that: (1) study the phys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visual perception; (2) use technology to represent visual imagery; and (3) develop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used to interpret and understand what is seen”¹ while Chauvin (2003) states that “visual literacy is the ability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in any variety of form that engages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a visual image” (p. 119). Here visual images may involve body language, motion, dance, two and three dimensional works of art, photographs and clipart, films and video, museum exhibits and dioramas, advertisements, illustrated written or verbal discourse, architecture, hypermedia and visual reality experiences, and so on. Based on the above two definitions, we can see what visual literacy is:

Visual Perception → Visual Interpretation → Visual Representation

That is, the students should be guided to notice what are there in the visual images: the visual and design elements (e.g., pattern, line, shape, color, typography, and texture) presented in the multimodal texts. And then

¹ See <http://www.marist.edu/pennings/viswhatism.htm>.

lead them discuss what these objects and elements mean. The visual grammar of 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 provides the teachers with various perspectives for attending to and interpreting visual images. For example, how various objects are organized and located in the visual image and how they interact and coordinate with other elements to make meaning, and so on. The purpose of visual literacy is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the students are also supposed to be encouraged to compose their own multimodal texts, to “write” or represent their ideas in multimodal ways.

Some activities and assignments designed in English class may well enhance the students’ visual literary skill. For instance, a digital image may be chosen, and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engage their visual literacy to read the image as a text and extract meaning, that is, to interpret (in written form) the image denotatively and connotatively, especially its ideological meanings constructed in particular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they are then required to revise the image in Photoshop at their will and write a reflective paper about what they change and how it changes the message of the image. During this writing assignment, students are engaged to creating their own abstract art pieces. Students’ work with an image, no matter the interpretation, the revision, or the reflection, provided them with “a different experience of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for young people are usually excited to work with technology when the opportunities arise. Other activities and strategies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having students create titles which can only be a word or phrase for untitled pictures; (2) asking students to fill in written dialogue or speech bubbles for the characters in pictures; and (3) inviting students to use technology rather than drawing pictures by hand to illustrate a written dialogue. These activities will not only promote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but also offer students the practice in integration of written text and pictures to develop multimodal meanings.

Media Literacy

The aim of media literacy is to facilitate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enjoy how the media (television, radio, newspaper, magazine, movie, etc.) work, how they produce meaning, how they are organized, and how they reflect social reality and promote the students’ active, critical engagement of media messages and media culture. It is a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with an interaction between audiences/consumers. Shepherd holds that,

Media Literacy is an informed,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s media. It involv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techniques, techn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are involved in media production, the ability to critically analyze media messages and a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that audiences play in making meaning from those messages.²

Here we can see that media literacy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major aspects: mass media, how and for what purpose messages are constructed and consumed by the masses.

Mass Media → Media Messages → Audiences

Media literacy is the application of literary skills to mass media. It concerns with the mass media which may be visual in nature such as television, magazines, and may be outside the scope of visual experience such as radio and recordings. While it puts emphasis on meaning making and information/message communication, that is, how to construct messages through various media, whom these messages target at, etc., what we read on the page

² See www.media-awareness.ca.

is not inherentl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paint in the picture or what we make in the movie; it is always the matter of message transmission. 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i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mass media serves as a media for the masses to critically gain information they need.

As for English class, the teacher may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ents to get to know the mass media production in their life, and purposefully choose som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se media, and guide them how to address the messages the media contains. For example, the class may be started by watching a video clip or looking at an image, the students visibly enjoy the clip or the image before moving on to a discussion of the creator, audience, and message as related to the topic to be talked about. Suppose the intensive reading task is about the life of trashman, the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conduct an interview of the trashmen on university campus: The whole class are divided into several groups; the interview task is supposed to be completed collaboratively (interviewing, camera shooting, post production, etc.); the interview video should be presented in clas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given by the whole class. The interviews not only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incorporate varied linguistic modalities and languages (i.e., they used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in class to present the interview, but spoke Chinese to ask interviewing questions to the interviewee), but also enrich their experiences of making multimodal texts cooperatively.

Newspaper and online news are very good materials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idiomatic and updated language, but also its integration of various modes, such as video, pictures, etc. The students may be assigned a task to expressively and impressively report news in turn as warming-up exercises before each English class, the news they present with PPT are not merely duplicate of the newspapers or Internet from which they may gather their ideas, but made by themselves. And the teacher's comments are essential as an effective way to support and develop the students' media literacies.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is a term which refers to a person's ability to use, manage, assess, and understand technology (ITEA, 2007, p. 9). In a certain degree, digital literacy is the capacity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related to the digital world. Most students are more motivated to read multimodal texts from a computer or smartphone screen than pure texts without images from books at hand, and they feel far more comfortable working on a keyboard or touch screen than writing in a notebook. It is no denying that the knowledge from Internet teaches the students both traditional practic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new literacy practices such as appropriation of media content, networking, negotiation of social contexts, and working with multiple media (Jenkins, Clinton, Purushotma, Robison, & Weigel, 2006). The students have often been told that their online activities are a waste of time and sitting at their computers for hours on end is always socially isolated, but we have come to accept that the interactive nature of online reading and writing not only enables them to learn about traditional literacy concepts, but also the essential social skills they should have, such as collabor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and they may very well be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they know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and locations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cy practices.

Although traditional print-based texts are multimoda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combine written words with visual pictures and design elements, it is digital technology, which integrates text, graphics, visuals, sound, animations, etc., that has dramatically expanded the meaning making potentials for the creation of complex

web-mediated messages. The web page designer must not only create effective messages that fulfill readers' information needs and realize the intended communicative goal but also make it usable, meeting readers' expectations regarding user-friendly design, hypertext navigability, skimmable content, and so on.

For instance, the teacher may ask students to create a class website (English version) collaboratively, such as how they will choose to represent the class, how they will determine audience concerns, how best to combine various modes such as visual images, written language, design elements and other semiotic resources, and so on. Certain instructions may be provided by the teacher, for instance, the webpage readers are usually impatient, and process information in chunks, skim and skip the text, expect essential information up front, and so on. In the final stage, the student groups may demonstrate their finished website sections in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during which they explain their choices regarding the content, design, information relevance and clarity, navigation, interac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text and visuals. The students from other groups then could give their commen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works in the class, building their collaborative literacy skills. A number of aspects 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website section: for example, whether the language used is created or copied, grammatically acceptable or not; whether the color scheme and layout are appropriate or not; whether the images used are created or borrowed; whether the visuals complement, illustrate, and support the textual elements or not; whether the buttons and hyperlinks function well or not; whether the length of loading time is reasonable or not; whether the website section is easy to navigate or not, and so on.

It is safe to say that readers, viewers, and listeners today are "drawn in" by the new technologies as they become active partners, users, and producers of communication, due to the possibility to publish anything they like on the Internet (Rosenberg, 2010, p. 8). In this sense, an online community or QQ Group for English learning may be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er's proposal. It serves as a forum for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all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join in the Group) to discuss what confuse them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share their English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in which language learning synergies may occur as well as expertise from teacher and successful learners can be disseminated. A moderator of the community or group may be designated or volunteered to supervise the members to produce and comment on the texts in English, and initiate an interesting topic in the Group Announcement on a regular basis. And assessment is given by the end of the term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ach member's posted texts.

Just as Gee (2004) argued, literacy skills are learned more thoroughly through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and acquisition than through direct instruction. Then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ow to guide the stude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latform of Internet and improve their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online reading and writing.

Critical Literacy

The term critical literacy refers to use of the technologies of print and other media of communication to analyze, critique, and transform the norms, rule systems, and practices governing the social fields of everyday life (Luke, 2004). And most often, it is to interrogate the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and reveal their underlying ideolog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 Lewison, Seely Flint, and Van Sluys (2002) hold that critical literacy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related components: (1) disrupting the commonplace; (2) interrogating multiple viewpoints; (3) focusing on sociopolitical issues; and (4) taking action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Critical literacy aims to

develop both critical understanding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so as to enhance people's critical and creative abilities, particularly, how to use multiple texts to represent and analyze social fields and their systems of exchange—with an eye to transform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Critical literacy entails a process of naming and renaming the world, seeing its patterns, designs, and complexities, and developing the capacity to redesign and reshape it (New London Group, 1996). Critical literacy practices often involve students' taking a skeptical and evaluative stance and acting upon these stances as they confront what happened in their lives and in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at is, the 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ensibly challenge whatever they perceive, tell them seeing is not always believing, everything needs to be taken in critically, and what counts is to have their own thinking and form their own ideas. Especially in this digital world, without the necessary critical literacy skills to evaluate web-based information, young people will be seriously disadvantaged, misled, and probably confused by what they locate online. So critical literacy is an essential practice for students as the Internet is largely unregulated; they need to be instructed in how to look at available resources critically and how to assess various texts as reliable in this age of digital literacy (Lund, 2006).

In English class, for the text analysis, th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be inspired to have their own voices as to what the text says explicitly as well as inferences drawn from the text, and what kind of textual evidence can support them; how specific individuals, ideas, or events interweave and interact to develop the central idea; how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rhetoric the author uses in his/her exposition or argument, etc. Based o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ve discussion,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resent their own ideas clearly and persuasively either in class or out of class through E-mail. During this process, different ideas are encouraged and welcomed. The students may also be assigned a term task as a supplementary activity to foster their critical literacy: My view on... The topic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hot social issues, and the idea should be original and persuasive. It is not an isolated writing task, but a multimodal product. The students may choose the topic based on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submit their works anytime within the semester through Internet in the form of WORD or PPT. Excellent or typical works which involve critical but convincing ideas and a fine combination various modes to convey meaning may be presented in class to stir students' interests and engagement. This kind of multimodal learning practices also allows the students to critically examine how different texts convey meaning, how the modes convey meaning differently, and how texts evoke different responses from the reader or exactly, the viewer.

Postmodern Literacy

Young people today are postmodern, no longer striving for stable, self-shaped futures; most of them are disconnected from famil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live amid constant change and ambiguity, and hang out in such nonplaces as cyberspace (Bean & Moni, 2003). And in the new media age, where the screen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communication, linear textual structures have almost faded away, young people are becoming adept at reading in "non-linear reading paths" (Kress, 2003, p. 160). That is, youngsters are supposed to move quickly across media, jumping from print to digital text to video to audio and become sophisticated readers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new time.

Picture book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reading resource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raditionally seen as the province of the young, inexperienced reader. However, contemporary picture books which contain theme,

issues, artwork, and quality writing are no longer just for young kids. Drawing upon meta-fictional and postmodern writing techniques, contemporary picture books, in which author and illustrator consciously employ a range of devices that are designed to interrupt reader expectation and produce multiple meanings and readings of the book, appeal to the readers with a much wider age span and range of reading abilities. The postmodern picture books may pose a challenge to the readers for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indeterminacy in written or illustrative text, plot, character, or setting; unusual design and layout; contesting discourses between illustrative and written text;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multiple readings and meanings.

The contemporary picture books may provide the readers with the access to complex writing techniques and literary elements, such as imagery, central tension, flashback, metaphor, and so on. The artistic techniques such as postmodernism, cubism, surrealism, and impressionism contained in the illustrations and visual elements of the picture books may also increase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of art itself. Young people in today's society experience more varie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texts and visual media, and the postmodern picture books may well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traditional written text and new multimodal texts. Due to the non-linear structures and complex visual designs, the picture books contain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require the readers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how to navigate the texts and how to explore, construct meaning as they experience the story presented.

English postmodern picture books may serve as a good support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s well as their development of multiliteracies. Teachers need to get over their biases about this literary format and take advantage of picture books to facilitate their teaching. For example, a task concerning picture books may be assigned to the students: "My Favorite Picture Book" which requires them to find and read the available English picture books, print or digital, and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favorite one with PPT presentation. The multimodal works are supposed to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and illustrator and the insight learned from these information; the language and artistic technique analysi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exts and the illustrations; the personal response brought forward during the reading; and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It is a no-easy task which involves much multimodal work, but it is during the process that the multiliteracies, let alone the postmodern literacy, have been well developed.

Design in Multiliteracies

An essential concept of multiliteracies is design, which equips the learners with the capacities of not only making meaning with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conventions, but also being active designers of new meanings. The six design elements developed by New London Group in the meaning making process are linguistic, visual, audio, gestural, spatial, and multimodal patterns of meaning which involve one or more of the other five modes.

According to New London Group (1996), the framework of multiliteracies pedagogy involves: situated practice, overt instruction, critical framing, and transformed practice, which may occur simultaneously, randomly or be "related in complex ways...each of them repeatedly revisited at different levels" (New London Group, 2000, p. 32). The framework means in the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the students' meaning making should be situated in real world contexts, and the teacher's guidance with an explicit metalanguage of design is essential. Th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interpret and construct the designs of meaning in the social context, and constantly transform existing meanings to design new meanings.

So the ideal classroom should make learning shared, distributed and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ve designing of texts that are sufficiently scaffolded by experts such as capable peers, teachers, or books, and Internet. An example in this case is that, in English class, the students may be assigned a task of role play. The whole class are divided into two or three groups, each group are supposed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ho serve as the playwright to adapt the text into the script, who act as director to assign the roles, who are in charge of the props, costumes, background music and scenery, who are the make-up man, who gives the soliloquy, when to rehearse, etc.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sk, an overt instruction may be given by the teacher, which involve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drama and the steps in the roleplay designing. With an aim to apply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throughout this learning process, the teacher may stat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ole play, and stress that multimodal patterns of meaning making, such as linguistic, visual, audio, gestural, spatial, and so on should be given special attention, so as to scaffold the students to make intuitive links with existing knowledge, and transform them to the design of new meanings.

Conclusion

A key aspect of multiliteracies involve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modalities and media into literacy practices. In English classroom, anything that can convey meaning is a text, providing the teacher with a variety of literacy activities, and the students with an access to multimodal texts. Supporting the notion of becoming literate instead of being literate (Unsworth, 2001), a discerning English teacher should embrace the constantly advancing technology in his/her teaching to create multimodal texts and align his/her pedagogies with the digital world and context that surrounds them. And more importantly, with his/her professional ingenuity, the teacher should afford a voice to students who are frequently silenced in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classroom and enable them advance confidently in their language and literacy abilities.

References

- Bean, T. W., & Moni, K. (2003).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literacy: Exploring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young adult fic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48(8), 638-648.
- Beers, K., Probst, R. E., & Rief, L. (Eds.). (2007). *Adolescent literacy: Turning promise into practice*.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 Chauvin, B. A. (2003). Visual or media literacy? *Journal of Visual Literacy*, 23(2), 119-128.
- Cope, B., & Kalantzis, M. (Eds.). (2000). *Multiliteracies: Literacy learning and the design of social fu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 Doering, A., Beach, R., & O'Brien, T. (2007). Infusing multimodal tools and digital literacies into an English education program. *English Education*, 40(1), 41-60.
- Elsner, D., Armbrust, L., & Lohe, V. (MuViT-Group). (2011). *MuViT-Multilingual virtual talking books. Project flyer*.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Gee, J. P. (2004). *Situated language and learning: A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 Hobbs, R. (1997). Literac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In J. Flood, S. Brice Heath, and D. Lapp (Eds.), *The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literacy through the communicative and visual arts* (pp. 7-1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Macmillan.
- Hobbs, R. (2006). Multiple visions of multimedia literacy: Emerging areas of synthesis. In M. C. McKenna, L. D. Labbo, R. D. Kieffer, and D. Reinking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pp. 15-28).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ITEA). (2007). *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 Content for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3rd ed.). Reston, VA: ITEA. Retrieved from <http://www.iteaconnect.org/TAA/PDFs/xstnd.pdf>
- Jenkins, H., Clinton, K., Purushotma, R., Robison, A. J., & Weigel, M. (2006).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hicago: 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 Kress, G.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Lewison, M., Seely Flint, A., & Van Sluys, K. (2002). Taking on critical literacy: The journey of newcomers and novices. *Language Arts*, 79, 382-392.
- Luke, A. (2004). Two takes on the critical. In B. Norton and K. Toohey (Eds.), *Critical pedagogies and language learning* (pp. 21-3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nd, D. (2006). Read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lite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13(3), 154-164.
-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08). *The NCTE definition of 21st century literacies*. Urbana, IL: NCTE.
- New London Group. (1996).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6(1), 60-92.
- New London Group. (2000).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In B. Cope and M. Kalantzis (Eds.), *Multiliteracies: Literacy learning and the design of social futures* (pp. 9-74). London: Routledge.
- Pennings, A. (2002). *What is visual literacy?* Retrieved November 9, 2002 from Marist College Website <http://www.marist.edu/pennings/viswhatis.htm>
- Rosenberg, A. J. (2010). Multiliteracies and teacher empowerment. *Critical Literac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4(2), 7-15.
- Shoffner, M., De Oliveira, L. C., & Angus, R. (2010). Multiliteracies in the secondary English classroom: Becoming literate in the 21st century.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and Critique*, 9(3), 75-89.
- Unsworth, L. (2001). *Teaching multiliteracies across the curriculum: Changing contexts of text and image in classroom practice*.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B. T. (2008). "Tomorrow will not be like today": Literacy and identity in a world of multiliteraci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51(8), 682-686.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Xiaoqing Jia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English in current society, it's an urgent task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o conduct research on ways of improv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is study,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mode is trying to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in the meantime,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this mode is analyzed,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this mode are also discussed.

Index Terms—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I. INTRODU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is increasingly apparent and the so called English Mania is still prevailing in most parts of China. From primary schools to univers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learn English but often without satisfactory results. At presen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undergoing a reform with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college graduates who are skillful at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t'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ollege teachers to conduct research regarding how to achieve this goal, especially how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ability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t present most college classrooms have been equipped with computers and projectors and have become multimedia classroom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se equipment,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has taken on a new look. Students can enjoy more vivid video and audio materials as well as pictures, tables, diagrams, which will help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s and enrich their knowledge. In order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multimedia classrooms and achieve the best result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mode is trying to be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in the meantime,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this mode is analyzed,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this mode are also discussed.

II. RELATED THEORIES

A. Constructivism Learning Theory

Constructivism is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r theory of learning which argues humans construct meaning from current knowledge structures. Constructivism was first proposed by Swiss psychologist Jean Piaget, who didn't agree with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children's play was aimlessly unimportant. On the contrary, he regarded children's play as an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part of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He suggested that through processes of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individuals construct new knowledge from their experiences.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Children are scientists" by Piaget (1950), along with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psychology theory by Vygotsky (1978), the meaningful learning theory by Ausubel (1968) and the discovery learning theory by Bruner (1961)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liza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1980s constructivism began to be influential in the western world. British scholars Williams. M and Burden. R L (1977) proposed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their book "Psychology for Language Teachers", in which they discussed the four factors influencing learning: teachers, learners, tasks and contexts. These four factors are not irrelevant to each other, instead,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is a dynamic process with the four factors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constructivism reflect in the change of teachers' roles, who are changing to the assistant and facilitator from the introducer and deliverer of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learning is not a simple one-way process from teachers to students, instead, learning occur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constructivism arose in the 1990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is accepted by scholars in China since 21st century. This theory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our country since its introduction as can be seen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 concept, teaching mode, faculty training and so on. Research concerning constructivism is one of the hottest topics in ou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ield. Teachers and experts study and analyze this theory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its inspira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ts application in

* This study is funded by the projec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Based on Students' Multiple Demands" Project No.:2015M084

classroom language teaching and its assistance in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multimedia classroom equipmen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constructivism itself is not a particular pedagogy. It just describes how learning should happen. In short,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suggests that learners construct knowledge.

B.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is a method aiming to enhance language func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communicative ability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It holds that language is a tool for social communication, so teaching should b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mmunicative context like hospital, bank, airport, etc. The emphasis of teaching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majors and possible future careers so as to improve the practicability, objective, and interest of teaching.

Communicative teaching method is an effective method which can train students' ability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and it was introduced to our country by well-known scholars like Hu wenzhong (1982) in the early 1980s and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objectiv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language application, especially the ability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s as to communicate smoothly both in oral and written form. Communicative teaching method mainly deals with a couple of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er and stud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fluency and accuracy.

C.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Interaction theory originated from 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put forward by Mead and improved and perfected by his student Blumer (1980) who proposed symbo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other later researchers. 1950s witnessed the beginning of interacting teaching approach, which focuses on researching how teaching approaches affect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merican professor Palincsar (1986) from Michigan Universit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v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laimed that students are the main part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construction, during which students need to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own ability to study, while the teachers only ne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instruction, assistance and a kind of studying atmosphere. Interactive teaching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field. Ashley, B.J (1969) classified the classroom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patterns into three categories: teacher-centered, students-centered, knowledge-centered. In fact, interactive teaching approach is a form of development in communicative teaching approach and aims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to the interactive teaching. Hatch holds that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rough interaction is equally important for language learners.

Under the guideline of interactive theory,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students and students, even learners and learning materials and learning equipment, meanwhil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should be in a state of dynamic coope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II.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 The Concept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regards the teaching process as a dynamic,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is a creative and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It reflect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stud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learners and learning materials, people and computers, people and internet, etc.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mainly reflects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in and outside classroom, the accomplishment of group assignments through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and so on. Many college teachers and researcher have conducted studies on it, for example, Guo Jianjun (2005) has published a book entitled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

The so-called "multi-dimensional" refers to the multiple factors and layers related to teaching. Firstly, we have multiple interactive parties. In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ode, teacher and students, students and students will receive the information from each other and will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every individual and every group learn as well influence each other. Secondly, we have multiple interactive conten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includes not only knowledge of English language but also exchange of diverse concepts, emotions, cultures and so forth. Hence,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will know more about each other which will help the teacher to modify their teaching methods or materials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different students. Thirdly, we have multiple interactive media. The impl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must depend on the advanced multi-media equipment, which helps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with a blackboard and chalk. With the help of multi-media equipment, students can get access to the learning material in a more vivid way with audio and video aspects of the materials both presented for them. In this research, the interactive factors go beyond people and classroom, including not only teacher and students but also other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dia and plac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Firstly, in comparison to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mode will be much more attractive to students in that it provides students with more multiple and more abundant learning materials in a more flexible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 Then, with this flexibility and interactivity, different students will find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different learning procedure and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Eventually, with the help of the teaching mode, there will be win-win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 one hand,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benefit from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 the other hand, teachers will also enrich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s from the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in classroom.

B.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ollege English syllabu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objectiv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especially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which will help them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their future study, career and social interaction. Meanwhile,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should also be enhanced so as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is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based on this syllabus and adds its own features with the objectives as follows: In listening ability,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English classes, lectures,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English broadcast and TV programs at the speed of 130-150 words per minute. As for speaking ability,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be able to discuss a certain topic in English as well as make English presentations after some preparation with correct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In comprehension ability,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English articles at the speed of 70 words every minute. And in completing fast reading tasks their speed should reach 100 words per minute. The ability of scanning and skimming is also required. They should be able to locate certain details and summarize main ideas of different articles. In writing aspect,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finish writing tasks like narration, argumentation, exposition and letters, notices etc. They should be able to finish a composition of at least 120 words within half an hour and translate short articles of about 150 words within half an hour.

To sum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 is in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English ability. The objective of this novel mode of teaching is in consistent with the above mentioned teaching objectives proposed by the college English syllabus.

C.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s a multiple pattern of interaction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is mode focuses on students-centered activities in which students study actively and autonomously, meanwhile teachers instruct and inspire students to explore knowledge based upon the above mentioned theories. In this paper, an integral and meaningful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trying to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eaching theories through teaching activities, aiming to motivate students' study interests and improve their English study.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in this paper mainly refers to three dimensional interaction consisting of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 classroom; the interac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fter-class learning; and the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in their major and in English language.

1. Dimension one --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factors in classroom

In traditional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dures go in sequence of vocabulary and phrases explaining, text translation, exercise correction. The teachers' teaching contents consist of a large number of words, phrases, example sentences, it is the teacher who does the most of classroom discourse and the students have very few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learning. The most part of students' activity is to take down notes of what the teacher teaches. As a result, students have very little interests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learning.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shortcoming of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brand new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e procedure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cludes a sequence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like students' oral presentation, teachers' lead-in, students' group work,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ext, the practice of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group discussions, role play, etc.

In constructing this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firstly, the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factors in classroom is constructed. In dimension one,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classroom interactions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is mode, teachers shift their roles from dominators of the classroom to the partners of learning. Teachers' are on the mission to assist students to discover and explore the knowledge, inspire the students to think, challenge and find solutions to problems as much as they can with the purpose of maximizing their learning ability. Classroom organization is the key to this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multiple ways of teaching should be employed such as role play, classroom presentation, group work, group discussion, games, quizzes, and so on.

The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re to be constructed to comprise the first dimension of this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lassroom teaching. Students learn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diverse activities in classroom. They will be able to enrich their knowledge as well as enhance their ability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ir peers. Studies by Forman and Cazden (1985) suggest that students who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having peer support

could increase oral exchange and be led to higher levels of task engagement and problem solving.

Nextly,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re also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first dimension. In one classroom, there is only one teacher who is implementing the teaching task. But how well the teacher conducts the teaching depends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ssociates and experienced peers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doing so teachers will have more ideas as to how to design a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have more information and inspiration as to how to demonstrate the related knowledge to the students.

Lastly in this dimension a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college campus can be said to be an absolutely digital space. Students are surround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verywhere and they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lmost 24/7. They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obtaining information via internet. As a result, classroom teaching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computers, internet, real-time message, online homework, etc. Students' interac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ir motivation of learning,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feedback of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teachers.

2. Dimension two --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fter-class learning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main channel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ut with the abundance of English knowledge of the limit of classroom time, only learning English in classroom is far from enough. So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only a part of college English studying. How to activate the students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learn English in their after-class time to assimilate the classroom knowledge and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issue. So in this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also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fter-class learning as an essential task. To achieve this goal, teachers will seriously design the students' after-class assignment to make an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fter-class learning so as to lengthen the teaching time and train students' ability to study autonomously. For example, students are assigned group work in every unit with two groups each time. Then in class, one group will make an oral 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is unit and the other group will giv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text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the text structure. In this way, students have to be engaged in after-class learning and make good preparation for every English class. What's more, in classroom they will participate mor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3. Dimension three --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in their major and in English language.

One obstacle i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s that many teachers find that some students lack interest in studying English. In part,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feel there is little connection of English with their majors and they feel there is no use to learn English so they lack the motive to learn it seriousl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t is advocated that students' knowledge in their major and in English language should be combined in the way of adding more English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ir major to classroom English teaching, organizing more activities concerning their major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Generally speaking students will have more interests in learning their major knowledge and thus teaching effect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will be promoted at the same time.

IV. FEATURES AND EFFECT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Roles*

For a long time, it is the teacher who dominates our classroom and is the subject of 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while students only passively receive the knowledge and are the objects of learning. Students educated in this way tend to be dependent on teacher's explanation of the knowledge, lack of creativity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which result in the fact that they can't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In this mode, teachers transform their conventional cramming method of teaching, establish modern teaching concept, shift their own roles, serve as a guide, an organizer, and a cooperator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What's more, teachers should clarify that students should become the subjects of learning and help th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s well as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output to language learning. Thus students will learn actively instead of passively and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will be cultivated eventually.

B. *The Trigger of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In this mod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is strengthened. This dynamic, two-way interaction contributes to trigger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transform the situation of teacher dominating the class, information only flowing one-way from the teacher to students. In English teaching, both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should b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ir discourse and activities comprise th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es show that teacher discourses consist of three parts, that is, lecturing, questioning and feedback while students' discourses are mainly composed of answers to teacher's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to teacher's feedback.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s, teacher's discourses account for as much as 70% to 90% of class time and the classroom teaching is dominated by the teacher like a mono-drama of the teacher. As a result,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time in classroom is very limited and it's difficult for the teacher to know the degree of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 of the knowledge. Thus, the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s advers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anguage application capability and th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is mode, in order to achieve ideal classroom teaching effect, make classroom atmosphere more active, teachers adopt proper interaction pattern 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n this way the students will actively take part in the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become the main participant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so as to shift language teaching from teacher-centered to learning-centered.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students can be diversified. For example, teacher questioning- students answering- teacher feedback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student questioning—students answering—students evaluating/feedback.

C. *The Implement of Student-centered Activities and Task-based Teaching*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it is the teacher who controls the process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is mainly through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answers given by the students, which makes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a boring experience.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is mode, teachers design more student-centered activities to involve more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during which, assign students specific tasks to implement task-based teaching. The tasks can be in various forms and with diverse purposes. To finish the tasks, students must engage in the real interaction between each other and will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language ability in the long run. For instance, group discussion is a good method of student-centered interactive activity and has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eacher can divide the students into different groups with 5 to 6 stud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students. The group members will discuss a topic assigned by the teacher, form their own viewpoint and make a presentation on the topic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with other students. The representative who makes the speech is not fixed, all the members can do it in turn. After their presentation, comments and feedback will be given to them by the teacher as well as the students. This kind of student-centered interaction arouses great interest in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and provides the students with precious opportunities of practicing speaking English in public and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in English is strengthened in the process as well.

V.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an b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this study can also be expected to benefi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 and teacher-researchers in terms of teaching practices in general.

REFERENCES

- [1] Ausubel D A. (1968).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ognitive 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2] Ashley B.J., Cohen H.S & Slatter R.G. (196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MT. London: Macmillan.
- [3] Blumer. (198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4] Bruner, J. S. (1961). The act of discover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1, 21-32.
- [5] Forman, E.A. & Czaden C. B. (1985). *Exploring Vygotskian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The cognitive value of peer Inter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Guo Jianjun. (2005). *An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ulit-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 Ji Nan: Shangdong University Press.
- [7] Hu Wenzhong. (1982). A study on communicative teaching method. *Foreign Languages* 1982 (5): 17-24.
- [8] Palincsar. (1986). Interactive Teaching to Promote Independent Learning from Text *Reading Teacher* 39 (8): 771-777
- [9] Piaget J. (1950).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10] 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1] Williams, M & Burden, R L. (1977). *Psychology for Language Teac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iaoqing Jiang was born in Qingdao, China in 1976. She received her Master's degree in linguistics fro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05.

S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Vocabulary and Syntax through Translation

Liu Jing and Wang Lin

Abstract—Dynamic System Theory (DST) can be applied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S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vocabulary and syntax through translation. The analysis of three postgraduate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College English Test Band 6 (CET 6) translation shows that the lexical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s are variable, unpredictable and non-linear.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validity of the result, three 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invited to be raters.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is variable, unpredictable and non-linear, which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result assessed by www.pigai.org.

Index Terms—Dynamic system theory, translation, vocabulary and syntax development

I. INTRODUCTION

Since 1980s, complexity, accuracy and fluency have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Most of the researchers investigated learners' second language knowledge and level through complex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lexity and other two variables. Complexity is often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bulary and syntax, in which the study of lexical complexity is more in-depth and has reached a certain consensus, while the study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s more chaotic [1].

DST is about the change of systems over time. Systems change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ir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reorganization [2]. It is a new perspective to appl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is to regard language as a complex and open dynamic system [3]. It provides a brand-new method and perspective for us to observe and study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t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evel. It regards variability as the research focus and looks at language development more comprehensively, which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3].

Although the research of dynamic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oday, most of its main results com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applying dynamic system theory to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some in-depth and valuable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II. LITERATURE REVIEW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ranslation and DST,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v. 5.3. R4, 372 papers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CiteSpace, which was created by Chaomei Chen, a professor of Informatics at Drexel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can help the researcher better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of a certain topic. It saves time and lets the researcher concentrate on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ritical information.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 CiteSpace is that the researcher can directly see the hot spots of science study change over time, incrementally or drast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research can be extracted from published literature through tracks.

The research condition “subject= 翻译中的词汇 (vocabulary in translation) or subject=翻译中的句法 (syntax in translation) or subject=翻译中的词汇句法 (vocabulary and syntax in translation), source categories=CSSCI & 核心期刊(Core Journals)” was input in CNKI and searched on August 21st, 2019.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data that are relative to our study totals 182 records from 1993 to 2019. Fig. 1(a) shows the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the data. It shows that there is a heated discussion around transl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Fig. 1(a). The map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Hai Fang (2003) described the lexical strategy in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in Test for English Major Band 8 (TEM 8). It analyzed the reas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tegy, examining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Manuscript received July 1, 2020; revised November 12, 2020. This work was support in part by Shandong Province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18CWZJ21) and 2018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ject respectively.

Liu Jing and Wang Lin are with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O 266061 China (e-mail: rogerliu99@126.com, 498399349@qq.com).

doi: 10.18178/ijssh.2021.11.1.1032

enlightenment to English teaching [4]. Luo Jimei and Li Mei (2012) described typical forms of error in the machine translation of words, syntax, symbols, etc [5]. Wang Yue and Zhang Jijia (2017) observed the process of cross-language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ambiguous words by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investigated through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s. And it showed complexity and flexibility of lexical acquisition proc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6]. Yang Zhiting (2019) compared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used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nd gave birth to a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 [7]. From these literature and the map of translation, we can see that i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ST that few researchers observe lexical and syntactic growth in translation.



Fig. 1(b). The map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literature.

And then, the research condition “subject=动态系统理论 (DST), source categories=全部来源 (All Journals)” was input in CiteSpace and searched. After selecting,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data which are relative to our study totals 190 records. Fig. 1(b) is about keywords in this field. It can be seen that dynamic system theor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attr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re hot spots in this field.

Li Fangfang and Guan Lijuan (2009) examined that language attrition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and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and language interference are gene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8]. Zheng Yongyan (2011) proposed the new dir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with the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Fang Hong and Wang Kefei (2014) studied translation teaching models based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development with the DST [9]. Jiang Weishan and Wang Tongshun (2015) examine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Ning Jiangeng and Cai Jinting (2019) designed a case study of directional f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DMC (Directed Motivational Currents) construct captures a unique form of motivation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on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s [10]. From these literature and the map of DST, we can see that it is in translation that few researchers observe lexical and syntact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ST.

Dynamic system theory fit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has a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t has a broad research space and prospec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bility research,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practice [11].

III.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Theories which applied in this paper includes DST and lexical and syntactic complexity.

A. DST

Dynamic Systems Theory (DST), originally used to describe the behavior of complex dynamical system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has been applied to several disciplines such as physics, biology and more recently to social sciences. In 1997 Larsen-Freeman published her oft-cited and pioneer work entitled *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made her the first researcher to stud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a DST perspective. Larsen-Freeman (1997) characterized dynamic systems as “dynamic, complex, nonlinear, chaotic, unpredictable, sensitive to initial conditions, open, self-organizing, feedback sensitive, and adaptiv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SLD) have been discussed extensively in various publications (de Bot, Lowie & Verspoor 2007; Dornyei 2009;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Verspoor, de Bot & Lowie 2011; Daniel J. Olson 2019). It may be useful to briefly ment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systems as far as relevant for SLD [12].

B. Vocabulary and Syntax Complexity

In addition to DST, vocabulary and syntax complexity have been developed by researchers these years.

In recent years, the scholars have done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the non-linear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ocabulary is confirmed from each side. At the macro level, the receptive vocabulary and the output vocabulary development are not synchronized (Laufer 1998; Liu Shaolong 2001). The productive vocabulary is at a certain stage, which is subject to a stagnant vocabulary plateau (Laufer & Paribaht 1998; Cui Yanqing & Wang Tongshun 2006; Tan Xiaochen 2006; Wen Qiufang 2006); at the micro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mension knowledge of the word (including word meaning, synonyms, collocation, etc.) development is not synchronized (Schmitt 1998; Wu Xudong & Chen Xiaoqing 2000; Liu Shaolong 2001), and will experience a number of semi-stable states (Churchill 2008),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gregate and combined semantic relation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psychological lexicon is unbalanced and not symmetrical (Wolter 2001; Zhang Shanshan 2006; Zhang Ping 2010), the path of which presents a certain U-shape (Zhang Shujing 2008; Fu Yuping 2009; Liu Zhifang, Zhang Zhijun, Yang Guifang 2016). The rich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vocabulary is not a constant linear process [13].

In the field of syntax, most studies on writing development have utilized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such as average

length of structural units or the extent of clausal subordination. Researchers assumed that longer units and more subordination reflect greater complexity.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se studies has relied on the construct of T-unit: “one main clause with all subordinate clauses attached to it” (Hunt, 1965, p. 20). The two most frequently used measures have been the mean length of T-unit (MLTU) (e.g., Larsen-Freeman, 1978, 1983; Ishikawa, 1995, Henry, 1996), which is the average across all T-units in a text, and clauses per T-unit (C/TU) (e.g., Flahive & Snow, 1980; Bardovi-Harlig & Bofman, 1989; Hirano, 1991; Bao Gui 2010; Wu Xue & Lei Lei 2018; Hou Junxia & Chen Zuanzuan 2019), which is the number of dependent clauses per T-unit [14].

IV. METHODOLOGY

After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and theories, this part is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ology of the paper. This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investigated three postgraduate students' translation development---spec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lexical and syntactic devices---by adopting the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study answered the following two research questions.

1. Did the translators' performance evolve in terms of lexical complexity over a month period?
2. Did the translators' performance evolve in terms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over a month period?

B. Participants

Three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at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re non-English majors. They were invited and volunteered to this study. They are in the same age group,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n different genders and all passed CET 4 (College English Test Band 4). The participants have to pass CET 6 in order to graduate.

The participants took part in one-hour lesson twice a week from 15th July to 9th August, totally four weeks. The objective of the course is to develop students' four basic language skills, i.e. writing, speak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skills, and translation skill.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none of the skills was emphasized more than the others during the course.

The first participant in the study, Amy (a pseudonym) is 25. She passed CET 4 in 2010. Amy started her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2017 at a university in Hebei Province. She has been learning English about 15 years. According to her, she has difficulty with vocabulary because she often forgets the meaning of the new or difficult words.

The second participant in the study, Alex (a pseudonym) is 27. He passed CET 4 with only 425 in 2012. He has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17 years. He pointed out that his spoken English and listening are worse than his grammar and syntax.

The third participant in the study, Sara (a pseudonym) is 26. She passed CET 4 in 2010. Sara started her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2017 at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She has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round 15 years.

Table I shows a summary of the participants' profile.

C. Instruments

The data for the study were participants'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which were collected at 8 points (T1, T2, T3, T4, T5, T6, T7 and T8) over the one-month period. Eight CET 6 translations that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ET 6 past exam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TABEL I: PARTICIPANTS' PROFILE

	Amy	Alex	Sara
Gender	Female	Male	Female
Age	25	27	26
L1 background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Length of learning English	15	17	15
Level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CET 4	CET 4	CET 4

D. Data Collection

Each participant translated 2 paragraphs per week after every class. The requirement is to translat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original text. The participants could use dictionaries to help their translation but they had to mark the words they looked up in the dictionary.

TABLE II: THE TIME FRAME OF TRANSLATION

T1	16th, July	Translation 1
T2	19th, July	Translation 2
T3	23th, July	Translation 3
T4	26th, July	Translation 4
T5	30th, July	Translation 5
T6	2nd, Aug.	Translation 6
T7	6th, Aug.	Translation 7
T8	9th, Aug.	Translation 8

E. Analysis

The analysis were dealt with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level perspectives. At the macro-level, quantitative measures were used to explore how the system changes and organizes over time. At the micro-level,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s were examined qualitatively.

www. pigai. org is a websit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writing. It is an online service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for automatic correction of English composition. By calculat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composition and standard corpus, the score of students' composition and the results of language and content analysis are generated immediately. And it can also be used to evaluate translation results. It was chosen to analyze the syntactic and lex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ion.

F. Evaluation by Rat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validity, three translation raters, Annie, Jimmy and Lillian, who are 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i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invited. They have passed TEM 8 and they were willing to be raters. During 30th August to 31st August, the three raters were required to evaluate the same sample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CET 6 translation assessment standards (See Appendix) which involve the evaluation of lexical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s and came to an agreement on the rating standards through discussion. Then they gave 24 translation scores during 1st September to 5th September.

V.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is part mainly present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 Lexical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trajectories in Fig. 2 clearly reflect the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These three subjects' performances show stability and the scores are often very high.

From calculating variance, it can be seen that Amy's lexical performance is the most stable among the three's. Through marked words, Amy's lexical performance shows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her to remember or know the words which are long, ambiguous or at low frequency. Alex's performance in vocabulary fluctuates obviously and the variance score is the highest. His lexical performance shows that although his vocabulary is large, the usage of words is difficult for him to grasp, for example, "pay" instead of "pay for". Sara's variance score is in the middle. The number of her marked words is fewer than Amy's and more than Alex's. She is good at using words appropriately. In a word, Sara's lexical performance is soli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bulary and word us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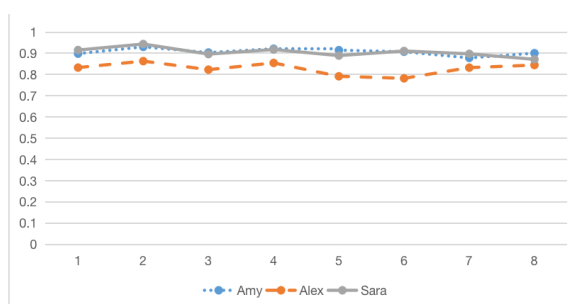


Fig. 2. Individual growth in vocabulary.

B. Syntactic Development

The different trajectories in Fig. 3 clearly reflect the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Some individual performances show regression, progress, and others remain unchanged over time.

From calculating means, Alex's syntactic score is higher than Amy's and Sara's. He is good at using subordinate clauses, for example, attributive clause and causal clause. But at the beginning, he always neglected the usage of punctuation and many sentences appeared more than one predicates so that the researcher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quickly sometimes. With correcting and reminding, he had subconsciousness about the usage of punctuation and improved it in T4, T5, T6 and T7. Amy's syntax performance is simple and sentences are often short. She is not good at using subordinate clauses. After T2, she paid attention to this and did better in T4, T5 and T6, for example, "Compared with the airplane, the outstanding advantage of the CRH train is punctuality, because it is basically not affected by weather or traffic control." in T5. Sara's mean of syntactic score is the lowest one. Although she sometimes used inverted sentences, her sentences were always characterized by Chinese word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nce (TABLE III), Amy is the best, that is, Amy's syntactic performance is stable and Sara's syntactic performance stability is the wor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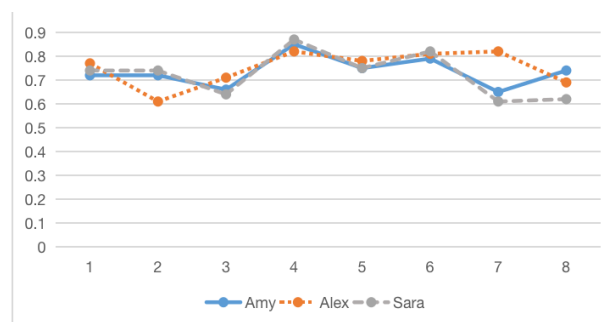


Fig. 3. Individual growth in syntax.

TABLE III: INDIVIDUAL VARIANCE

	Amy	Alex	Sara
Variance	0.004	0.005	0.008

The above Table III and Fig. 3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is unpredictable and nonlinear: scores in syntactic are not always very high or low and at the second time, scores are not always the same with or higher than the scores at the first time; progress and decline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that is, scores do not always rise linearly and decline linearly.

C. Comparison in Individu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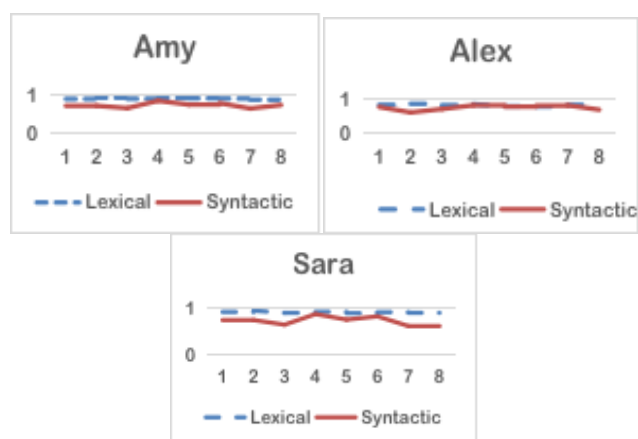


Fig. 4. Lexical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 among individuals.

Through comparing lexical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s in individuals, Fig. 4 shows that these three subjects' lexical performances are often better than syntactic performances. But for Alex, in T5 and T6, syntactic performance is nearly the same with, even better than lexical performance. Syntax growth and vocabulary growth are not synchronous, that is, when lexical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syntactic performance does not always change with lexical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and when syntactic performance is declined, lexical performance does not always change with syntactic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 for Sara, lexical performance is stable and in T4,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T3 but lexical performance is nearly the same with syntactic performance.

D. Evaluated by Raters

Fig. 5 shows scores given by three raters. It shows that the growth of scores is variable, unpredictable and non-linear. Amy, Alex and Sara's performances of growth shows no

obvious regularity. They sometimes got a lower score and sometimes got a higher one. But the fluctuation is within limits and does not have too much ups and downs. It is not sure that they will always make progress or fall behind.



Fig. 5. Raters' evaluation among individuals

TABLE IV: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ALPHA OF SCORES AMONG RATERS

	Annie/Jimmy	Annie/Lillian	Jimmy/Lillian	Alpha among raters
Amy	0.827*	0.926**	0.873**	0.947
Alex	0.882**	0.864*	0.972**	0.959
Sara	0.816*	0.843**	0.885**	0.926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5 level (2-tailed)

In TABLE IV,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scores among three raters are all over 0.80 and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among raters is very well in that Alpha are all over 0.9.

VI. CONCLUSIONS AND LIMITA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ubjects' lexical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s change over a period of time. However, the change is variable, unpredictable and non-linear. That is, lexical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s can be improved and can also be declined and whether improved or declined is not predictable. In a word, the growth is often a kind of curve whose camber is large or small sometimes. For each subject, his or her lexical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s is also variable, unpredictable and non-linear.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xical performance and syntactic performance is not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 and not reverse relation. This result confirms 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 and makes the theory more explanatory.

The results of dynamic system theory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vocabulary and syntax,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and influences o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bility development. The dynamic system theory fits into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bility, and has a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ability. It has a broad research space and 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bilit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has limitations. On the one hand, www. pigai. org is better for writing assessment, and

for evaluating translation, it doesn't reflect the accurate degree between the original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ed ver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duration of this study is only one month. It may be, to some extent, incomplete.

APPENDIX

CET 6 Translation Standards

Levels	Evaluation Standards
13-15	The translation accurately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words are appropriate, the writing is fluent, and there are basically no language errors, only a few minor mistakes.
10-12	The translation basically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text is smooth, coherent, and there are no major language errors.
7-9	The translation barely expressed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words are not accurat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language mistakes, some of which are serious language errors.
4-6	The translation expresse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use of words is inaccurate and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serious language errors.
1-3	The translation is fragmented. Except for individual words or sentences, most of the text does not express the original meaning.
0	There are only a few isolated words, or the transla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riginal text.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AUTHOR CONTRIBUTIONS

Wang Lin collected the data and Liu Jing wrote the paper ; all authors had approved the final version.

ACKNOWLEDGMENT

S. B. Wang Lin thanks the three subjects and three raters.

REFERENCES

- [1] W. S. Jiang and T. S. Wang, "Dynamics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L2 writing: A case study,"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vol. 4, pp. 503-514+584, Aug. 2015.
- [2] A. M. Wind,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development from a dynamic system theory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Lancaster Postgraduate Conference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Jan. 90-123, 2014.
- [3] L. R. Yang, "Dynamic system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Qingdao: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 1, pp. 10.
- [4] F. Hai,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inking — A study of Tem8 (2002) candidates' vocabulary strategi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1, pp. 81-83, Jan. 2003.
- [5] J. M. Luo and M. Li, "Machine translation error analysi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5, pp. 84-89, Sep. 2012.
- [6] Y. Wang and J. J. Zhang, "Cross-language recognition of translation-ambiguous words by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vol. 4, pp. 71-78+87, Aug. 2017.
- [7] Z. T. Yang, "On the pragmatic func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in scientific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 pp. 110-116, July 2019.
- [8] F. F. Li and L. J. Gua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abrasion," *Heilongjiang Researches on Higher Education*, vol. 1, pp. 174-176, Jan. 2009.
- [9] H. Fang and K. F. Wang, "A study on the compo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its developmen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systems theory,"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5, pp. 124-130+160, Sep. 2014.
- [10] J. G. Ning, J. T. Cai, "DMC case study from the DST's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3, pp. 69-75, May 2019.
- [11] S. Y. Gong, F. X. Gong, "The features of lexical and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second language of non-proficient

Chinese-English learn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5, pp. 1108-1111, Sep. 2005.

- [12] M. A. D. P. G. A. Mayo,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ch. 10, pp. 200.
- [13] Y. Y. Zheng, “Towards a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vol. 3, pp. 303-309+330, Aug. 2011.
- [14] M. K. Attila,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development from a Dynamic System Theory perspective,” presented at the Lancaster Postgraduate Conference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Jan. 90-123, 2014.

Copyright © 2021 by the author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CC BY 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Liu Jing was born in Qingdao, China in 1974. He received his M. A. degree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06.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His recent works include *The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ers' Multi-competence in Multimodal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Jinan, China, 2018. etc.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applied linguistic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Professor Liu is currently a member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mmittee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Wang Lin was born in Shanxi province, China in 1994. She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from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recent work was *The New Trend of Textbook-Review of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